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現代歐洲政治經濟

(二)

柯爾夫婦著

樊仲雲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濟無窮而德有餘

卷一

善婦天能何

謂之仲德

善婦天能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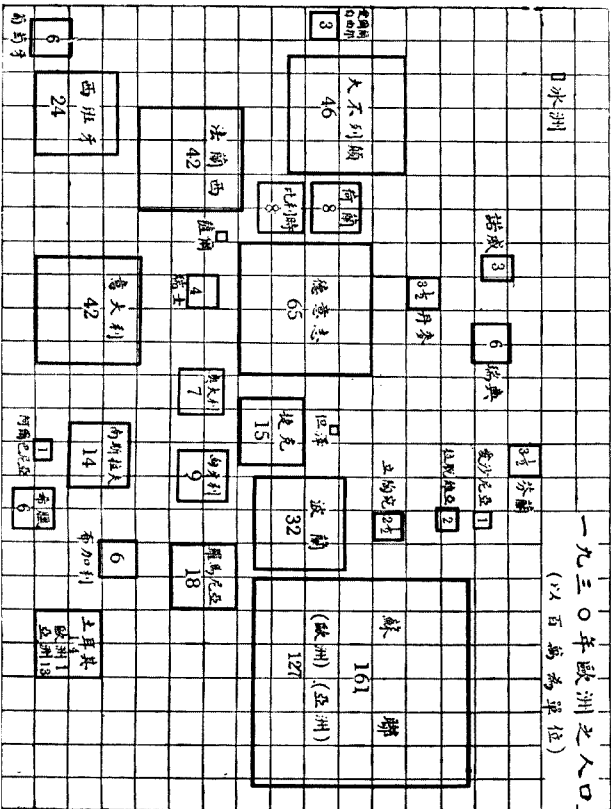
## 第二部 歐洲列國志

### 一 人口與職業

讓我們先來幾個淺近的事實。

歐洲大陸，連島嶼在內，計面積四百四十萬哩，人口據一九三〇年的統計，約有五億零六百萬。在全面積中，蘇聯的土地，佔其大半，若把亞洲的領地併計在內，則蘇聯的總面積，幾為歐洲其他各國的總面積之四倍。歐洲的居民，有四分之一住在蘇聯境內，如連亞洲部分的居民計算，則蘇聯的人口總額，較之德、法、意三國人口之總和，約多三千萬。就人口言，蘇聯居世界之第三位，僅次於中國及印度。而與美國相比，則人口差不多要多四千萬，疆土差不多要大三倍。總之，蘇聯土地大概居全世界六分之一，人口大概佔全世界十二分之一。

可是除蘇聯以外，歐洲的土地，就得零零碎碎的，分配給許多大小至為不齊的獨立國家。在這



其中，有四個「強國」，人口各在四千萬以上。大戰以還，德國雖然喪失不少領土，但在人口方面仍居首位，計有六千五百萬人。不過就疆域而論，則不但不足與擁有四千二百萬人口的法國相比，即對僅有二千四百萬人口的西班牙，亦有遜色。人口次於德國的，是英國。這個國家的面積，還不到法國或西班牙的一半，即與半個德國的面積相較，亦高出無幾，但其人口總數，則即把愛爾蘭自由邦除外，也有四千六百萬人之多。此後便輪到法國。及正在迅速地追過法國之意大利，這兩國的人口總數，各為四千二百萬。

以上是「強國」。人口總額次於列強的是波蘭，其數為三千二百萬，再次是西班牙，其數為二千四百萬。波蘭是一個在戰後復活的國家，其面積比英國或意大利都大；至西班牙的面積，則除俄法兩國之外，竟沒有一國可與抗衡。又再次以人口額的順序排列，羅馬尼亞一千八百萬；捷克一千五百萬；南斯拉夫一千四百萬。除此以外，歐洲便沒有人口超過一千萬之國家，除非將土耳其的一千四百萬也算在內，但土耳其是只有一百萬的居民住在歐洲的。

除去土耳其，卻加入蘇聯，我們這纔在歐洲有了五個「強國」，及人口在一千萬以上的五個

二等國，此外並有各擁人口五百萬以上的八個國家。就中以九百萬人口的匈牙利爲首，六百餘萬人口之瑞典及布加利爲殿。自此以下，人口在三百萬與五百萬之間者三國；在兩百萬與三百萬之間者四國，愛爾蘭自由邦卽其中之一；此外又有兩國，人口各在百萬左右。再下，則爲一羣獨立程度至爲不齊的小國，就中以薩爾區的人口爲最多，計有八十萬，冰島最少，僅十萬。最後，由幾個人口不滿二萬五千的小國，上自二萬四千左右的摩納哥，下訖幾僅五千的安多拉，爲歐洲諸國的殿軍。總計起來，歐洲連土耳其在內，共有三十九個政治單位。假使用另一種算法，把人口不滿一百萬的國家除外，則總數爲二十八，就中以蘇聯的土地爲最廣，人口十六億一千萬（歐洲部分居十二億七千萬），亦居第一位，最少的是阿爾巴尼亞與愛沙尼亞，各僅一百萬。

這二十八個自主的國家（並包括其他十一國的一部分），各有其自己的稅關，各有其在慎重防衛下的邊境，各有其具備完整而獨立的政權之政府，除愛爾蘭自由邦外，那些政府都有行使此種政權之實際權力。這二十八國各有各的租稅、貨幣制度、鐵路、軍備，以及地位雖居末尾，但重要卻不下於前數者之政治家與投資利益。他們大部分各有其自己的語言，往往有一國包含數種語

言者，各有其自己的教育制度，這種制度，大都含有侵略的國家主義的氣分。他們大部分都鬧着所謂「少數民族」問題。有許多新興國家，正在施展極大的努力，企圖從國內複雜的分子，創出一個堅強的民族意識，而那些複雜的分子之必須同受一個政府統治，則係規定於和約中者。這二十八个重要國家中，一部分是單一政府制度的國家，各以一個共通的中心爲出發點，施行程度不等的中央集權化。又一部分是聯邦制度的國家，所謂聯邦者，即合若干賦有程度不等的自治制度與顯明的統治機關之小國，爲一大國之謂，如蘇聯即其一例，而如德國，則至少截至一九三三年爲止，也可稱爲聯邦國家。綜上所述，歐洲國家之複雜，已見一斑，所以我們欲替他們求得一些適當的共通點，殊非易易，有之，則唯大家互相疑忌，大家都受世界恐慌的重大打擊，大家都竭力欲將恐慌的禍殃轉嫁於鄰國，妄想自己少受些損失，這幾點耳。

就社會與經濟的組織言，歐洲各國也是萬分複雜，這是不待言的。在這個大陸的境界內，幾乎可以看到處於各種不同的經濟階段的國家，從大規模工業化的英國與比利時，以至於完全依賴農業的一部分的東歐諸國。我們若就有數字可供查考之過半數的歐洲諸國（一切先進國已都

包括在內)而觀,則知這些國家的有職業的人民,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仍恃農業及漁業爲生的。根據最近的統計(其中一部分實已非常陳舊),在蘇聯及布加利兩國,從事於此兩種職業者,仍居全部有業人民的五分之四以上,在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立陶宛及波蘭四國,也差不多有五分之四的有業人民,從事農業。在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及芬蘭,從事農業者,居全部有業人民三分之二以上,在匈牙利、葡萄牙、西班牙、希臘及愛爾蘭自由邦,超過全部有業人民的一半。意大利也如這樣,不管近年來工業化有若何進展,仍有半數以上的有業人民從事農業。但在居於反對的極端的英國,從事農業與漁業者,差不多已只佔全部有業人民的百分之八,而從事工商業及轉運業者,則在三分之二以上。比利時也如這樣,從事工商業及轉運業者,差不多佔全部有業人民之三分之二,次爲瑞士,約三分之二,再次爲荷蘭、德國及法國,都有半數以上的有業人民從事於工商業及運輸業。此外,介乎西歐的工業國與東歐的農業國之間的,爲斯坎的納維亞半島之瑞典與諾威、丹麥、奧大利、捷克諸國,最後兩國,曾從戰前的奧匈帝國,承襲了大部分的工業設備。這些國家,從事工商業及轉運業者,居全部有業人民的百分之四十,乃至百分之五十,與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之從事農業及漁



業者相對比。他們這樣，從人口方面說起來，是差不多已經達到所謂『平衡經濟』(balanced economy)的地步；但是因為都市的居民的購買力，遠過於農村的居民，那些國家在事實上便不得不將巨大的剩餘工業品輸出國外，而從國外購進食糧以及為工業所必需的原料。平衡經濟的觀念有更具體的實現的，是法國，在這個國家中，操工商業及轉運業者居全部有業人民百分之五十，操農業者居百分之三十八。至於德國，操工商業及轉運業者居全部有業人民百分之五十八，操農業者僅居百分之三十一，所以得列入另外一類；雖然近幾年來，積極的農業保護，已使之較前更能自給，但截至現在為止，還是十分需要以製造品交換食糧與原料，同法國比較起來，德國的自給的程度要差得多了。

關於歐洲諸國的社會組織，如將各國有業人民的剩餘部分加以觀察，則可得到更多的解釋。從事兵役者在全部有業人民中的比例，以奧大利與瑞士的百分之一為最低，波蘭與匈牙利的百分之二又半為最高，大部分的國家，都在百分之一與百分之二之間。而從事於專門職業、行政事業、及家庭服務者在有業人民中的比例，則尤呈繁複的狀況，這種狀況，便說明最文明的國家與比較

不大文明的國家間在社會組織方面的巨大的異點。從事專門職業及行政事業者，以奧大利為最多，據最近統計，竟佔全部有業人民百分之十一；這是因為舊時的奧匈帝國曾在那裏建立政治上與經濟上的首都，因此遂有巨大的行政設備及專門人員的遺留。但如英格蘭與威爾士這兩個地方，也不見怎樣愧如奧大利，因為二地都維持着百分之十的比例，而蘇格蘭之僅有百分之六，則實出於意外。在居於反對的極端的葡萄牙、羅馬尼亞及蘇聯，據最近的統計，只有百分之二的有業人民，從事於專門職業及行政事業，立陶宛尤少，只有百分之一又半。次於奧大利及英國的最高比例，為百分之七又半與百分之七，例如荷蘭及比利時；而法德及丹麥，則各約百分之六。

關於從事家庭服務者的數字，也完全同樣。丹麥的百分之十三是最高的數字，但如果將農事的雇工計算在內，則這種數字也許會發生變化。其次是英格蘭及威爾士，(註)各為百分之十二，再次是奧大利的百分之十一。在反對方面，波蘭、希臘、芬蘭及愛沙尼亞均僅百分之二，而布加利竟低至百分之一。自英格蘭及威爾士以下，為諾威、荷蘭及瑞典，其數字為百分之九、百分之八及百分之七。此後便輪到德國的百分之四又半與法國的百分之四，算是介乎最高與最低間的一個集團。除

奧大利有特殊情形外，對於其他各國，前面講過的兩個羣在有業人民中的比例，確為指示中等階級在全部人口中佔有若干數額與若干財富之一個最確當的幫助。固然，這些數字一則因為在編製期內，不曾為各國定出一個絕對劃一的標準，再則因為所根據的材料，往往不是出於同一年份，所以錯誤是難免的。可是由這兩個原因而起的錯誤，或許不至於嚴重到使我前面數節的概泛的結論，都給完全破壞了罷。

歐洲各國人民職業百分表（連美國在內）

國名	百分職業					
	農業及漁業	工商業及轉運業	專門職業及行政事業	兵	役家庭服務其他	他
奧大利 (一九二〇)	三二	四六	一一	(1)	一一	一一
比利時 (一九二〇)	一九	六五	七	二	五	二
布加利 (一九二六)	八一	一三	三	一	一	二
捷克 (一九二〇)	四〇	四七	五	二	四	二
丹麥 (一九二一)	三五	四四	六	一	一三	一

諾威 (一九三〇)	三五	四八	六	(1)	一〇	·五
立陶宛 (一九二三)	七九	一〇	一·五	一·五	五·五	二·五
拉脫維亞 (一九二五)	六八	一九	四	一·五	二·五	
意大利 (一九二一)	五六	三五	四·五	二	二·五	
愛爾蘭自由邦 (一九二六)	五二	二六	六	一	一〇	五
冰島 (一九二〇)	五六	二三	四·五		一五	一·五
匈牙利 (一九二〇)	五八	二八	四·五	二·五	四	三
荷蘭 (一九二〇)	二四	五九	七·五	·五	八	一
希臘 (一九二八)	五四	二六	四	一	二	八
德國 (一九二五)	三一	五八	六	·五	四·五	
法國 (一九二六)	三八	五〇	六	二	四	
芬蘭 (一九三〇)	六三	二二	三	一	二	九
愛沙尼亞 (一九二二)	六六	一九	四	二	二	七
英格蘭與威爾士 (一九二一)	七	六八	一〇	一	一一	二

波蘭	(一九二一)	七六	一五	二·五	二·五	二	二
葡牙	(一九一一)	五八	三一	二	一·五	七·五	
羅馬尼亞	(一九一三)	八〇	一三	二	二	三	
蘇格蘭	(一九二一)	一〇	六六	六	一	九	八
西班牙	(一九二〇)	五六	二九	四	二·五	三·五	五
瑞典	(一九二〇)	四一	四五	五	·五	七	一·五
蘇聯	(一九二六)	八七	九	二	(二)	六	二
美國	(一九三〇)	二二	五一	八	·五	一〇	(三)八

(1) 已包括在上項內

(2) 未包括在內

(3) 包括教士在內

(註) 蘇格蘭爲百分之九



## 二 東歐

一九三〇年，法國外交部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着手他的歐洲聯邦（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計劃，將包含這計劃的備忘錄，同時送達歐洲各國的政府。法國這種提議，措詞力求含混，其大意謂歐洲各國為維持安寧避免戰事及增進各國間在政治及經濟方面的積極的協調起見，應成立一個聯邦組織。可是白里安的計劃，實際只含有政治上的意義。蓋法國的觀念，以為歐洲各國倘能成立一種政治上的聯合，定會得到政治安定，而政治安定之後，則經濟上的合作，即可隨之樹立。所以這個計劃在大體上對於確實的經濟聯合，毫無意見貢獻，只提議怎樣就歐洲諸國的範圍內，建立一個更密切的政治團體，與國聯相並列。這個新團體對國聯的關係，並不會在計劃中明白規定，但其活動卻必須在國聯範圍以內。因白里安提倡的結果，以繼續研究前述的計劃為目的之歐洲聯邦委員會（Committee for European Union），遂終於設立起來，而成爲

國聯的委員會之一。

當白里安着手於這個計劃之時，他的地理觀念，並不是以整個歐洲爲標準，而是以歐洲大陸東起蘇聯邊境，西訖大西洋這個區域內的國家爲準。至於英國，因爲是國聯的一員，所以倒底也被邀了來，參與歐洲聯邦計劃的討論，而且在當時大家都以爲英國大有加入在計劃中的聯邦之可能。但是從另一方面講，大家在最初的時候便已不能不承認英國這個國家，一因在其他大陸的鉅大的利益，二因帝國內部的關係，實與歐陸各國十分異趣；蓋歐陸的國家，雖然也有其自己的帝國領土，而對領地的關係，則與英國對加拿大、澳大利亞或南非洲的關係截然不同。所以英國在歐洲聯邦計劃的討論會中，實際上只是一個猶豫不決的分子。一方面，他對於歐洲大陸的政治安定與經濟繁榮，抱着熱切的關心，而在另一方面，他又恐對任何歐洲聯合組織之參加，會毀壞自己與別處的聯合，像這樣彷徨於兩者之間的英國，所以倒底不能算是歐洲國際團體的忠實會員。

在歐陸的另一個盡頭，站着蘇聯，既非國聯的會員，而在某種意義上，又爲歐陸各國的目標。據白里安嘗因不把力量集中於歐洲諸國的和平團結，以謀政治及經濟方面的合作，而只努力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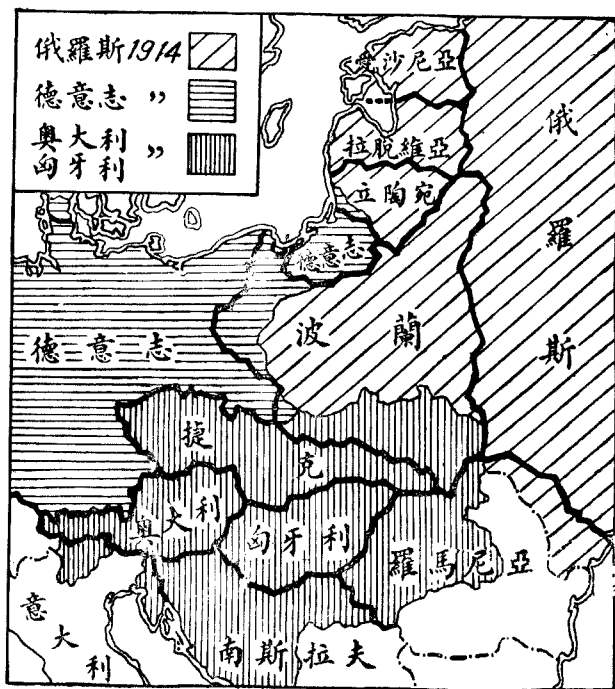
聯合歐陸諸國，使成爲集團以反俄羅斯，會受不少的譴謫。這種事情，真也罷，不真也罷，總之俄羅斯加入歐洲聯邦，既非歐洲各國所望，亦非歐洲各國所喜，則無論如何是一樁很顯明的事實。原來歐洲聯邦，是合許多處於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的國家而成的一個聯邦，而這些國家的政體及經濟組織，則與俄羅斯共產黨所建立的恰居於對立的地位，兩方面早已有誓不並存之勢了。

所以，爲某幾種目的起見，我們最好把歐洲分作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英國，第二部分是蘇聯，第三部分是其他各國。這是因爲蘇聯邊陲以西的歐陸諸國，雖然歷來是不絕的互相傾軋，而近來對於經濟的國家主義，又曾表示非常熱烈的傾向，但就前途而觀，卻有真正協調的極大可能。在這些國家中，民主政體的國家，如法國及許多戰後新興國，屬於一面，法西斯獨裁或類似法西斯獨裁的國家，如意大利、德國、南斯拉夫及帶有幾分獨裁性質的波蘭，屬於又一面，這兩方面的精神，不消說是有若干差異，但如將此兩種制度的任何一種，與蘇聯的截然不同的社會制度相較，從而求得其在精神方面的差異，則前者的差異，正不知要比後者的差異小到多少倍。從這點說，英國當然也是歐洲反俄集團中的一分子。但在同時，他又似乎並不與歐陸反布爾什維主義的同盟，採取完全

相同的步調。例如，改良主義的英國社會主義，從來不會如歐陸的大部分的社會民主黨那樣，煽起反布爾什維主義的兇燄，但蘇聯式的共產主義，卻又很難在英國的勞動者中間立足。現在，我們暫且把英俄兩國的國內情形擱起，而把東起蘇聯邊境，西訖大西洋與北海的較狹隘的歐洲，來開始對歐洲的觀察罷。

在歐洲大陸中，北起沿北冰洋區域，南訖黑海，沿着東歐的全部縱長線而蜿蜒着的，是蘇聯的境界。這也就是白里安的歐洲聯邦的東疆。沿着這東疆，分佈着五個國家，其中四個皆係根據大戰後的和約新建，還有一國，則疆域與人口均大有增加，致實際上變成一個全新的國家。這五個國家，以從北到南的順序來說，爲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波蘭及羅馬尼亞。此外又有兩國，即立陶宛與捷克，亦與蘇聯國境十分接近。立陶宛所以不能與蘇聯接壤，不過因爲有波蘭統治下的一塊土地阻隔其間，而這塊土地的所有權，其實頗成問題。至如捷克，其靠近蘇聯的一部分，主要的居民爲魯德尼亞人（Ruthenians），在文化上，在民族上，都與蘇聯靠近捷克部分之居民及位在俄捷兩國中間的波蘭領土之居民，十分相似，這樣，立陶宛與捷克，加上了與蘇聯接壤的五國，一共七國，對於

蘇聯的邊界問題均有密切的關係，然而以上所說尚不足以概括蘇聯與歐陸諸國的地理上的接觸。蓋蘇聯南方的外高加索，既與立足歐亞兩大陸的土耳其接壤，而其重要的海口，又受橫跨黑海進口兩傍的土耳其人的扼制。又如領土直達黑海岸的布加利，也大可視為蘇聯的地理上的隣國。又如北方，蘇聯的海口係在波羅的海，所以德國及斯坎的納維亞半島諸國，也成爲蘇聯西境問題中的重要分子了。



戰後的中歐與東歐

但在這裏，我們且把廣泛的接觸丟開，專就密接或靠近蘇聯西境諸國的位置來加以研究。第一，我們應該明瞭，以上所說蜿蜒數千里的國界，其實只是地圖上的界線，並不是真有天然的特點，形成自然的境界，可把某一地理區域與另一個地理區域劃分得非常清楚。固然，蘇聯與芬蘭的交界地方，北部有大大小小的山嶺，綿亘其間，南部的大湖，也可說是相當的天然界線。又如愛沙尼亞有一部分被巨大的倍普斯湖 (Lake Peipus) 截斷與蘇聯的連絡，而在中部波蘭，則伯利彼脫 (Pripet) 沼地的一部分，竟可以為軍事行動的重要障礙，這一點，過去的大戰已明白地指示我們了。又如羅馬尼亞與蘇聯統治下的區域，也有一條天然的界線，那就是聶斯德河 (Dniester)。然而從大體上說來，白里安歐洲聯邦的綿連不絕的東疆，其實並沒有什麼天然的境界。

即從文化與民族言，也無顯明的疆界存在。戰後俄羅斯的國界，較之戰前俄羅斯帝國的國界，已向東縮進不少。這種國界的改訂，據說是根據民族自決的原則，但實際情形是在俄邊諸國的新疆域內，有很多很多的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及其他的民族，其文化與形態，都與蘇聯的農民十分相近，不過一則因為受和約的束縛，二則因為緊接着大戰的終止，且在那裏曾經發生過連年的動亂，

所以他們遂不得不受文化與形態俱不相同的多數民族之統治。芬蘭境內的俄羅斯人確甚稀少。但是在愛沙尼亞，俄羅斯人就要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在拉脫維亞，佔百分之十四；在波蘭，或許要佔百分之二十；羅馬尼亞雖無確數可稽，但其含有不少俄羅斯人，則無論如何可以斷言。又如捷克全人口中含有不少魯德尼亞人，在前面已經說過，這種民族既與俄羅斯人十分相似，欲求其同化於捷克人截然不同的文化，自然非常困難。所以我們若先費一點心，把歐洲的人種地圖翻閱一過，然後以之與一九一四年及目下的歐洲政治地圖相比較，那末馬上就可明瞭，和約中民族自決原則的實施，縱使已經過不少時日，也還是解決不了東歐的少數民族問題。固然，據和約所載，歐洲戰後的新興國家與領土增大的國家，憲法中必須包含保障少數民族的權利一項，而且這種權利，據說是由國聯出面，給與國際保證的。但從波蘭、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及另外幾國的民族的不滿看來，這種權利之不曾受到保護，卻是顯明不過的事實。

總之，從地理上與人種上說來，在白里安歐洲聯邦東疆上的一羣新興國家，其境界都不是天然，而出於人爲。又如站在經濟的觀點來觀察這種境界在初劃分時的情形，則可感到更濃的人爲

的意味。原來在我們討論範圍中的俄邊諸國，完全以農業立國，其主要的居民，又皆係農民，不過當戰後的民族住區訂定之時，自耕農的小地產與大地主的大地產的比例數，每個區域彼此懸殊罷了。而且，在大戰後的最初數年內，關於大地產的分裂及土地分配於農民之情形，雖每個國家彼此大不相同，但此種情形之可以使自耕農的地產的比例數，有急激的增加，則到處都是一樣。俄羅斯如此，俄邊諸國也未嘗不如此。俄羅斯人大規模的着手於農業社會化的計劃，是三年前的事，在此以前，俄羅斯與俄邊諸國的農民，殆可說是在完全相同的經濟狀況下過活。蘇聯農業社會化的計劃，目下也許正在創造一種真正的經濟界綫，將蘇聯與境外諸國判分得十分清楚，然而這兩方面在疆界初劃分的時候，並沒有什麼真正經濟界綫存在。

據以上所述，可見東歐的劃界手續，實際上與理論上是同樣困難。這是因為出席和會的政治家，因受互相仇視的民族主義的人種學專家的包圍，結果雖然明知威爾遜總統的民族自決原則應該怎樣解釋，事實上卻很難將這種解釋應用於疆界的劃分。因為他們對於正在受他們處置分配的各個區域，必須考慮其實際情形。而且，往往一個決議成立之後，爲了某區域內的民族主義者

的古迭達業已獲得成功，馬上就得加以修改，或竟全部推翻。例如波蘭人會藉暴力與未經認可的手段，佔領維爾那（Vilna）及靠近該處的立陶宛領地，而獲得協約國之承認，於是後來當立陶宛爲挽回損失而佔領美末爾（Memel）時，協約國也只好予以承認了。又如波蘭人柯凡提（Kiorfanty）的軍隊，曾佔領上西利西亞的一塊在爭執中的土地，這對於出席和會各國之最後的決議，無疑地有很大的影響。此外還有許多區域，當劃訂疆界的巴黎和會未開幕時，就已被民族主義的軍隊所佔領，因此和會中關於疆界的決議案，便不能不以此爲依據。總之，自一九一八年秋季中歐同盟國失敗以來，有不少時候，決定東歐諸國的政治組織的，是武力，並不是外交。

當一個古舊的帝國或國家不能保持其政治統一，致本來受人管轄的區域中崛起了幾個新興國家之時，在經濟與政治的改組上必然地要引起非常困難的問題。疆界的劃分，無論根據原則或不根據原則，是都可以使本來具有極大協調的經濟區域趨於分離破碎的。譬如就講鐵道，鐵道綫的敷設，即使不能說完全以軍事策略爲根據，但與這些鐵道綫所在的區域內之政治統一，則無論如何不能說無密切關係。所以國界如果一發生變動，鐵道綫準會發生不能適應社會情形及經

濟狀況之弊病。假如新興國家受經濟的國家主義觀念的支配，力圖就邊境築起堅固的關稅障壁，則此種弊病，尤爲顯著。新國家成立之後，就得建設一個新的首都，這是發號施令的中央政府所在，同時又爲新設的中央銀行及與該銀行通力合作的高級金融機關之大本營。所以首都不僅是純粹政治性質的都城，即在經濟與金融方面，也免不了帶着幾分首都的意味。一個國家的鐵道綫與公路綫原皆集中於首都，重要海口及商業中心等處。故一旦這個國家分裂而成爲若干新國家，鐵道綫與旁的交通工具，就往往不能集中於新國家的首都、重要海口及商業中心，而依然集中於這些國家所曾構成的政治單位之首都、海口及商業中心。譬如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的鐵道綫與海口，本來是應俄羅斯的工商業及行政上的需要而設立的。里加（Riga）與勒佛爾，一樣的是俄羅斯的海口，對於戰前俄羅斯的商業社會，這兩處地方便是進出口業的關鍵。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脫離俄羅斯獨立之後，統治權發生變革，同時進出口貿易，也起了巨大變化，於是這兩個新興民主國家的交通設備，便不能不與其新需要處處發生扞格了。又如波蘭，在戰前原是俄德奧三國所瓜分的地方，故其一仍舊貫的交通綫，並不集中於一國的中心華沙，而國外各地，如莫斯科、基輔、布達



佩斯、維也納、柏林、但澤、以及北面的鄰國境內沿波羅的海的幾個口岸，倒反而變成波蘭交通綫的集注點了。領土擴大的羅馬尼亞，其國都僻處南境，而其新領域則遠在德蘭斯斐尼亞山地 (Transylvanian Alps) 的西面，故在聯絡上大有鞭長莫及之苦。至如南斯拉夫，雖然竭力想從統一交通制度入手，造出一個經濟上的中心，可是因了南斯拉夫的建國係從戰前的塞爾維亞與門的內哥羅遞變而來，故處境最爲不利。

還有政局的前途，瞬息萬變，而蘇聯與其邊境諸國間的全部邊界，又正在舉行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的鬭爭，所以如果對軍事觀點不與以密切的注意，那末經濟上的發展與改造，也無從進行。蘇聯的基輔，與波蘭邊境相距僅一百五十餘哩，蘇聯所以不將包含在歷次五年計劃中的烏克蘭工業集中於基輔，而集中於哈科夫 (Kharkov)，一部分理由，便是因爲哈科夫比較的可以不受邊界戰事的威脅。就鄰國的勢力所最不易達到的地點，建設工業中心，這是現今蘇聯的目的。蘇聯的領袖甚至公言，將來有一天要把蘇聯的經濟的首都，自莫斯科移至烏拉嶺附近，猶如他們曾從列寧格勒遷至莫斯科一般。這表示蘇聯與白里安的歐洲間的全部界線，在本質上依然是戒備嚴

重的境界，兩方面在其自己境域內的經濟手段，依然被政治的不安及迫切的戰機這兩種恐怖心理所支配，雖有許多陸續訂立的不侵略條約，亦屬無所用之。蘇聯的處心積慮，已經在前面說過了，站在蘇聯對面的新興國家，當然也是這樣，都想把工業中心，儘可能的移至安全地帶，使不致受隣國軍事行動的損害。根據以上所述，我們可知蘇聯與其邊境諸國交界地方的土地，要是沒有經濟機會給與一種非常有力的激勵，其運命是不難想像而得：即工業依舊不發達，在那裏活動的依然是農民，不過在分界綫的這一面，是擁有小地產的自耕農，而在另一面，則為社會化農業下的勞動者，如斯而已。

### 三 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

#### 芬蘭

芬蘭是蘇聯鄰國中的最北一國，在戰前，受俄羅斯帝國的統治，歷時一世紀有餘，雖然享有某程度的自治，實際上卻很不滿於俄國的措施。原來在一八〇九年，當芬蘭脫離瑞典而合併於俄國之時，規定內政的處理，芬蘭得保留自治的全權。但是到了後來，俄羅斯帝國竟對芬蘭漸漸的抱了侵略的態度，力謀促成芬蘭俄羅斯化的實現。這種侵略手段，與時俱進，及至一八九九年，俄國遂正式停止芬蘭國會的立法權，但芬蘭人卒還他一個猛烈的報復，他們的『全國總罷工』(National Strike)，在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運動中，實佔着極重要的地位。自此以後，國會的權力恢復了，芬蘭重復獲得某程度的政治自由，到了一九〇六年，遂成立一院制的議會政府，爲一九一七年俄羅

斯帝國崩潰時芬蘭共和國之建立開闢了一條道路。不過在戰前數年中，帝俄政府竟故態復萌，千方百計的想同化芬蘭，所以當一九一四年大戰爆發之時，芬蘭舉國一致的不滿，遂一發而不可復遏。俄政府強迫芬蘭人當兵的企圖，只好因芬蘭人的堅決反對而作罷，芬蘭所以能在大戰期間，始終不被捲進戰事旋渦，其原因即由於此。

迨至一九一七年，俄國軍隊一敗塗地，於是成立於第一次革命後的芬蘭自治政府，立即恢復芬蘭的主權與代議政體，由社會黨與中等階級的政黨各以相等的人數，組織暫時性質的混合政府。緊接着俄國布爾什維黨的革命，這個混合政府宣佈芬蘭的完全自主，而獲得布爾什維黨的政府的承認。但自此以後，芬蘭就變成猛烈的政權爭奪的場所了。一九一八年三月的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 (Brest-Litovsk) 條約，其中有承認芬蘭獨立一項，不料竟因此引起芬蘭內部的糾紛。大部分的社會黨，同情於共產主義，意欲建立一個赤色的共和國，而上層階級則站在德國方面，則借德國的力量以鎮壓共產黨的革命。一九一八年的春季，芬蘭便在內戰中過去。但是這場內戰，卒因曼納亨將軍 (General Mannerheim) 所統率，並有德國為其後援的白軍之大獲全勝，而告結束。

社會黨與共產黨之犧牲於白色恐怖中者，達五千人，被捕下獄者不下七萬四千人。一九一八年六月開幕的芬蘭新國會，遂將社會黨舉而擯之門外。這個國會帶着極強烈的親德色彩，議決將芬蘭的王冠，獻給德皇的一位中表兄弟。那個德國的親王，當然不忍過拂芬蘭國會的盛意，無如還沒到幾個月，中歐同盟國即突告失敗，德國人被迫退出芬蘭，於是由曼納亨將軍以攝政的名義，組織資產階級政黨的混合政府，並編練一萬名民軍，任拱衛中樞之責。

雖然芬蘭的社會黨，大部分已給剝奪了選舉權，但是一九一九年的選舉結果，社會民主黨竟在新國會的兩百席中佔得了八十席。而且，有鑒於歐洲政治局面的變化，芬蘭決意使自己變為一個民主國。一如其他的戰後新興國家所採取的路綫一般，芬蘭也漸漸的自安於立憲政體了。反社會主義的白色政府，只維持到一九二一年為止，代起的是農民黨與進步黨的混合政府，對於內戰結束時下獄的犯人，深抱同情，卒為之通過一條大赦令。自此以後，共產主義重又恢復活動，一九二二年及其後數年中，列席議會中的共產黨員，為數均頗可觀。但最大的政黨，則仍得推社會民主黨。由於溫和的資產階級政黨的贊助，社會民主黨居然於一九二五年在芬蘭成立社會主義的政府。

不過到了一九二七年，社會主義的政府卒告崩潰，政權又復落到農民黨手裏。此後的芬蘭，使繼續地受農民黨的統治，以訖於今。自農民黨的得勢，芬蘭的共產主義，又被鎮壓下去，但其鉅大的潛勢力，卻依然存在。總之，芬蘭邊界密邇蘇聯，內部各派政治勢力，極盡紛爭之能事，故其政局常陷於机障不安。自一九二〇年成立多爾巴特條約（Treaty of Dorpat）以來，芬蘭與蘇聯始終維持着外交關係。不過芬蘭的外交方針，是拒絕與任何隣國成立同盟。一九二二年，芬蘭與愛沙尼亞、拉脫維亞、波蘭三國締結中立條約之計議，即因芬蘭之反對而作罷，而且自那時起，芬蘭在外交方面，極力拉攏斯坎的納維亞半島諸國，與蘇聯邊境諸國卻不甚連絡。其實在此以前，芬蘭與瑞典兩國，爲了奧蘭羣島（Aaland Islands）的所有權及芬蘭境內的少數的瑞典民族這兩個問題，曾有一時陷於不睦。其後由國聯出面調解，將奧蘭羣島判歸芬蘭，同時卻規定該地的瑞典人，在文化上仍得享受自治的權利，奧蘭問題，就此解決。至於芬蘭境內約居全人口百分之十一的瑞典人，雖然選了二十餘名議員，出席於芬蘭國會，卻仍然像以前樣，自成一個集團。然而近幾年來，這兩個民族間的嫌隙，業已化除不少。原來集中於芬蘭南部的瑞典人，大部分是屬於小康階級，時至今日，他們已

很肯與其他的資產階級通力合作，形成非常強固的保守勢力，來左右芬蘭的政局了。

經濟上，芬蘭是一個貧瘠的國家，幾乎全靠木材業維持。將遍佈於中區的大湖除外，芬蘭的森林區域佔全境百分之九十以上，而可耕之地，則僅居百分之七而弱。所以芬蘭的食糧，大部分是有待於國外的輸入，不過輸出品卻並不缺乏，如牛油、乾酪、木材、造紙用之纖維原料、紙張等。在全部輸出額中，木材佔半數以上，紙張與造紙用之纖維原料併計，佔全部輸出額三分之一。由於農民黨得勢，芬蘭雖然必需向國外購進食糧，同時卻採取保護稅率，用來保障自己的農業與工業。大戰以後，土地的再分配曾舉行過好多次，俾使農民獲有相當的產業。現在，大規模的農業合作運動，也在進行中了。

在過去期間，英國是芬蘭出口貨的最大主顧，但芬蘭進口貨的最大供給者，卻不是英國，而是德國。例如據一九三〇年的統計，芬蘭銷給英國的貨品，幾佔全部輸出額百分之四十，購自英國的貨品，僅居全部輸入額百分之十四，但芬蘭貨物僅居全部輸入額百分之十二又半之德國，卻供給芬蘭以大宗的貨品，至佔芬蘭全部輸入額百分之三十七。所以英德兩國，是握有芬蘭國外貿易的

主要關鍵的。此外，芬蘭進口貨的唯一的主要來源是美國。至如對於蘇聯，蘇聯邊境諸國，以及斯坎的納維亞半島諸國，芬蘭都只有很小的商業關係。這便是芬蘭不願與隣近各國成立同盟，卻急欲與英德兩國維持親睦的邦交之由來。芬蘭與蘇聯在木材市場中的競爭，對於這兩國的邦交，確有莫大的影響。蘇聯木材區中的情形，如何如何不妙，蘇聯的木材傾銷政策，如何如何卑劣，這類的話，常從芬蘭發出，而瑞典在這點上，倒也不失為芬蘭的一個同盟國家。

芬蘭的常備軍，僅有二萬五千。但此外又有民軍一萬，係由內戰時的自衛軍改編而成。總括一句話，芬蘭近幾年來，政局雖漸臻安定，但一九一八年激烈的內戰與其後的白色恐怖，印象還很新鮮，所以對於目下小康之局，尚不敢為粉飾太平之舉。加以世界恐慌的怒濤，正疾捲而至，使其自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二年間輸出額的金價值，跌去一半有餘。但同時輸入額，差不多也減少四分之三，這樣，芬蘭總算在恐慌期間，以極端緊縮必要輸入品與抑低人民生活水準這兩件代價，換得了一個「有利的貿易差額」。然而貿易的差額雖然有利，藉英國為主要市場這一事實，卻使得芬蘭不得不於一九三一那年，與其他的斯坎的納維亞半島諸國一同放棄金本位制，致其對死守金本



位置的德國之購買能力，大爲減削。由以上的情形，芬蘭之改變其貿易方針，已在意料之中，自從一九三二年英國與其殖民地訂立渥太華（Ottawa）協定以來，芬蘭的貿易方針，尤有非改變不可之勢了。

### 愛沙尼亞

在芬蘭灣對岸，握列甯格勒的咽喉的，是一個極小的共和國，其人口總數僅百萬有餘。這便是愛沙尼亞。愛沙尼亞人係芬蘭民族的後裔，舉凡語言與文化，無一不爲芬蘭式。在全部人口中，愛沙尼亞土著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八，而佔百分之八的俄羅斯人及佔百分之二的德國人，則算是這新興國家的少數民族。這個國家，很明顯的是一個農業國，所以特農業爲生的，幾佔全部有業人民三分之二，而從事工業者，則僅佔百分之十三。輸出品如牛油、醃肉、馬鈴薯、亞麻、亞麻種子之類，但一切穀類品，則不但毫無輸出，倒反有賴於國外之輸入。輸出品的重要主顧，爲英德兩國。輸入品大都來自德國與美國。

愛沙尼亞的民族主義，是現時代的產品。在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以前，這種運動尙未有具體的實現，直到那一年，俄國議會中的愛沙尼亞代表，纔提出請予自治的要求。但這並不是說愛沙尼亞在過去期間，沒有什麼政治史。這一塊土地，整整數世紀之久，是羣雄角逐之場，主人的更迭，已不知有多少次了。十三世紀是丹麥與日耳曼騎士團平分秋色的時代；自十三世紀以後，以訖於十六世紀末葉，爲德國統治時代；繼歸瑞典所有；到了一七二一年，又由瑞典割讓於俄國。自此之後，這個區域遂成爲俄羅斯帝國之一部，由許多次的農民叛變，與沙皇政府極強硬的同化手段，點綴着十九世紀的全部歷史。迨至一九一七年，俄國發生第一次革命，愛沙尼亞的民族運動，也乘時興起。同年七月，國會開幕，擬定就俄國統治下建立自治的愛沙尼亞之計劃，但是緊接着布爾什維黨的革命，愛沙尼亞便宣佈獨立，而俄國政府則解散愛沙尼亞國會，以爲報復。那時，愛沙尼亞的大部分土地，係德籍的大地主——卽所謂波羅的海諸男爵者——所有，他們不願國會之反對，竟自向德國乞援。起初，愛沙尼亞的國家主義者總算是勝利的，因爲布爾什維黨是被逐出勒佛爾了，共和國是正式宣佈成立了。然而隨着這種勝利，卻立即來了一幕悲劇，因爲德國人藉口保護波羅的海諸男

爵的利益把愛沙尼亞的全境都霸佔了去。當訂立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條約時，俄國固然不能不放棄其在愛沙尼亞的主權，但當一九一八年秋季中歐同盟國挫敗，德國人被迫退出愛沙尼亞以後，俄國的勢力，便又立即侵入那個國家。於是芬蘭人起而爲愛沙尼亞人的聲援，而英國的兵艦，也開到勒佛爾，將這個新建的共和國，置於自己保護之下。因有大隊的『白俄』軍援助，愛沙尼亞人卒將布爾什維黨人逐出國境，所以一九一九年『白俄』軍對俄國舉行無效果的攻擊時，愛沙尼亞便成了反赤的後方根據地。同時，非正式的德國軍隊，由戈爾茲將軍 (General von der Goltz) 統率，從拉脫維亞侵入愛沙尼亞，但愛沙尼亞人因有英國人的幫助，終於擊退德軍。愛沙尼亞與俄國舉行休戰會議，時在一九一九年底，翌年，這兩國又在多爾巴特正式成立和約。迨至一九二一年，愛沙尼亞共和國，遂獲得協約國一致的承認。

可是在此以前，愛沙尼亞就已着手於國內問題的解決了。一九一九年，通過一條法令，將向來在波羅的海諸公爵手中的大地產，重行分配，不過賠償地主損失的辦法，則至一九二六年方纔舉行。在新局面之下，農民變成國內的中堅勢力，但同時共產主義，也依然在重要都市中保有巨大的

力量，尤其是勒佛爾——自一九一九年以後，已改名爲塔靈（Talinn），這是俄國貨品的輸出口岸，同時又有鐵道綫直到列甯格勒及莫斯科，其重要可想而知。一九二四年年終，共產黨在這都市演了一次暴動，但沒有成功。自此以後，愛沙尼亞的政府對付共產黨，總是用高壓手段，且爲防備反動勢力起見，特做照芬蘭辦法，編練一隊永久性質的民軍，數額爲三萬名。在政治上，愛沙尼亞與其緊隣拉脫維亞有甚深的交誼，自一九二三年雙方締結條約以來，這兩國各負攻守相助的義務，且共同保持着一個聯合關稅制度。此外，與蘇聯也有條約上的關係，與英國的關係，則更爲密切，因爲在政治方面，愛沙尼亞是幾於完全以英國的意見爲意見的。當一九二六年時，愛沙尼亞從國聯得到一筆借款，用來穩定國幣的價值，所以自一九三一年發生世界恐慌以來，愛沙尼亞卒能與其北隣不同，而繼續維持金本位。近幾年來，統治愛沙尼亞的，是農民黨與資產階級的中央黨的混合政府，而具有相當力量的社會主義者團體，則爲其反對黨。

## 拉脫維亞

拉脫維亞共和國位在愛沙尼亞之南，有一個不凍的大港，名叫里加。說起里加的名字，看報的人們，大概是沒有一個不知曉的，因為這都市，便是近年以來，不斷地散放蘇維埃制度崩潰在卽那樣的新聞之中心。同愛沙尼亞一樣，拉脫維亞也是以農業立國的，所以直接依賴農業爲生的，佔全部人口三分之二以上。在全部居民中，拉脫民族（Letses）佔四分之三，俄羅斯人約佔百分之十四，此外又有相當數目的猶太人與德國人。大部分的人民信奉新教，但信奉羅馬教者，也幾佔百分之二十五，同時希臘教的信徒，爲數亦頗有可觀。因了大戰及大戰後的大混亂，拉脫維亞喪失了的人口，幾爲全數百分之四十。蓋當戰亂之時，向國外走避者絡繹不絕，等到政局平定之後，回來的只有極少數的一部分，而犧牲於戰亂中的實際人數，又大有可觀，故拉脫維亞目下的人口總數，竟連兩百萬也不滿了。經濟上，拉脫維亞也與愛沙尼亞十分相似。主要輸出品爲木材、亞麻及牛油，至如穀類品，則不但沒有輸出，反而需要外國供給。輸入品的主要來源是德國。同時輸出品的主要市場也是德國，其次是英國及俄國。拉脫維亞的工業，曾經大傷元氣，這是因爲一切完好的工業設備，例如大部分的鐵路車輛，不於大戰時被送到俄國去，便在內戰時被毀之故。

像愛沙尼亞一樣，拉脫維亞當中世紀時，有大部分的時期是在德國人統治之下。十六世紀時，曾被波蘭與丹麥所瓜分，到了十七世紀，其中一省，即里伏尼亞，被瑞典所吞併。里伏尼亞於一七一〇年由瑞典讓渡於俄國。泊至十七世紀末葉，拉加里亞（Latgalia）與庫爾蘭兩省，也見併於俄羅斯帝國。拉脫維亞於是在始終對俄國抱着極大的惡感中，度過整個的十九世紀。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之時，拉脫維亞曾有極猛烈的民族復興運動，可是這種運動，卒被俄政府用暴力壓服。大戰發生，拉脫人雖雜在俄軍中服務，卻自成一個團體，不與俄軍受同一的統制，及一九一七年布爾什維黨革命以後，拉脫軍隊遂成爲己國的革命武力。拉脫維亞的民族主義者，是反布爾什維主義的，所以他們在英國的領導下，成立所謂後備軍，與『赤黨』作戰，漸漸獲得北部各地。同時拉脫維亞的議員，也在俄國的全民議會中提出要求，請准許拉脫維亞自主。不料對俄問題尙未了結，在他方面又來了德國人，根據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條約，將拉脫維亞的西南一省庫爾蘭併吞了去，並進一步爲積極的經營，冀將該處化爲自己的殖民地。自德國挫敗以後，拉脫維亞仍不得太平，因爲一九一八年年底，牠既受布爾什維黨的侵入，此後不久，戈爾茲將軍統率下之非正式德國軍隊，俄國

的布爾什維黨與拉脫國民軍間之混戰，又在其境界內開演了。戈爾茲將軍的軍事根據地便是波羅的海諸男爵的巢穴所在的庫爾蘭。總之，拉脫維亞在大戰前後許多年間，實無片刻的甯靜，及借協約國的幫助，將戈爾茲將軍的軍隊及布爾什維黨人統統趕出國境之後，纔漸漸的安定下來，開始整理國內問題。

這個共和國是在一九一八年底正式宣佈成立的。但其第一次國會，則一直等到一九二二年，方纔開成。這個議會與其後的議會，替拉脫維亞造成一個政治特點，那就是政治勢力分化而成爲無數的黨派。歐洲的新興國家，都把比例代表制度，訂入憲法，拉脫維亞也如這樣，其政治的特點，卽由此種制度促成。在第一次國會中，社會民主黨是最大的政黨，佔全部議席三分之一以上。但自此以後，社會主義忽然失勢，其他的政黨聯合起來，共理國是，這使拉脫維亞終於有一個較前穩固的政府。一九三三年的國會，農民黨佔議席的大多數，政府也就由他們包辦。勢力較次的，除前述的社會民主黨外，有保守黨及資產階級政黨，此外又有幾個代表各種少數民族的獨立黨。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有極密切的條約關係，條約中規定雙方必須維持聯合關稅制度，這在我們敘述愛沙

尼亞時已有說及。在戰前構成國土的大部之大地產，已被分配於農民，波羅的海諸男爵的優勢，卒告沒落。所以這個國家的社會與經濟組織，可說與其隣國完全相似。愛沙尼亞是小地產農民所組織的共和國，欲以正統的民主代議制度，應用於建立政府。拉脫維亞也是這樣。然而這種制度，背後並沒有什麼傳統的歷史關係，對於一般民衆，又缺乏堅強的把握能力，所以很少活動的力量。而且，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及芬蘭一樣，其在政治上的措施，又不能不把蘇聯常放在心上。

### 立陶宛

立陶宛在拉脫維亞共和國之南，嚴格的說，算不得是蘇聯邊境的國家，因其極東的疆域，受波蘭極北部分的阻隔，已不能與蘇聯連壤了。我們若參照戰後關於立陶宛疆域的原議，則知立陶宛與蘇聯的隔離，原來是由劃出立陶宛東疆的一個狹小的區域付給波蘭而成，而且這種決議，雖然有深意存乎其間，但也十分顯明，無非以爲就弱小的立陶宛共和國與其強大的東隣間安置一個尖劈，總屬妥當的辦法。自一九二〇年波蘭強佔維爾那省及其都城以來，立陶宛與俄國間的距離，



除極北的部分外又增加了不少然而位於俄波立三國中間的區域表面上雖無問題其實算不得澈底解決，因為對於立陶宛的政治與外交，維爾那問題及立陶宛與蘇聯所由遮斷的區域的所有權問題，仍有巨大的支配勢力。立陶宛的西境，與東普魯士相毗連，故這個國家的進出口貿易，大部分是與德國有關係的。人民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直接賴農業爲生，立陶宛這樣，幾可說是一個澈底的農業國家。輸出品如亞麻、亞麻種子、木材、牛油、豬。最重要的輸入品如煤，其他的礦產品、農業肥料等。在全部土地中，具有耕地的區域幾在半數以上，草原佔四分之一，森林區比較的小。說起宗教，天主教徒佔全部人民五分之四以上，新教徒很少，其勢力範圍，僅限於德國的都市美末爾一處。立陶宛佔領美末爾時在一九二三年，事先曾有大使會議承認波蘭在維爾那的主權一幕，立陶宛此舉，原來帶有幾分報復心理的。

立陶宛與拉脫維亞及愛沙尼亞不同，立陶宛的歷史，對於其現代政治方面的國家主義，是有很大的幫助的。因為立陶宛當十三世紀的時候，原是一個公國，從十四世紀到十五世紀，又來了國威發揚時代，領土自北方的波羅的海起，南達黑海沿岸。但是到了十六世紀，便與波蘭合併，漸漸的

陷於波蘭統治之下，及波蘭王國慘遭瓜分，立陶宛卒落在俄國手裏，這時，十八世紀已垂垂向盡了。現代立陶宛的歷史，如其鄰國一樣，是以參加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開始的。當時立陶宛人起而反抗帝俄，此後數年間，則與鄰國分擔帝俄政府的壓迫。大戰時，德國人從東普魯士侵入立陶宛，建立陶宛附屬國於其地，允許至相當時機，恢復其獨立。因了一九一七年的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條約，俄國不得不放棄其在立陶宛的主權，立陶宛的議會遂乘時提出獨立的要求，繼於一九一八年二月，正式宣佈共和國之成立。接着德國人也退出境外，但立陶宛人於慶幸之餘，馬上就與俄國發生戰事，維爾那失守了，立陶宛至不得不將政府遷至柯夫諾（Kovno），以避俄國的兇鋒。後來，波蘭軍隊於俄波戰爭中攻佔維爾那，但不久又被俄軍逐出。一九二〇年，蘇聯軍隊攻華沙不得逞，舉行總退卻，而坐視維爾那落於波蘭人之手，則心有不甘，於是將那個省分奉還立陶宛。但立陶宛人也不能久領其地，因為這個區域，雖由協約國劃歸立陶宛暫管，但是還沒有出一九二〇年，便被代表波蘭之齊里高斯基將軍（General Zeligowski）統率下的非正式軍隊所佔據。這種侵略手段，到了一九二三年，大使會議竟認為合法，卒將維爾那判歸波蘭。立陶宛政府，自然不肯接受這

決議，所以直至一九二七年止，無日不與波蘭政府在交戰的狀況中，只是因了國聯的高壓，這纔在那一年終止那劍拔弩張的態度。

前面已經說過，立陶宛人自經失了維爾那，便佔據大戰終止時被劃爲自由市之美末爾，藉以挽回一部分的利益，因爲自佔據美末爾後，他們便不愁沒有通波羅的海的出口了。正像一九二三年的波蘭一樣，立陶宛的侵略手段，到了一九二四年，也由大使會議認爲合法，美末爾從此便正式入了立陶宛共和國的版圖。可是立陶宛與波蘭終結下不解之仇，自一九二〇年七月蘇聯與立陶宛成立和約，承認立陶宛對維爾那的主權以來，立波兩國，便交惡至今。而蘇聯與立陶宛間的交誼，所以能比其與其他邊境諸國間的交誼爲深，多半也由於蘇聯對維爾那問題的態度。立陶宛與北隣諸國，也有甚深的交誼，自一九二四年以來，就與拉脫維亞及愛沙尼亞兩國締結條約，成爲聯合關稅制度中的一分子。但對於波蘭，則如前面所說，親睦已成爲絕對的不可能，立陶宛人對波蘭所抱的敵對態度，以及他們收復立陶宛共和國歷史的國都維爾那的願望，實支配著立陶宛的政治。在一九二六年以前，立陶宛曾有一個時期在左派政黨聯合統治之下，一九二六年對蘇聯成立不

侵犯條約，便是由於這個政黨聯合的主張。但此後不久，左派便被武力的古迭達所推翻。在伐爾特馬拉教授（Professor Valdemaras）領導下的新政府，於焉成立，除強烈的民族主義意味外，還帶着極強的學者政府色彩。然而這個政府本質地是依賴武力產生的，所以伐爾特馬拉教授的統治，卒變成獨裁政治。自從教授政府解體以後，政權便落到各種民族主義黨派所合組之政黨手裏，這政黨並含有不少農民黨員，而社會民主黨與代表各種少數民族的政黨，則為反對黨的中堅分子。

## 四 波蘭

波蘭與蘇聯兩國的邊界，是一條很長的弧綫，北面自幾與立陶宛的北境相平行的一點起，迤邐向南，以訖於比薩拉比亞的北境。除伯利彼脫沼地就這條弧綫的中部形成了天然的要隘外，俄波兩國間的境界，假如從地理的觀點來看，幾乎沒有一處不是出於純粹的人造，沒有河流，沒有山嶺，甚至至於比較可觀的小山，也付缺如。其在南部，這條分界綫穿過一個高原的中部，憑空將烏克蘭與東加里西亞（Galicia）高地分成兩部。而北部的分界綫，則將綿亘於烏拉嶺及北海間的平原劃而爲兩，這也是毫無理由的。又如就人種言，俄波兩國的界綫，亦與真正的區分方法不合。蓋在交界區的北部，白俄人種的勢力既深入波境，直達維爾那附近，而在更南的區域，即伯利彼脫沼地四周，非常混雜的人種中，白俄與烏克蘭人又佔其大部，波蘭人倒反居少數，即在遠越界綫而西的地點，亦呈此種情形。只有在極南部分，邊界上的波蘭人纔大有增加，然以視魯德尼亞人，卻依然瞭

乎其後，雖則就文化上言，波蘭人總算是加里西亞區的主人。所以加里西亞的都城倫堡（Lemberg），真像屹立在魯德尼亞人住區中的波屬孤島，而自該處起至邊界止的整個區域，即波蘭人與魯德尼亞人雜處的區域，則只不過是烏格蘭的俄羅斯人與捷克東部的魯德尼亞人的居間地帶。總之，在新興的波蘭，即使依照波蘭人自己的統計，各種少數民族的總數也多至全部人口百分之三十以上。列如烏克蘭人與魯德尼亞人共佔全人口百分之十四，白俄羅斯人佔百分之四而強，德國人（居住地在西部波蘭）佔百分之四，猶太人佔百分之八。

這樣，波蘭境內的俄羅斯人與烏克蘭人，合計不下七百萬人。這個驚人的數目，一部分固然是由於和會中各協約國的態度，但與一九二〇至二一年俄波互訂境界時的環境，也有相當的關係。這就是說，大戰終止後俄波間互訂之里加條約，使波蘭的界綫，儘量向東推進，較之凡爾賽宮的協約國代表所訂定的，還要東進不少。蓋波蘭自藉協約國之助，擊退進逼華沙的俄軍以後，看見蘇聯的軍事與經濟，都陷困境，以爲此乃擴張領土千載一時的機會，無論如何不應放棄，結果卒獲有今日之領土。在凡爾賽和會席上，波蘭曾提出恢復歷史上的疆域之要求，這個要求如果實現的話，則

波蘭所統治的少數民族，必有遠過於今日者。但凡爾賽會議對付這要求的態度，卻使波蘭大失所望，獨有法國的政治家，企圖在東歐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一方面可以對抗蘇聯，另一方面又可以威脅德國的東疆，故竭力幫波蘭之忙，但終無效果。對凡爾賽感到絕望的波蘭人，其後卒因法國的幫助，將進抵華沙近郊的俄軍擊敗，於是抓住這個機會，作繭自縛的造成一個最困難最危險的少數民族問題。東歐一帶，民族雜處，少數民族問題固所難免，但問題之嚴重性，則未有若波蘭之甚者。自一九一八年以來，新興波蘭在少數民族問題方面的糾紛，幾於記不勝記，推厥原因，皆由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的波蘭人，欲積極的同化其統治下的少數民族，來完成國家的統一之故。每發生一次糾紛，照例到國聯的少數民族問題委員會打一場官司，而那個委員會的判決，則照例左統治者而右少數民族，和約中保障少數民族的條文，如同虛設。也是猶太人合當有難，一九三三年的波蘭，竟忽然變成壓迫猶太人的勇士，恰與對猶太人施行更慘酷的壓迫之國社黨支配下的德國，互相輝映。查波蘭境內的猶太人，總數不下三百萬，而且，沿德波邊境一帶地方，尤其是上西利西亞，波蘭的猶太人與德國的猶太人，有着很密切的聯絡。

自一七九五年遭受瓜分的慘禍以來，整整過了一百餘年，波蘭人纔從大戰，找到了恢復主權的機會。拿破崙確曾復活華沙公國，可是他一手扶植的新波蘭，馬上就被一八一三年的和平協定所掃盪，三個顯赫的帝國，各分得波蘭的一瓣。華沙以及大部分的區域，歸俄國所有，奧匈帝國得加里西亞，德國得波森。在這其間，只有在奧國的統治下的加里西亞，獲得某程度的自治權。而波蘭人之衆多，亦首推這個區域，因為那裏的居民除魯德尼亞種農民外，幾全爲波蘭人。大戰爆發，波蘭人分頭投入東歐三強國的軍隊中効勞。但俄羅斯統治下的區域，立即被德奧聯軍所侵入，自一九一五年以後，波蘭全境便在中歐同盟國繼續佔領之下。同盟國知道波蘭的平靜，關係他們的前途實很重大，所以到了一九一六年，德國與奧匈帝國遂共同向波蘭聲言，如波蘭能永遠効忠於同盟國，戰後定以某種形式的自主爲酬。翌年，在同盟國監督之下，有波蘭攝政院的設立。自此以後，波蘭的國家主義便分成很顯明的兩派，在國內的一派，希望藉德國的勝利，實現自主，而客居巴黎的波蘭獨立運動委員會，則寄其希望於法國。大戰後被奉爲波蘭的迭克推多的畢爾蘇基上將（Marshal Pilsudski），便是屬於前一派。當一九一四年時，他率領早年在加里西亞練就的波蘭軍，攻進



俄國的領土。一九一六年，他還是傾向於同盟國。可是那一年的七月，卻忽然與統治波蘭的德奧當局發生意見，轉與協約國互通信使。一面，他卻又接受同盟國的勸駕，在其支持下的波蘭國務院充任陸軍部長，着手組織秘密軍事機關，替自己在一九一八年統一全國的大事業奠定基礎。然而沒有多久，他就與同盟國鬧翻，被捉將德國去，嘗禁閉的滋味，一直等到大戰停止，纔蒙德國的革命政府釋放。回到波蘭，立即被選為國家的元首，行使迭克推多的大權，原來軍功煊赫並具有豐富的革命事業的畢爾蘇基，已成爲那個新興國家的當然領袖了。

大戰後數年間，波蘭的政治史，極紛雜錯綜之致，這裏似可不必加以詳敘。總之，在當時畢爾蘇基執政一日，波蘭的邊界便一日不能確定。蓋自中歐同盟國失敗，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條約即已完全失效，因之俄波兩國的境界，也就失了正式的協定。加以烏克蘭與俄羅斯的關係，尙未穩固，於是在東部加里西亞，由彼得留拉（Petliura）領導，有創造獨立的烏克蘭魯德尼亞聯邦之企圖。這廢一來，在一九一九這一年中，幾於無一日無戰事，而且這種戰事之混亂的狀態與多方面的牽涉，幾有令人難於置信之概。但蘇聯的政權，日漸穩固，因之交戰國也漸漸地減至兩個。在一九二〇年

初期，波蘭開始向蘇聯進攻，深入烏克蘭內部，確實佔領基輔。這種侵略行爲，適以促成蘇聯內部的團結，故俄軍反攻之後，便着着勝利，卒攻抵華沙的近郊。但波蘭人的舉國一致的精神，也被俄軍反攻的勝利所喚醒。而且，他們有的是救兵。法國首先對波蘭政府接濟軍火，並派遣大批軍事顧問，因爲法國知道波蘭的覆亡，對於自己在凡爾賽宮中所努力建立的歐洲體系，無異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又如反布爾什維克空氣十分濃厚的英政府，也站在波蘭方面，唯其援助波蘭的提議，則因工黨與社會主義團體以總罷工相恫嚇，卒歸打銷，所以英國與法國不同，只給波蘭以消極的援助。但是法國的援助，已儘使波蘭人逐退俄軍。蘇聯所以在里加會議中不得不承認不合理的分界方式，其關鍵卽在於此。

自此以後，俄波兩國間的關係，與其說是確實的和平，毋寧謂爲武裝的休戰。國家主義意味極其強烈的波蘭，其政治的支配者，又爲一種特殊階級，他們最怕共產主義的勢力侵入民間，同時又明晰地感到國內含有心懷怨望的少數民族之危險，所以這個國家是不能不對蘇聯永遠抱一種恐懼心理。還有因蘇聯的敗退而繼續保持其政治計劃的法國，一直到前數年爲止，唯知與波蘭以

外交上及財政上的助力，俾鞏固其東部的與國的力量（最近德國的軍國主義復活，法國與波蘭又有重新聯合之勢），這也是俄波間關係永遠不能緩和之重要原因。法波兩國的條約，是一九二一年訂立的，此後波蘭為上西利亞問題與德國發生爭執，就幸虧有法國幫忙而獲得勝利。至若對俄的外交關係，則一直等到一九二四年，方纔建立，而且這種關係，極不穩固，即在業已訂過不侵犯條約的現今，波蘭還是像一個戒備嚴重的兵營，對於俄德兩國的國內情形，帶着疑忌的心理，予以密切的注意，猶如防備國內心懷怨恨的少數民族一般。然而波蘭與羅馬尼亞的感情可不壞，自一九二一年以來，這兩國就成立同盟，這是因為羅馬尼亞爲了比薩拉比亞問題需要波蘭援助之故。所以羅波兩國，無異是法國隔離政策的工具，其主要任務，即爲防堵俄國的病菌侵入西歐各國。

如上所述，可見波蘭東疆的政局，不安定已極；這便是新興波蘭的統治階級始終抱持強硬的黷武態度之由來。隨着大戰的終止，俄波兩國便陷於連年的衝突，其後衝突總算獲得解決了，但這種解決之毫無原則作根據，則不容諱言，所以俄波兩國，能互訂條約，能簽字於不侵犯協定，但終不能化除那解決所包含的主要癥結。波蘭的二十五萬的常備軍，與夫巨大的軍費，從波蘭目下的環

境及歐洲的政治現勢而觀，其實不足爲奇，在這樣的局勢中，那裏可以沒有防備呢？而且波蘭的問題，尙不只限於東面。北方的但澤問題與波蘭「走廊」問題不必說起，卽南部之各種不同的民族的雜居一處，亦爲波蘭之一大隱憂。除人種有問題以外，南部的疆界，也大有問題，因爲那裏的疆界，既不以國情爲準，也不以天然的界綫爲根據，甚而至於與經濟區域的統一性，也背道而馳。波蘭這樣，眞像放在東部捷克的魯德尼亞人及烏克蘭的魯德尼亞人中間的一個尖劈。在德森 (Teschen) 區域內，都城與維斯杜拉河 (Vistula) 的上游屬於波蘭人，但緊隣的值錢的煤礦，卻就不屬於波蘭人而爲捷克人所有，不知當初怎的會定下這種奇怪的界綫！但這還算不得什麼，波蘭西部的疆域，其離奇而不合於理，說起來纔叫人難以相信。至於但澤自由市的附近與上西利亞，那只好採用沒有永久保障與澈底解決的臨時辦法了。

在大戰剛纔終了之時，上西利亞問題真可以說是最難解決的領土問題了。原來這個區域，蘊藏甚富，煤鐵以及其他的礦產，應有盡有，在大戰前，都由德國人經營，但住民則波蘭人也有，迨至戰後，波德兩國遂爲那塊廣大而沒有確定的主人的區域，發生爭執。協約國的政府於是命令該地

的住民，舉行一次全民投票，來解決這個難題。但當大多數票權贊成將該地併入德國之時，那個問題忽又移到國聯的理事會去了。國聯理事會這樣想了一個圓通的辦法，那就是：並不以上西利西亞判歸任何一造，卻根據各重要城市或各行政區之投票數額，就這個工業區域的中部，劃一條顯明的界綫，一邊屬德國，一邊屬波蘭。但此種計劃尚未實現，波蘭便又施展其對付維爾那問題的故技，由柯凡提率領的波蘭的非正式軍隊，突然佔領上西利西亞，其意顯然欲藉既成的事實，來左右國聯的判決。但國聯對於全民投票的結果，還不敢一概抹煞，所以波蘭人也終於不能遂其掩有全境的願望。不過大部分煤礦，則到底落於波蘭人之手（數目居六十七之五十三，產量居三千一百萬噸之二千四百萬噸）。因此波蘭遂成爲歐洲重要產煤國與煤出口國之一。此外，波蘭又獲得三分之二以上的鋅礦與鉛礦，及整整一半的重要鋼鐵工業。然而這種調解，對於少數民族問題，卻絲毫無所解決。德屬部分的波蘭人，在五十萬以上，波屬部分的德國人，則竟達三百五十餘萬，所以在表面上，波蘭好像佔了德國的便宜，但我們不要忘記，上西利西亞這個工業區域，是德國工業組織中的重要因素，當舉行全民投票時，波籍的人民也多左德國而右波蘭，因爲他們希望在德國統治

之下，享受更穩固的政局與更高的生活標準。因為波蘭之工資很低，而其社會制度，又很幼稚，勞動者的經濟觀念，遂戰勝了他們的民族心理。同樣，當東普魯士的馬林威德（Marienwerder）與愛倫斯坦（Allenstein）兩邊區舉行全民投票之時，也有無數的波籍人民，贊成繼續受德國的統治，而反對併入新興的波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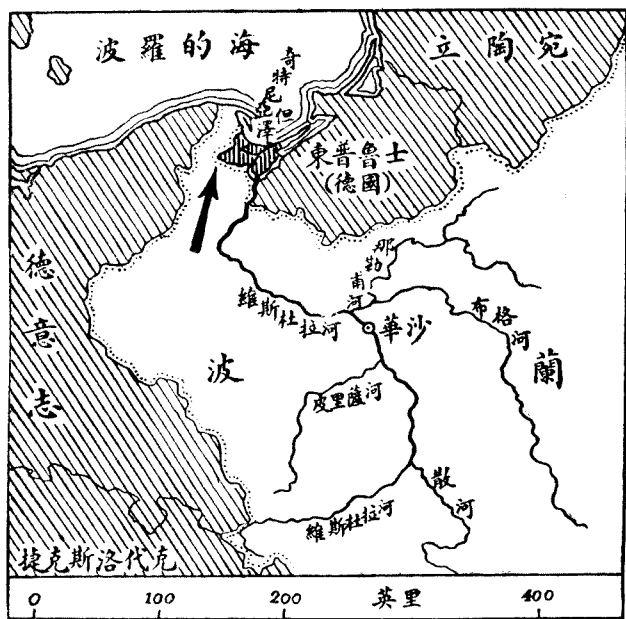
除上西利西亞以外，通往但澤自由市之波蘭走廊，也形成了波蘭西境的重要問題。這個狹長如帶子一般的區域，供給波蘭以一條通波羅的海的路。但是這樣，就得穿過德國領域，將德國最重要的部分東普魯士，與德意志聯邦的其他部分，截而為兩。主要的鐵道綫，自東而西的通過這塊波蘭的狹隘的土地，所以從東普魯士坐火車往其他的德國各部，都得經過波蘭走廊。於是，不但貨物的轉運，手續麻煩異常，就是旅客也深感不便。這是很顯明的，當德國的貨品以純粹的國內貿易性質，通行於東普魯士及德國的其他部分之間的時候，斷乎不能忍受波蘭的高率關稅。而欲避免這種關稅，則只有使貨物都從海道往來，或請波蘭人給與火車的自由通行權，除此以外，便沒有其他的辦法。這個問題，因了門窗緊閉的火車可在波蘭走廊中自由行駛這一辦法，總算獲得不澈底的

解決。可是關於貨物與旅客的移動，仍不免常常發生糾紛，而麻煩到極點的邊界制度，遂替德波兩國種下了永久的惡感。

除此以外，但澤自由市的自治政府之地位與權力，也為不斷的糾紛之因。這自由市及其附郭一帶，合組為一個自治邦，受國聯的直接監督，但其郵政及某幾種事務，乃至於關稅制度，則都與波蘭合併。但澤本是一個德國都市，且其民選政府的狀貌，亦幾全為德國式。所以向來就與波蘭常常發生衝突，在國社黨未得勢前，國聯維持關於但澤自由市的不甚妥當的決議，即已甚感不易。波蘭原無時無刻不想收但澤為己有，所以對於現狀，自然不能滿意。曾經有一時期，波蘭人用盡種種機謀，企圖消滅但澤的名義上的自由權。及這些機謀都告失敗，他們遂開始就波羅的海海岸自闢一個新港，地點靠近但澤，卻坐落在波蘭走廊的境域內。這新港便是奇特尼亞（Gdynia），如今業已工竣開幕，致但澤的國外貿易額，大受影響。因為但澤人自被波蘭走廊截斷與德國主要部分的聯絡以來，其與西區的關係，已不能若先前之密切，而與東普魯士的貿易，則以必須經過人造性質的政治界綫之故，也有就不盡的困難，所以說起波蘭西部的糾紛與錯雜的問題，我們必須把但澤也算

進在內纔是。

即就波蘭走廊的本身而論，其地位也不見怎樣穩固，因為走廊的北部，人民說波蘭話的誠然居大部分，但是到了南端，就有一個操德語者的勢力圈，橫互其間，沿維斯杜拉河流域及勃朗堡（Bromberg）以西一帶，便是這些操德語的人民的住區。而德國領土之被包於走廊內者（按此種領土名曰 enclaves），又屬不少。這種情形，便使德國人無法自安於現今的局面：國境給割裂



波蘭走廊



成兩個大小懸殊的部分，廣大的農業區東普魯士，給打進了經濟孤立的地位，這豈是德國人所能繼續忍受的？所以波蘭走廊問題，加上西利西亞問題，再加上了與此兩問題有連帶關係的但澤問題，都是德波兩國的和平而穩固的邦交的致命傷，尤其是在激烈的國家主義重復在德國得勢之今日。一九二五年的德波仲裁條約，對於兩國間的恐懼心理，曾不能化除些許，而新興波蘭的西疆，一如其東疆樣無日不在戰事準備之中，也就不足為怪了。

在經濟上，波蘭是一個矛盾的國家。領土的一大部分還沒有受過經濟的開發，但是同時，卻儘多工業與人口都非常發達的中心區域，尤其是在西利西亞及戰前奧屬波蘭一帶。這些區域，都給波蘭的新境界，截斷了與他國在往昔時候的聯絡，且被劃入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受該國的政府之統治。從大體上說來，波蘭可說是一個農業國。可耕地帶幾佔全面積的一半，牧場幾佔五分之一，剩下的部分，又含有不少的森林區。所以波蘭的輸出品，是大量的農產品，大量的肉與蛋，以及大量的木材。謝謝從德國霸來的領土，波蘭於大量的農產品外，並輸出大量的煤鐵。又棉毛織物，也有巨額的輸出。並因國內出產甜菜，故糖之輸出亦不少。波蘭的輸出品，以但澤與奇特尼亞為其適當

的輸出口岸，經過波羅的海，銷行於西歐各國，但因受自然形勢的影響，波蘭大部分的輸出品，卒從德國得到一個極自然的市場。同時波蘭的大部分工業用品，也從德國得到一個極自然的供給者。不管德波間政治上的惡感如何深刻，貿易還是大規模地進行着，波蘭西部新疆界之爲貿易必經之路，於此可見。然而政治上的惡感，以及波蘭人欲躲在堅厚的關稅障壁背後建立自己的工業之願望，卻終於引起德波間商業關係的不斷的衝突，自一九二五年以來，這兩國幾於無時不在關稅戰爭之中。在這其間，固也曾有過幾次找求圓滿的解決之磋商，可是都無結果。這幾次磋商的失敗，以及邊界上之始終不變的經濟報復手段，對於東普魯士以及上西利西亞的德屬部分與波屬部分境內的雜居一處的德波人民，都是致命的打擊。固然，就上西利西亞的本身而論，關於通過新設的邊界的內地貿易，已有臨時辦法之訂定，大部分並已見之實行，貨物在邊界的轉運，也已獲得相當的自由；要是沒有這些，上西利西亞的工業便無法維持。但上西利西亞大部分的貿易，是與國外市場有關係的；自這個區域被劃成兩部，不自然的疆界兩邊形成了絕不相同的社會狀態與經濟情況以來，其國外貿易與生產效能，俱因之大爲減色了。

前面說過，波蘭大部分的區域，尚未受過經濟開發，然而這個國家卻有極大的經濟發展可能。因其自然富源，如煤、鐵礦、木材區、肥沃的耕地，無不臻於上等，而煤油的產額，又頗可觀，除供自己的消耗外，並有巨大的剩餘可供輸出。至其所以不能達到經濟發展的目的，則適當的交通工具的缺乏，實為最大原因。以波蘭領土之廣，人口發達之速，而鐵道卻一共只有一萬一千哩，以視土地僅為波蘭十二分之一而強之丹麥，平均每十方杆有一哩鐵道者，波蘭之平均每三十方杆一哩而弱，真少得可憐了。而且我們不要忘記，波蘭的鐵道綫當敷設之時，本不是替波蘭着想，而是為三個不同的國家着想，所以對於波蘭現今的領域，極不適用，故舊有交通設備之改革，與夫新鐵路綫之敷設，遂成為波蘭最迫切的需要。假如波蘭能得到一筆資本，以其大部用於增築鐵路，那準會收得莫大的利益，因為以波蘭遼闊的領域，鐵道綫無論如何不至於會有被公路綫搶去地位之危險；而使波蘭具備適當的公路綫，是一樁比具備適當的鐵路綫更化錢的事業。

可是在現今的情形下，波蘭要獲得一筆增築鐵路的資本，固屬毫無希望，即退一步而言，改革鐵路綫的資本，也非常難籌。因為波蘭的人民，既然窮到不能利用己國的自然富源，來助成這種盛

業，而國外的投資家考究債務者的鐵路財政及其政局前途，又似乎太仔細一點，像波蘭那樣的新興國家，他們那裏肯冒昧投資？所以現今的波蘭，是只能自安於原有的鐵道綫的，如果能够利用自己的自然富源，或從法國那樣的國家，得到一筆政治意義的國外借款，造起一條極短的鐵路，那便要算是意外的收穫了。可是缺乏充分鐵道的波蘭，幸而水道交通卻異常便利。不過波蘭無論如何是個需要外力幫助的國家；正像有些國家一樣，如不欲促成自己的經濟發展則已，否則，就非舉借大批外債不可，至少在現今的政治制度下是如此。

波蘭的政局，真可說是極紊亂之致。畢爾蘇基上將的擁護者，組織所謂無黨分子同盟，在議會中佔據二百四十七席，因此握得了對議會的支配權。而在這強大的畢黨對面，則為一羣勢力比較薄弱的政黨，上自佔據六十二議席的保守的國家民主黨，及四十八議席的農民黨起，下訖代表各種少數民族的許多獨立政黨，而如共產黨，雖然在大多數的區域內，已被完全壓服，但也佔得了極少數的議席。正式的社會黨，在議會中所佔的名額為二十四，此外又有一些為工黨與社會黨所合組的政黨，雖然內部意見十分紛歧，也有少數會員，列席於議會。總之，波蘭的糾紛的政局，其大原因

即在畢爾蘇基個人，原來畢氏在從前革命的時候，係社會黨的領袖，到了現在，卻一變而爲超乎左右兩派的變態分子。一方面，他受着極端的保守分子的反對，而在另一方面，社會黨亦與他結下不解之仇。至畢氏個人，則在兩者之間彷徨不定：利用擁護自己的大多數議員，來支配國家呢？抑還是在這議會事務進行不順的時候，直捷爽快的施行獨裁政治呢？晚近以來，畢氏曾捕捉反對黨的大部分領袖，加以監禁。

波蘭的憲法，訂於大戰剛纔終了之後，故其性質是得乎中庸之道的，一方面，以比例代表制爲根據，有民選議會之設立，另一方面，卻又設立一個對議會與政府俱有監督權之特殊機關，用來限制議會的權力。這種制度的創立，尤其是比例代表制的採用，使波蘭在大戰後數年間，無法建立健全的政府，因爲當時黨派叢起，各代表特殊利益或抱持特殊見解，互相傾軋，紛囂喧嘩，莫衷一是。這種情形，便是一九二六年五月，畢爾蘇基的古迭達的由來，自此以後，畢氏遂掌握着迭克推多的大權。然而那時候的畢氏，還不算做一個絕對的迭克推多，只想修改憲法，規定當國家有緊急事變時，得以明令擴大總統的行政權限，並賦給總統以立法權。這麼一來，波蘭的議會制度，雖略有變化，

總算廣續下去。但黨派的分立，則到底以古迭達的影響，而大改其面貌，畢爾蘇基的朋友，卒在議會中佔得顯明的大多數。不過就無黨分子同盟的內部而論，卻也並不怎樣統一，黨員並不同照一個確定的方針進行，卻分成無數互相疑忌與自有目標的小團體，共在畢爾蘇基領導下，形成波蘭的最大政黨而已。享受波蘭的救主的榮號的畢爾蘇基，暫時自不患無操縱大多數黨員的魔力，但一旦畢氏喪失其統一能力，則波蘭的政局，必將重返於一九二六年以前的情狀，這大概是可以斷言的。

畢爾蘇基之退出社會黨，使波蘭的社會主義的勢力，大為減削，而波蘭的政府，也藉犧牲社會主義者，來完成壓平共產主義的事業。自共產主義屈服於高壓力以來，勞動階級的憤激的呼聲，也隨之而沉寂。當時常有波蘭即將發生無產階級革命的風說，都出共產黨的捏造，原來波蘭的共產主義，雖然在工業勞動者中間佔有強固的勢力，但暴動卻又很難獲得成就。原因是非常簡單的：波蘭的大工業區，都在德奧兩帝國的戰前領域內，如上西利西亞、德森、及其他的區域，皆與華沙相距甚遠，所以勞動階級的暴動，大有不能與其他區域取得聯絡之苦，而尤感困難者，則為都市的佔領，

這就是說，暴動者很難奪得波蘭的統治機關。倘使蘇聯於一九二〇年之役佔領華沙，波蘭也許早已圈入共產主義的勢力範圍。但從現今的情勢看來，則波蘭內部的革命，似很少成功的希望。





## 五 羅馬尼亞

蘇聯鄰國中的最南一國，與蘇聯的西境相毗連的，是強大的羅馬尼亞。因大戰後領土重新分配的結果，羅馬尼亞的面積與人口，都增加一倍以上。羅馬尼亞根據和約所規定，從奧匈帝國獲得廣大的德蘭斯斐尼亞高地，與肥沃的巴納特及布柯維納（Bukovina）兩農業區。又藉大戰的機會，攬邊省比薩拉比亞為己有，這個區域的所有權，如今依然是蘇聯與羅馬尼亞兩國間的爭執的焦點。除此以外，又在大戰時完成對多布魯加（Dobruja）的佔領，這是沿黑海岸的一個區域，北自多腦河的入海處起，南訖布加利的瓦爾那（Varna）止。所以今日的羅馬尼亞，其人口實為東南部歐洲諸國之冠。雖然新興的南斯拉夫王國，得戰前的塞爾維亞加入，致人口大為增加，但以視羅馬尼亞，仍不免瞠乎其後。

當然，羅馬尼亞既獲得這許多新領土，便不能不有許多少數民族，受自己的統治。羅馬尼亞的

全人口爲一千八百萬，羅馬尼亞人差不多居其一千三百萬，換句話，約居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但剩下的人口，卻就有種種不同的國籍。就中以住在德蘭斯斐尼亞的馬札兒人爲最多。自羅馬尼亞的疆域，向西進展，不僅囊括德蘭斯斐尼亞高地，且又掩有爲自北到南的交通關鍵之平原邊界的都市與鐵路綫後，在羅馬尼亞統治下的馬札兒人，乃益有增加。與馬札兒人同以德蘭斯斐尼亞爲其主要住區之德國人，約計一百萬，猶太人數亦如之。又住在東部的俄羅斯人與烏克蘭人，爲數亦衆，尤其是在尚在爭執中的比薩拉比亞。此外又有很多的布加利人與土耳其人，大部分住在多布魯加及其鄰區，而在北部，靠近魯德尼亞人的邊界，則住有相當數目的捷克人與斯洛伐克人（Slovak）。羅馬尼亞的少數民族問題，這樣，是非常複雜的，可是還不至於像波蘭那樣難於解決。因爲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以德蘭斯斐尼亞與比薩拉比亞爲最，在這兩區域外的少數民族，就都沒有怎樣堅強的團結力。固然，德國人與馬札兒人，業已各自組成一個政黨，布加利人也有一個小規模的政黨。但人數衆多的魯德尼亞人與俄羅斯人，就從來不曾顯示過組黨的能力。且民族的差異，每易因宗教信仰的差異之同時存在，變成更加顯明。羅馬尼亞大部分的人民，皆信奉俄羅斯的正教。但

希臘教與天主教，也各有一百五十萬的信徒，信奉新教者，亦與此數相差無幾，至於約共一百萬的猶太教徒，則從上文就可以看出了。

羅馬尼亞以小小的基業開始，結果擁有現今的版圖，經過可說是很簡短的。其立國的歷史，始於土耳其舊屬地摩爾達維亞（Moldavia）與瓦拉幾亞（Wallachia）兩省之獲得自治，繼以兩省的合併，一直到一九一二至一三年巴爾幹戰爭爲止，羅馬尼亞的國土，便是那兩個區域所構成的。在一八五六年獲得自治，在一八六一年完成合併的摩爾達維亞與瓦拉幾亞兩省，到了一八七七年，卒與土耳其脫離，宣告獨立，而獲得一八七八年柏林條約的承認。

此後，羅馬尼亞因有鉅大的自然富源足資憑藉，國力漸臻充裕，自靠近德蘭斯斐尼亞邊界的煤田開發以來，羅馬尼亞的財富，益有突飛猛進之勢。然而農民卻還是異常貧苦，有許多竟一點土地也沒有，而少數大地主手中的土地，則佔全境的大半。因此到了一九〇七年，便發生一次嚴重的農民暴動，而且要求改革土地所有制度的呼聲，一直到大戰前數年間，還常有聽到。一九一二年第一次巴爾幹戰爭，當其他的巴爾幹諸國聯合起來，攻打土耳其時，羅馬尼亞始終保守中立，然而事

後要求割讓土地，却並不落後。這次戰爭的結果，羅馬尼亞從布加利亞得不少土地，領土向南發展，至多布魯加附近。及戰勝土耳其的巴爾幹同盟國爲分配勝利品問題而發生裂痕，羅馬尼亞加入反布加利的團體，造成第二次巴爾幹戰爭，羅馬尼亞人於是乘這機會，佔領多布魯加的南部，等到戰爭停止，和約成立，遂正式領有其地。

在大戰期間，羅馬尼亞起初尙保守中立，對於協約國及同盟國所提出的條件，大有無所適從之苦。迨至一九一六年，因協約國允許事後以奧匈帝國的德蘭斯斐尼亞與巴納特爲酬，羅馬尼亞感恩圖報，卒加入協約國方面，而與其舊敵布加利二次相見於疆場之上。於是同盟國也劍及屣及，出兵攻打羅馬尼亞，以一九一六年底，侵入羅馬境內，不久並佔有全境。許多煤油井便做了此役的犧牲品，因退卻的協約國軍隊，爲使煤油井不落於敵手起見，輒加毀壞。羅馬尼亞至此，已完全失掉戰鬥能力，一九一七年底，遂接受德奧兩帝國的休戰條件，繼則被逼簽字於專斷和約，坐視大好邊疆落在人手，而無如之何。德蘭斯斐尼亞周圍的一帶土地，讓給奧匈帝國，一九一三年奪自布加利的土地，物歸原主，而北部的多布魯加，亦在聽候同盟國的處置。然而當一九一八年德奧聯軍

被逼退出羅馬尼亞之時，上述的條約，卻立即喪失效力。隨着德國抵抗力的消滅，羅馬尼亞終於恢復擴張領土的權利。然而非等再歷一次戰爭之後，這個問題尚不能完全解決。原來當一九一九年時，羅馬尼亞人長驅而入匈牙利，並一度佔領布達佩斯。武裝與領土兩俱不全的匈牙利，只好對戰勝國表示屈服，戰後的疆界，於焉大定，而羅馬尼亞人亦從此可安然的轉移其注意力於新領土的管理了。

除少數民族問題以外，最需要迫切的注意的，是土地問題。遠在一九一七年，土地制度的改革，即已略具規模，因為那時曾通過一種土地法，規定大地產的沒收與沒收後的損失補償。自大戰結束以後，這種改革計劃，逐漸施行，一直等到大部分的土地分配給農民為止。所以現今的羅馬尼亞，本質上是以農民為基幹的國家，全賴輸出大量的穀類品、木材、牲畜、肉類，來維持國計，雖則在貿易差額上，煤油的地位亦頗重要。在全面積中，可耕之地約佔百分之四十四，草地約佔百分之十四，森林區約佔百分之十五。最肥沃的農業區，一部分在這個國家的最初根據地摩爾達維亞與瓦拉幾亞，一部分則在巴納特、多布魯加、比薩拉比亞境內。至德蘭斯斐尼亞高原，土地就比較的礠瘠，人口

也比較的稀少。不過越高原而西，則又是一個廣大的平原，適於耕種與居住了。瓦拉幾亞省沿多腦河一帶，尤其是不加勒斯德（Bucharest）附近，如今依然是羅馬尼亞國中人煙最稠密的區域。但在割自奧匈帝國的北部新領域以及西部的巴納特，人口也相當的繁密富庶。

羅馬尼亞的政治，如今還是受土地的支配。自一九一九年起，到國王專政的現時止，其間政局的約略經過是：在布拉夏奴（Bratianu）領導下的自由黨（布氏領導自由黨，直至一九二七年亡故時為止）與在曼尼阿博士（Dr. Maniu）領導下的農民黨輪流掌握政權，而有農民爲其後援的阿佛勒斯各將軍（General Averescu）亦曾一度組閣。可是對於土地問題，以及德蘭斯斐尼亞與其他各地之少數民族問題，則因爲有王朝的糾紛從中作梗，迄未有圓滿的處置，而所謂王朝的糾紛，則完全是加羅爾王個人所引起，他是保持歐洲霍亨索倫王家的王位的最後一人。

羅馬尼亞戰後的政治，自局外人看來，真極糾紛錯雜之致。原來戰後的羅馬尼亞，國境大擴，於是土地的澈底改革，與全民投票制度之頒布，成爲公認的需要，遂使舊來的政黨，都呈土崩瓦解之勢，而新起的政治團體，則幾如雨後的春筍。在具有歷史的政黨中，自由黨猶如僅存的碩果，但自大

戰結束後，曾有一時期，只能居於在野黨的地位，看其他的政黨，輪流盤據中樞。德蘭斯麥尼亞人 韋達佛福特 (Vaida-Voevod) 所組織的聯合民主黨，登台沒有多久，便不得不把政權轉讓於阿佛勒斯各將軍。阿氏一方面得傳統的保守分子的贊助，同時又受農民的熱烈的擁護，至其所以能利用這兩種不同的勢力，莫明其妙的造成自己的高位，則完全由於以實施土地改革為號召。但不等這種改革成為事實，在布拉夏奴領導下的自由黨，便運動國王罷黜阿氏的內閣，閒散已久的自由黨，重復登台，而實施戰後羅馬尼亞的新憲法，與夫以高程度的獨裁方針統治國家，則為他們這一次登台後的政績。自由黨內閣的壽命，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六年，在這期間，大部分的在野黨一致聯合，對內閣為不絕的攻擊，國內時呈不安之象，比薩拉比亞接連的發生了幾次共產黨的暴動。

一九二六年的羅馬尼亞，自加羅爾皇儲 (Prince Carol) 出人意料地表示情願放棄王位的承繼權之後，政局就頓時緊張起來。因為一般的在野黨，不贊成國王維持自由黨的專政，所以對於加羅爾皇儲的行動所造成的局面，堅加否認。同時自由黨政府，則刻意模擬法西斯蒂的辦法，通

過一條非常選舉的律令，規定任何政黨苟在大選中佔有百分之四十的票額者，即得在議會中佔百分之五十的議席，藉使該黨的比例，超過於分得剩下的議席的政黨。這種辦法，原所以保障政府在將來的選舉中獲得勝利，然而結果卻適以促成自由黨政府的崩潰。因為在選舉未舉行前，羣情即憤激非常，羅馬尼亞國王卒不得解散自由黨內閣，任命阿佛勒斯各將軍組織新閣。阿氏的擁護者為農民及除阿黨以外的在野政黨，所以其後大選揭曉，阿氏的政黨竟在議會中佔得五分之一的議席，而自由黨則幾完全絕跡於議會。但是到了第二年，阿氏的保守黨與農民發生裂痕，阿氏圖組織超黨內閣不成，自由黨又復得勢，當舉行大選時，他們竟摧毀阿佛勒斯各將軍的政黨，一洗當年戰敗之恥。可是自由黨的勝利，為時亦頗短暫，蓋自斐迪南 (King Ferdinand) 王薨後，攝政機關便罷黜自由黨，任命農民黨的領袖曼尼阿博士組織新閣。繼此事而發生的大選，與往昔的情形如出一轍：自由黨一敗塗地，農民黨大獲全勝。自此以後，農民黨因內部的紛爭，暫時喪失政權，但屢蹶屢起，卒保持政權至加羅爾皇儲即位時止。原來加羅爾王從前雖然表示願意放棄王位，但此時卻借武力復位，到了一九三一年，遂自立為羅馬尼亞的事實上的迭克推多。



以上敘述羅馬尼亞政局的經過，已佔相當篇幅，目的無非在解釋該國政治制度的作用。原來一九二六年的奇異的選舉法，尙不足以說明此後大選中各政黨勢力之消長。從前述的政局經過看來，可知在羅馬尼亞現今的政治狀況下，誰據有統治機關，誰就在選舉中獲得勝利，而在那種選舉制度下，選舉勝利的政黨，必能藉壓倒的大多數的票額獲得政權。這種情形，便使選舉權的民主特質，幾於徒有其表，而國王的實權，則因此大爲增加。因國王可任意解散內閣，另簡新內閣，而羅馬尼亞的內閣，如前面所說，定能在選舉中獲得勝利，所以在平常狀態下，羅馬尼亞的國王對於議會中的分子，實有操縱如意之樂。當國王有心違反衆意，或想維持一個大失衆望的內閣之時，他的權力固然有幾分限制，但在平常時候，則如一九三〇年加羅爾王復位時的情形及此後的政府的情形所表示，羅馬尼亞的政治制度，實與君主專制爲近，與西歐式的君主立憲，相去實太遠了。

至如國外政治，羅馬尼亞可說完全受恐怖心理的決定——東邊的俄國與西邊的匈牙利都是羅馬尼亞所引爲大懼的。南邊的布加利，將來或許能够復爲羅馬尼亞的勁敵，但如現今的情形，積弱的布加利，實不足爲強大的羅馬尼亞的大患。所以羅馬尼亞所恐怖的，僅爲比薩拉比亞及德

蘭斯斐尼亞兩問題，自大戰終止以來，這個國家的唯一願望，便是與他國廣締同盟，用來保持其現有的領域。其與捷克及南斯拉夫共同組織小協約國，目的即在鞏固其與匈牙利間在戰後的新國界，並阻止哈布斯堡帝國的復活。小協約國成立後不久，羅馬尼亞又與其他的鄰國，特別是波蘭，進行磋商，冀擴大小協約國的範圍，但因捷克與南斯拉夫都不願捲入俄邊問題的漩渦，羅馬尼亞的計劃，卒成畫餅，於是遂單獨與波蘭締結協定，目的不消說是對俄。比薩拉比亞問題，始終是羅馬尼亞與蘇聯兩國恢復邦交的障礙，蓋蘇聯雖會坦白的宣言，決不用武力收復比薩拉比亞，藉以表明自己無侵犯該地的野心，但是對於該地的主權，則猶不肯放棄。這就是說，始終不肯承認比薩拉比亞是羅馬尼亞的領土。總之，蘇聯只擔保自己決不用武力收復比薩拉比亞，並沒有擔保自己當獲得行動的自由時拒絕比薩拉比亞併入蘇維埃聯邦，這是很明白的。

然而到了一九三三年的夏季，蘇聯終於與羅馬尼亞、其他的小協約國、波蘭、以及另外的許多國家，成立條約，除規定各國須遵守不侵犯的條例外，對於『侵略者』（aggressor）這個名詞，也有明確的解釋，希望從此永弭戰爭，共維和平。

## 六 巴爾幹半島諸國

我們對於蘇俄西部各國的研究，現在要從北方的斯坎的納維亞轉向南方，說到歐洲東南部的巴爾幹來了。這個區域，以及更北一帶，自大戰以來，舉凡領域與人民，均曾經過大規模的重新分配，故其政治與經濟的局面，也有顯著的變化。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之膨大，希臘之相當的擴展，布加利之失勢，以及土耳其以亞洲領地爲根據，在凱末爾領導下之重建，都使巴爾幹半島上勢力的分配，面貌煥然一新，因爲這些大事，不但變更巴爾幹諸國的相互的力量，同時也大大的變更與其他歐洲各國間的關係。譬如羅馬尼亞的領土，擴大到令人難於認識，致與強大的波蘭發生密切的接觸，所以在本質上，他已不復是巴爾幹半島的國家，在國際上，也不復與歐洲東南部的問題有甚深的關係，而在中歐問題中，倒佔着重要的地位了。又如南斯拉夫，係合戰前的塞爾維亞，門的內哥羅兩國以及奧匈帝國的哥羅西亞，斯羅文尼亞 (Slovenia) 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等省而成，結

合雖不見怎樣堅固，但疆域之廣袤，實可驚人，因其境界，西達亞德里亞海沿岸，與意大利的國土相毗連，而與奧大利的維也納，又相隔不遠，這樣的國家，我們不能說與西歐各國無密切關係。又如希臘，其領有全部愛琴海的夢想，雖已成爲畫餅，但也獲得相當廣大的新領土，且在世界貿易中所居的地位，亦已增進不少。只有布加利與阿爾巴尼亞兩國，一點也沒有



巴爾幹各國

長進。依然是向來所謂巴爾幹式的國家。尤其是布加利，曾一度爲巴爾幹事件的領袖的，而今竟不得不在強隣四伏的環境中，度其孤立無助的歲月。其實這個國家在大戰中所喪失的領土，本不甚多，只因隣國的土地與人口，均大有擴展，相形之下，高下立判，今日之布加利，除阿爾巴尼亞以外，要算是巴爾幹最小的國家，戰前擴張領土的雄心，早就付之東流了。

## 巴爾幹戰爭

要研究巴爾幹諸國之戰後的局勢，我們就得記牢下面一點：這些國家投身大戰漩渦的時候，離開他們兩次連續的地方戰爭，並沒多久。一九一二年的第一次巴爾幹戰爭，是布加利、塞爾維亞、門的內哥羅及希臘聯合起來對付土耳其。起初，這些國家尙能團結一致，所以連戰連勝，差點兒不把奧托曼帝國趕出歐洲。但是緊承着這種勝利，便因勝利品的分配問題，引起內部的分裂，卒以造成一九一三年第二次巴爾幹戰爭。這次戰爭的結果，土耳其在歐洲的勢力，得以繼續保持，而布加利的野心，則大受打擊。原來布加利人的最大目的，爲獲得通愛琴海的一條商業路綫，及佔領與自

已十分相類的民族所在的馬其頓，這也就是希臘人所要求的。第一次巴爾幹戰爭之後，第一個目的是實現了，但是爲了第二個目的，勝利的巴爾幹同盟就突告分裂。布加利卒在第二次巴爾幹戰爭中，喪失自一八七八年以來向受自己的管轄的自治區多布魯加，而所獲得的，則不過是愛琴海沿岸的一塊極小的土地，及一個極小的港埠德的加茲（Dedeagatch）與原來的希望，大相逕庭了。

所以當大戰爆發之日，正是布加利痛恨隣國，力謀恢復失地之時。而當一九一四年大戰未爆發時，則正是布加利與德國發生關係之日。原來那時候的布加利，爲洗滌國恥起見，極力接近德國，懇求財政上的援助，結果，布加利從德國的國家銀行得到一筆大借款，而德國則從布加利獲得實際的利權，特別是煤礦的開發與鐵道的增築。因此之故，布加利在大戰中傾向於同盟國方面，實與其敵人塞爾維亞之同奧匈帝國勢不兩立，一樣是必然的結果。這一遭，布加利人又走錯了路，一九一八年以後的疆界的新分配，遂截斷布加利與愛琴海的聯絡，只允許布加利人以兩種特別權利，一爲建築鐵道直達德的加茲之權利，一爲就這個不是怎樣適當的港埠設立自己的經商地帶之權利，藉以稍慰布加利人的不平。這麼一來，布加利的領土，可說與海絕緣，假如他們不能戰勝政治

上與地理上的困難將德的加茲造成完美的口岸，那末布加利與西歐的海上貿易，便只有經過黑海的兩海峽了。

## 布加利

領土四萬方哩，人民六百萬之布加利，本是一個農業國。地理上，這個國家被橫亘國境中部，幾至黑海邊爲止的巴爾幹山脈，劃成兩部。而在南部，則又有洛多皮 (Rhodope) 山脈，使其與愛琴海的陸地及馬其頓，塞雷斯兩區域相隔離。然而中南兩部多山的布加利，却並不缺乏廣大的農業區域，其坐落的地點是在巴爾幹山脈兩邊。適於耕種的土地，佔全境百分之三十六，森林區約佔百分之三十，但永久牧場却只佔百分之三。大體說來，土地都受農民的墾種。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大都只有極小的地產——歐洲東南部之一般的農民地產標準，本已有名的低，而布加利的標準，則可說是低中之低。且農業方法非常守舊，大戰後曾經有過幾次改進農業方法的企圖，並無多大效果。在大戰前，小麥是主要農產品，也就是輸出品的大宗。但是到了大戰以後，煙草業忽然

大大的發達起來，幾乎要佔到總輸出之一半，同時小麥的輸出額，則一落千丈，直至目前的恐慌期中，方纔回復。煙草業之所以發達，多半是因為希臘與土耳其政局不靖，後來又發生希土戰爭，致其煙草的出產量不能適應市場的要求之故。自從這兩國重複投進世界市場以來，旁的國家就得從事於另外的農業品的發展，於是布加利人也轉其目光於甜菜，胡麻子，棉花，玉蜀黍等之種植。但煙草業依然非常發達，這使布加利人與土耳其人，希臘人同樣，其在經濟方面的態度，與輸出小麥的鄰國人的態度截然兩樣。

自原料食品的世界市價暴跌以來，布加利雖然比其他的國家少受些損失，但也有其自己的經濟困難。原來布加利是難民的淵藪，因避難而移居布加利的馬其頓人及其他的鄰國人，幾使布加利的人口增加一百萬。以布加利農地產之少，人民需要土地之殷，再加上這一百萬人口，其何能堪？故從事耕種的勞動者之平均生產，遂因之大為退步，若不是過去數年間略呈回復之象，布加利的農業生產之前途，簡直不堪設想。關於處置難民，布加利曾受過國聯的惠，曾於一九二六年借給布加利一筆難民借款。然而難民的居住地，雖已設法擴充，難民問題卻依然不會完全解決，尤其



是在西南部，與南斯拉夫及希臘的交界地方，馬其頓人的革命組織，常藉大膽的暴行，造成混亂的政局，推厥原因，便是由於難民問題之不易解決。

現代的布加利，像其他的巴爾幹諸國一般，其立國的歷史是很短的。從十二世紀到十四世紀，這裏是舊時的布加利帝國所在，經過短時期的對塞爾維亞的稱臣，又於十四世紀後半受土耳其的統治。自此以後，布加利的名字，遂暫時銷滅，一直等到十九世紀初葉，當民族復興運動的種子成爲果實時，始復重現於歐洲的地圖，而所謂民族復興運動的種子，則爲一八七八年俄土戰爭結束時藉俄國的幫助播下的。柏林條約規定布加利爲一個自治公國，名義上仍受土耳其的統制，但不曾將東路美里亞區包括在內，因爲這是布加利的民族主義者要求收回自管的區域。然而這個區域自一八八五年被一次奇襲所佔據後，終於只好在布加利公管轄下，做土耳其的屬邦。如前面說過，布加利的建國，始於十九世紀初葉，原來當一九〇八年時，斐迪南纔宣布布加利的自主，將兩區域併成一國，並自號沙皇，藉表布加利人恢復往昔帝國的雄心。以後的布加利，則我們已經知道得很多了；立國沒有多久，便與其隣國屢動干戈。這是因爲具有原始人好戰性質的布加利民族，常易

激起民族主義狂，而國境以外住有衆多的布加利人民這一事實，又給與此民族主義以一種明確的政治目標。其實，布加利人擴張領土的希望即幸而實現，也不過造成隣國的領土回復主義，惹起一些國際間的新問題。夫以羣相爭奪的區域中民族與國籍之複雜，布加利能永遠保持該區域的所有權，而不招隣國的嫉妬嗎？

在布加利全人口中，布加利人佔百分之八十，土耳其人佔百分之十一。由於多布魯加的喪失，在布加利境內的俄羅斯人大爲減少。猶太人亦不多。大部分的人民都信奉布加利的正教，但回教徒也不少，天主教徒亦有相當的勢力。

大戰後整理期中，土地問題支配着布加利的政治。一九二〇年的選舉，斯丹蒲立斯基（Stanbulski）領導下的農民黨獲勝，以後數年，斯氏便在左翼各黨的擁護與守舊各黨的猛烈攻擊中，繼續執政，儼然布加利的迭克推多。斯氏登臺之時，立即通過一個土地法，將教堂與皇室的田產，都加沒收，以之分配於農民。但是在私人掌握裏的大地產實在太少，以致可作分配用的土地，不能適應人民的需要。到了一九二三年，保守分子聯合與斯氏有隙的馬其頓人，發動一次古迭達，斯氏

的政權卒被推翻。而斯氏本人，亦於是役遇害，於是布加利的農民黨，失去一個能幹的領袖，斯氏欲藉農民的綠色國際支配東南部歐洲政局之夢想，亦從此變成歷史上的陳蹟了。緊接着那次古迭達，便來了近如內戰的局面，在桑科夫（Tankoff）支配下的新政府，以嚴厲的手段，壓平國內的共產分子與社會主義分子。但至一九二六年，布加利卒由賴普契夫（Liapchev）領導，恢復民主政體。翌年，修訂憲法，規定採用比例代表制，照例引起黨派之紛歧，與必然的聯合政府。在桑科夫時代被壓服之共產黨，立即藉工黨為幌子而復活，於一九三一年的總選舉中博得不少的議席。但自斯丹蒲立斯基之死，工人與農民的結合，已完全失掉可能，目下的農民黨，至不惜與左右中三派的資產階級政黨互相提携，共同統治國家了。

### 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緊靠布加利西面，係塞爾維亞人，哥羅西亞人，及斯羅文人合組之新王國，其立國的期間係在大戰以後，而塞爾維亞，門的內哥羅兩王國，以及奧匈帝國附近，即人種與語言兩皆屬於

斯拉夫族之人民所居住的區域，則爲其前身。戰前塞爾維亞王國的主要民族塞爾維亞人，當然也就是現今南斯拉夫王國的主要民族，他們藉吞併奧匈帝國的哥羅西亞，斯羅文尼亞，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服福迭那（Vojvodina）等省，造成土地九萬四千方哩，人口千四百萬之南斯拉夫，以視戰前塞爾維亞之僅有土地三萬四千方哩，人口四百五十萬，真可謂驚人之發展了。即就一九一四年的塞爾維亞而論，其發展的歷史亦不見怎樣久遠，因爲那時剛剛經過兩次巴爾幹戰爭，領土幾乎增加一倍，人口增加三分之一。然而在擴大的領土內，建立新的統治制度及政府，行政等問題，還沒着手，就被捲進更偉大的戰爭漩渦，全境都陷敵手了。塞爾維亞至不得不將政府遷至國外的科甫島（Corfu），而奧匈帝國與布加利兩國，則挾其戰勝的軍隊，握有統治塞爾維亞的實權。所以到了一九一八年，當塞爾維亞政府否極泰來之時，在其面前，展開着必須同時應付的兩問題：舊有的領土之重新組織，以及從奧匈帝國佔得的新領土之編入舊王國。總之南斯拉夫之建立，與波蘭建立新國家的情形正復相同。而且塞爾維亞本來有一個王朝，此外還有一個政府及許多政黨，這種情形，是只能使問題益趨複雜，而加重組織國家的困難的。

南斯拉夫內部的衝突，在新王國組織就緒以前，就已在開演着了。塞爾維亞人只希望擴大舊來塞爾維亞的政權，在塞爾維亞民族獨一支配下，藉中央集權制度統治新領土，而脫離奧匈帝國，而被劃入南斯拉夫版圖之區域，則由國民委員會與議會出面，要求新國家中各民族之一律平等，要求以區域爲單位，施行自治，即使辦不到真正的聯邦制度，也應辦到高程度的地方分治制度，用來保障民族與宗教的特殊集團之權利。

原來戰後建立的南斯拉夫，名爲南斯拉夫族的王國，其實是個內容很複雜的國家。在全人口中，塞爾維亞人僅居三分之一，而其他的民族，則均相當的衆多，哥羅人（Croats）在三百萬以上，斯羅文人一百萬，德國人五十萬，馬札兒人與阿爾巴爾亞人各約五十萬，操羅馬尼亞語者二十五萬。除民族與語言十分複雜外，宗教亦極紛亂之至。塞爾維亞人奉希臘教，哥羅人信天主教，以言比例，則天主教徒佔全人口百分之三十九，與佔人口百分之四十七的希臘教徒相對立。此外又有佔全人口不下百分之十一的回教徒，散居國境的南部及波斯尼亞一帶，而在服福迭那靠近匈牙利邊境一帶，則又有相當數目的新教徒，此種教徒，或爲德國人，或爲馬札兒人，猶太教徒比較的不大

重要，總數約僅七萬三千。

以上的複雜情形，便是一部分人民堅決地要求地方自治的由來。不僅在民族與宗教方面有此種情形，即在文化方面，情形亦復如此。舊屬奧匈帝國諸省的人民，特別是哥羅西亞，斯羅文尼亞與服福迭那的人民，已與奧匈帝國的文化結下不解之緣，故其社會狀態，也比南方的塞爾維亞人進步不知多少。還有塞爾維亞殆可說是純粹的農業區域，居民幾乎全恃農業爲生——舊時的塞爾維亞除柏爾格雷德（Belgrade）以外，並無第二大都市——而克羅西亞人則已都市化得多，且哥羅西亞與斯羅文尼亞之礦山業與製造業，已有甚大的發展。再塞爾維亞的農業方法，本是原始的，而服福迭那的居民則已知應用非常進步的農業方法，尤其是聚同種人而居的德國人與馬札兒人。服福迭那人口之密，爲全國之冠，平均每方哩一百八十人；斯羅文尼亞次之，約百七十人；哥羅西亞又次之，約百六十人。而塞爾維亞的人口密度，則平均每方哩約僅一百十人，就南斯拉夫全國而論，約僅百二十五人。

由此觀之，南斯拉夫北部諸省比較開化的民族之反對中央集權制度，實不足怪，因爲此種制

度一旦實現，其意義便是塞爾維亞人支配全國，而要求自治之呼聲，與夫能適應各地方的特殊需要的政制，則必全被抹煞。採取中央集權制乎？抑採取某程度的地方自治制乎？這便是南斯拉夫自建國以來政治上之唯一重大問題。

即在現今，這個問題也不能說已有解決的端緒。如前面所說，這個問題之發生，是在大戰以後，當憲法的規訂提出討論之時。隨着奧匈帝國的崩潰，哥羅西亞等省立即宣佈獨立，暫時建立地方自治制度，預備將來再定確實辦法。這些省分本沒有建設獨立國的決心，一開頭就預備與南斯拉夫人的國家相合併。但是無條件併入塞爾維亞，受柏爾格雷德舊來的塞爾維亞政治家之統治，致自己的特殊需要沒有得到理睬，則究非所願。在反對方面，塞爾維亞人由伯息克（Pasic）領導，表示不願放棄其政權，換言之，即不願讓那些省分的代表平分他們的政權。他們極力主張統一的大塞爾維亞政策，對於天主教主義及哥羅西亞，斯羅文尼亞的領袖之比較工業化的見解，俱抱極大的懷疑。在他們的心目中，奧匈帝國是不共戴天的世仇，所以哥羅西亞等省之奧匈帝國的文化，也就成了他們的眼中釘；不但國家的政制，就是教育制度，他們也希望由塞爾維亞人一手包辦，冀完

成全國塞爾維亞化的企圖。一直等到經過無數困難與長時期的遷延以後，奧匈帝國舊屬省域的自治團體與塞爾維亞人意見始趨一致，成立統一的國家。而且這種一致，意義並不是說國家的政制問題，已就此完全解決。起初，塞爾維亞的政府黨，即所謂急進黨者，與塞爾維亞的一些反對黨所合組的新民主黨，及哥羅西亞等省的自由主義者的集團，暫時聯合起來，在大戰後數年間握得政權。同時這個政黨聯合的反對黨，亦極複雜之致，大體說來，一方面是人數衆多的共產黨，另一方面是哥羅西亞的政黨，後者又分爲極右派與極左派——即哥羅西亞教會黨，及賴第克 (Radie) 領導下的哥羅西亞農民黨。在前述的政黨聯合中，以塞爾維亞人最佔優勢，至一九二一年時，他們遂在憲法制定議會中通過中央集權制的憲法，規定南斯拉夫全國之絕對統一。反對黨中之哥羅西亞農民黨，大不謂然，於否認憲法制定議會的効力後，並不出席爲抵制，但此種舉動，並不會有若何效果。同時共產黨亦大失勢力，因共產黨代表的被選舉權，既被剝奪於先，自某閣員遭一個共產主義狂者的暗殺以後，共產主義者所組織的政黨，也受嚴厲的禁止了。

緊隨着新憲法而發生的効力，爲塞爾維亞的急進黨之勢力的增大。政黨聯合是分化了，純粹



急進黨勢力的內閣，由伯息克領導，統治着至一九二四年爲止的南斯拉夫。但急進黨的統一政策之反對勢力，漸漸膨脹，而哥羅西亞的代表，又復恢復其在國會中的議席，這使伯息克卒不能不掛冠以去。以後數月，是民主黨的政府。但是民主主義者的集團，爲了哥羅西亞農民黨與其領袖賴第克發生意見，內部突告分裂。伯息克又起而掌握政權，前後壓平共產黨與農民黨之勢力，建立較前更爲中央集權化之制度。此後的南斯拉夫，便陷於極大的混亂。賴第克突然改變主義，與伯息克成立同盟；但這同盟不久即告破裂，到了一九二七年，急進黨轉與民主黨互相提携，而賴第克則又成了反對黨的領袖。此種局面，卒以造成一九二八年國會中的大慘劇：賴第克及其幾個同黨，爲一個急進黨徒所槍殺。哥羅西亞人紛紛退出國會，以示反抗，政局大亂，一直等到亞歷山大王施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以後，纔重復歸於安定，那便是一九二九的古迭達。

在古迭達期中，亞歷山大王爲緩和反對空氣起見，允許地方分治。同時以王命廢止一九二一年的憲法，建立純粹民主政體的政府。又將所有政黨，都加取締，並規定將來不得再組新黨。原來舊時的憲法，將全國劃成許多行政區域，其目的是所以分散奧匈帝國舊屬諸省的團結，保障中央集

權政策之成功，所以憲法廢止之後，政府便將全國的領土，重新區分，減少區域的數目，並名新區域爲巴那特 (Banat)，每巴那特各受國王所任命的巴尹 (Ban) 的管轄，並設有地方議會一個，以輔助巴尹。到了一九三一年，國王卒下詔實行新憲法，確立地方自治的新政制。這種新憲法頗有幾項特點。蓋據憲法所載，立法權由國王與賦有相等權力的兩院所組織之國會共同掌握之。兩院的意見不能一致時，國王有決定的全權。上院的議員，半數係由民選，其餘一半由國王直接任命，所以上院實具有支配整個國會之權力。至下院的議員，則全由人民投票選舉，但投票制度非常特別，致各區域之少數民族，變成毫不重要。這是因爲姓名不見於合理的名單者，不得爲被選舉人，而名單之不會包羅國內一切選區所選出之代表者，則不能被認爲有效。這麼一來，凡以一個區域爲標準的集團——例如純粹哥羅西亞的政黨——苟不能與其他選區的集團相聯合，產生一張名單，便無選派被選舉人的可能，而與其他選區的集團聯合產生名單，則又爲事勢所不許。茲且引一九三一年的總選舉爲證。那一年的總選舉，只有一張名單與上述之條件相符合，凡姓名見於該名單者，俱順利地當選。因此當國會開幕之時，就呈現一種全場一致的現象，與歐洲大部分國家在比例代

表制下選舉出來的國會情形恰恰相反全國並無一個政黨因為舊來政黨的復活仍在禁止之中。但新當選的議員，為補救這一缺點起見，有南斯拉夫政黨的組織，全體議員，俱隸屬於這個唯一的政黨。南斯拉夫就這樣的奠定了『安全的民主政治』再也不愁組織化的反對勢力來破壞這種安全了。總之，這個國家的新憲法，其保障唯一的政黨把持國事，可謂無微不至，即蘇聯之一黨專政的制度，對之亦有遜色。截至現下為止，這個唯一的政黨，以及力能操縱這政黨的國王，從來不曾有過接受地方自治的要求的跡象，這就是說，從未有過擴充各行政區域的地方國會的自治權的意思。故南斯拉夫可說是嚴厲的獨裁政黨下的國家，一部分的反對黨領袖，已身陷繯綫，剩下的部分則噤若寒蟬。哥羅西亞的革命，正在醞釀之中，即舊時的塞爾維亞，亦極不滿於現狀。加以與意大利的邦交，極不和睦，政府又抱着極強烈的軍國主義的態度。所以若說南斯拉夫能在這種不自然的中央集權制的獨裁政治下永遠保持其統一，這是沒有人敢相信的。

## 希臘

在布加利與南斯拉夫的南方，有希臘民族的國家，領土包括希臘本部，以及位於愛琴海北方的馬其頓與色雷斯兩區域之大部，此外，克里特島以及除愛琴海北部的音不洛斯島（Imbros），小亞細亞南部的羅德斯及杜達坎尼斯（Dodecanese）兩島以外之愛琴海羣島，亦為希臘所有。如我們所知，戰後的希臘，把布加利，南斯拉夫兩國與愛琴海的聯絡，完全截斷。然而也不盡然，因為南斯拉夫既因國際保證，從薩羅尼加得到一個海口，而布加利之在德的加茲獲得某種權利，則在前面已經述過了。

大戰以後，關於領土的糾紛與變化，沒有一國能趕得上希臘，一九一九年的希臘，除其現有的領土外，掌有小亞細亞西部的整條海岸線，同時更掩有自色雷斯迤邐向東至黑海止之狹長的陸境，扼馬爾馬拉海（Marmora）的咽喉。這種情形如果不發生變動的話，那麼現今的希臘，領土準會延長到君士坦丁堡，同時在小亞細亞方面，也準會把土耳其人深深地鎖在多山的內部。除此以外，希臘人又進而要求意大利管轄下的羅德斯與杜達坎尼斯兩島及英國管轄下的塞浦魯斯島之所有權。

卽就一九二〇年協約國預備給與希臘的領土而論，較之希臘現有的領土，已高出不知多少。因爲那時候的協約國，雖然沒有意思將羅德斯島劃歸希臘，但對於杜達坎尼斯島，則確曾預備劃給希臘管轄，同時，且預備使土耳其將士麥拿以及小亞細亞沿海岸之一大塊陸地，都讓渡與希臘。但是一九二一至二二年，土耳其人逐退希臘軍隊之後，希臘人遂只好自安於現有的領域，坐視土耳其人管轄小亞細亞的海岸，而無如之何了。

卽使如此，希臘也不能不算是在現時代的幸運兒，因爲在大戰中，其領土與人口，俱大有擴展。一九一二至一三年的巴爾幹戰爭，希臘曾因之獲得不少領土，而由大戰得到的財產更多。不過現時代的希臘，實非造成於一朝一夕之間；乃是經過一世紀以上的發展，始克有今日的。自一八二〇年起，希臘就起而反抗奧托曼帝國，宣佈獨立。經過一九三〇年與一九三二年的兩次決議，希臘卒在英、法、俄三國聯合擔保下確立其主權。那時的希臘王國，領土只有摩利亞（Morea）（或稱庇羅奔尼斯 Peloponnese），科林斯灣緊北的一帶陸地，以及愛琴海西部諸島。靠近西部海岸的愛奧尼亞羣島（Ionian Islands），是英國給他的，時在一八六三年。而帖撒利（Thessaly）平原之

併入希臘，則爲一八七八年之事。自此以後，至巴爾幹戰爭的前夜止，希臘的領土暫時停止擴展。一九一〇年的希臘，還只有二萬四千四百方哩，及至巴爾幹戰爭以後，因爲獲得南伊庇魯斯（Epiros）全部，及馬其頓與西部色雷斯之大部分，領土增加二萬一千六百萬方哩，幾爲原有領土之一倍。大戰以後，獲得色雷斯剩餘部分之大部分，並掩有小亞細亞的一部分。然而在這些獲得之中，希臘所能繼續保持的，僅有三千方哩，這使現時的希臘，領土不到五萬方哩，人口不到六百五十萬，然在一九一三年時，希臘就已經有五百萬的人民了。

然而單講領土的變化，其實概括不了希臘在大戰後的變化。因爲自一九一八年以來，希臘，布加利及土耳其的人民，曾在這三國的現有領土間，舉行過大規模的遷移與對調。當一九一三年時，馬其頓與色雷斯兩區域內的希臘人，尙只佔全部居民百分之四十。而在現今，就該兩區域受希臘管轄的部分而言，馬其頓的希臘人佔全部居民百分之九十，色雷斯的希臘人佔百分之六十五。這是有組織的移民政策的結果，而這種政策之所以獲得成功，則因國聯給以財政上的幫助，一九二三年設立的國際移民問題委員會加以指導之故。所以希臘雖然不能如其所希望的，將住有衆多

的希臘人的小亞細亞與東部色雷斯收爲己有，但受其管轄的區域則幾全爲希臘人所居住，外僑是已經少到可憐了。不過，希臘人的欲望是不會就此廢足的。因爲他們主張塞浦魯斯，羅德斯，杜達坎尼斯等島都須劃歸希臘，正像他們在戰前主張克里特應受希臘管轄一樣。非至意大利人履行杜達坎尼斯的佔領純係暫時性質之誓言，並放棄羅德斯的主權，非至英國人將塞浦魯斯讓給希臘，希臘人是永遠不會有滿意的時候的。但如色雷斯及小亞細亞本部，則居民的對換似已發展至相當程度，替領土問題的最後的決定已填下一個適當的基礎了。

自一八二〇年起獲得獨立以來，希臘曾有一個極不安定的政治史。一八三〇年時，列強派一個巴威略的皇族爲希臘王。一八六二年，希臘人卒藉一次武裝革命，將他逐出國境，建立君主立憲政體，與一院制的議會政治。但希臘的君主政治與議會政治，進行俱不見怎樣順利，因之內政與外交方面，都呈杌隤不安之勢。始終十分貧苦的希臘，自開國以來，就得受國外投資者的支配，所以這個國家爲了無力償還鉅大的外債，常常發生糾紛。而且，每經一次戰爭，希臘的財政困難，亦加深一層。一八九七年的希土戰爭，希臘吃了老大的虧，一九一二至一三年的巴爾幹戰爭，希臘託同盟國

的福，佔了一點便宜，但吃虧也能，佔便宜也罷，其使希臘財政狀況，陷於紊亂而不可收拾則一。在一九一四年以前，有增無已的債務，就已經成爲希臘的嚴重的問題了。此外，克里特問題亦爲政局不安之不斷的根源。當一八九七年時，克里特人從奧托曼帝國獲得自治權，但這並不能滿足克里特人的民族慾望，因爲克里特人是以與希臘合併爲其目的的，所以到了一九〇八年，他們卒正式宣佈歸併於希臘。至希臘的政府，則深恐將因此引起國際糾紛，再則軍事方面，自感毫無把握，故對克里特人的行動，逡巡未敢即行批准，卒以引起國內的武裝暴動。這次暴動，地點是在雅典，他們推翻政府而暫時代以軍事委員會之管理。而對希臘後來的歷史有重大關係之威尼徐祿(Venizelos)，便趁這個機會，由軍事委員會的羽翼，驟然得勢。一九一二年當第一次巴爾幹戰爭正在進行的時候，克里特與希臘正式宣告合併，克里特問題，至此遂完全解決。翌年，在喬治(George)遇刺之後，君士坦丁(Constantine)繼爲國王，馬上就與威尼徐祿發生意見上的衝突。大戰爆發，威氏爲貫徹其擴張領土主義，主張希臘應加入協約國方面，因此親德的君士坦丁，立即罷免威氏，威氏遂於一九一六年祕密遁至協約國管轄下之薩羅尼加，在那裏設立敵對的自治政府。協約國竭力扶植



威氏的勢力，以臨君士坦丁，所以到了一九一七年，君士坦丁不得不遜位於其子亞歷山大，威尼徐祿又復掌握希臘的政權。在威氏主持之下，希臘與布加利兩國於一九一九年訂定交換移民的辦法；同年，希臘軍隊在士麥拿登陸，佔領西部小亞細亞的中央區域。但自一九二〇年，亞歷山大逝世，政局又趨糾紛，君士坦丁乘機復位，第二次罷黜威氏。

這種政治動向的轉換，使協約國大減其對希臘的同情，協約國本來竭力主張小亞細亞應歸希臘所有，但是到了此時，藉口協約國與土耳其間所訂定之塞佛爾條約（*Sèvres Treaty*）已歸無效，中止其對希臘的援助。無如希臘人猶不甘放棄其權利，結果遂有一九二一至二二年的慘敗，而造成土耳其的雄名。原來土耳其自一九二一年與法國訂立法士協定以來，在外交方面，深得法國的幫助，已不像往日樣的孤立無援了。土耳其軍隊克復了士麥拿，希臘軍隊倉皇遁逃，僑居小亞細亞的希臘人之被勝利的土耳其人逐出亞洲者，爲數不下百三十五萬，因此希臘方面，亦將僑居馬其頓與色雷斯的土耳其人，驅逐出境，以爲報復。這種互相排斥僑民的運動，直至一九二二年希土間交換移民的協定成立後，始告終止，而那種協定的內容，則即依據一九一九年的希布協定的。

希臘軍隊在小亞細亞的慘敗，引起希臘內部的巨大的反響。新的革命爆發，君士坦丁第二次被迫離位。在一片痛恨國恥聲中，政府當局之有辱國嫌疑者，皆被判處死刑，雖有各國的抗議，亦莫能救。繼君士坦丁而為希臘國王的是喬治第二，但歷時不久，喬治第二亦不安於位，被迫離國。一九二四年的全民投票，決定將希臘改建為共和國，開始起草憲法。但至一九二六年，希臘忽然出現潘格羅斯將軍 (General Pangalos) 的短時期的獨裁政治，及至潘氏推翻之後，始將新憲法付之實施，自此以後，風行世界的兩院制的議會，便統治着希臘。猶如法國一般，希臘的總統，係由兩院聯合選舉，其權力也與法國的總統不相上下。下院四年一選，投票者限定男子，但如地方投票，則自一九三〇年以來，女子也有權參與了。上院議員有四分之三，也由人民直接選舉，其餘四分之一，則一部分由兩院公推，一部分由特殊團體如商會及大學校之類選派。但是希臘的議會政治，是否已經臻於穩固，實為一個極大疑問。在過去期間，希臘政治上最重要的人物是威尼徐祿，希臘的政局，全視威尼徐祿之擁護者及反對者之誰勝誰負而定。在我編本書的時候，威氏已在大選中遭受挫折，而其一部分黨徒的武力革命，也已宣告失敗了。

經濟上希臘可說完全以農業立國。在巴爾幹戰爭以前，希臘除愛琴海中的島嶼以外，非常缺乏宜於耕種的土地，全賴島嶼的生產品，來供給其大部分的需要。但到後來，因領土日展的結果，卒在馬其頓獲得極好的農業區域，還有晚近纔併入希臘版圖的島嶼，也給與希臘以不少可耕之沃土。但雖如此，希臘的食糧仍沒有到自給的程度。小麥及其他的雜糧，大部分都得從國外輸入。說起輸出品，主要的是舊有領地所出產的葡萄乾，以及新領地馬其頓所出產的煙草。除葡萄乾及煙草以外，小麥、燕麥、大麥、玉蜀黍、葡萄、橄欖等，也廣有種植。近幾年來，希臘人又從事於另外的水菓及棉花之栽培。北部一帶地方，並出產少量的米。自大戰終止以來，希臘會藉高率的保護關稅，獎勵工業，可是即在大戰後十五年的今日，仍有四分之三的人口賴農業爲生，而都市區域的人口，則尙不到三分之一。無論在大戰前，或在大戰後，希臘的貿易平衡，都是顯明的不利。幸而希臘人民之移殖美國者，爲數甚多，此種僑民所匯歸的款項，着實彌補了希臘因入超而起的損失。近來希臘的財政困難之益甚於前，一部分便是因爲貿易平衡益陷於不利，而貿易平衡之所以益陷於不利，則有兩個原因，一爲移民的減少，一爲世界恐慌。

上面有一部分三字，可見希臘的財政困難，尙別有原因。一九二一至二二年的對土戰爭，完全靠增發紙幣爲軍費的來源，自士麥拿陷落以後，這種紙幣的價格，一落千丈，僅值票面百分之六。又如藉大地產的分裂與農民產業的整理而獲得解決的難民問題，則使希臘人又多了一筆鉅大的外債，原來當一九二四年時，希臘曾從國聯得到一筆難民借款，致此後不得受國際財政委員會的嚴厲的管束。爲安定財政及平衡預算起見，一九二三年曾開始徵收資本稅及附加稅，而當一九二四年及一九二五年時，則因國際財政委員會之命令，一再施行緊縮政策。但是一九二六年潘格羅斯的短時期的獨裁政治，卻替希臘造成一個第二次貨幣膨脹的機會，致同年新政府成立之時，希臘又不能不對國外爲將伯之呼。這種請求是有効的，不過希臘的財政，則因一九二八年國聯安定借款的關係，愈陷於外力把持的束縛中了。除國聯外，美國政府也曾借給希臘一筆款子，那是與戰債問題的解決有關的。自此以後，至世界恐慌爆發前止，希臘的財政狀況總算比從前好了一點，但是恐慌的爆發，馬上就把希臘過去期間所含有的弱點，明晰地暴露出來。蓋希臘的巨大的外債，是用現金償付的，而物價的暴落，恰好使巨大的外債愈加巨大，結果造成希臘的無力償付以及希

臘人與外國投資家間之新爭端，這種爭端直至現今，尚在進行之中。實際自一八九八年以來，希臘不曾有過財政自主的時期，始終須以一大部分的國庫，清理外債，又不得不向主要債務國的代表所組織的財政委員會低頭，任其支配。自那時起，希臘的債務，真所謂與日俱增；非但不能辦到出超，即欲求輸入略減於前，亦不可得。照理，希臘自從獲得馬其頓及愛琴海羣島以來，財富似應突過往前。無如這個國家，經濟上既不會經過開發，且其舊來的債務，往往不用於生產方面，所以當爲要獲得國內發展所必需的資本而向國外借款時，就永遠不會得着優厚的條件了。

## 阿爾巴尼亞

阿爾巴尼亞南隣希臘，東北兩面隣南斯拉夫，是一個非常小的獨立國，人口不滿百萬。從各方面說，阿爾巴尼亞人要算是歐洲一切民族中最原始的民族。境內一大部分是山地，而沿海岸的一塊狹窄的平原，又給瘴氣所盤據，大部分是不適於居住的。總之，在阿爾巴尼亞，可耕之地真少到可憐，人民幾全賴象養綿羊與山羊爲生，但也有少數人從事於象養其他的牲畜。沒有大的城市，沒有

實業。生活程度是意外的低，尤其在南部；而且，說起來真有趣，居民雖然特畜牧爲生，但大部分是吃素的，所以獸肉、羊毛、獸皮三者，就成了阿爾巴尼亞的主要輸出品。每個家庭都是絕對而且永遠自給，自己織造衣料，自己製造食物，和市場毫無關係。三分之二以上的居民是回教徒，這是長時期的土耳其統治的遺產，因爲阿爾巴尼亞之變成獨立國家，不過是一九一二年的事情。在北部一帶，即阿爾巴尼亞比較開化的區域，天主教就佔相當的勢力，而南部則爲阿爾巴尼亞的正教的勢力範圍。但在這樣原始的民族中，宗教的差別是不能成爲大問題的，因爲他們的文化生活，還是以家庭爲單位，而不以社會集團爲單位。

阿爾巴尼亞之獲得自主，是第一次巴爾幹戰爭的結果。一九一二年時，這個國家的人民發生一次對土耳其的總反抗。後來經過一次奧托曼帝國之准予自治，他們便藉意大利與奧匈帝國的幫助，宣佈脫離土耳其而獨立。一九一三年，列強承認阿爾巴尼亞的獨立，並派惠特公威廉(Prince William of Wied)爲該國的元首，但是這個元首，因各國爲欲在阿爾巴尼亞伸張自己的勢力而互施陰謀的結果，始終未能鞏固其位置。在大戰期中，阿爾巴尼亞的北部爲協約國所佔據，南部

爲希臘人所佔據，當時的希臘人，很想把阿爾巴尼亞的南部與伊庇魯斯的其餘部分一樣，併入自己的版圖。一九一五年，協約國的某秘密條約，決定瓜分阿爾巴尼亞。第二年，奧匈帝國與布加利的聯軍佔有其地。一九一七年，意大利在那裏建立獨立國的阿爾巴尼亞共和國，置於自己保護之下。一九一八年，當奧匈帝國崩潰之時，阿爾巴尼亞受協約國的卵翼，成立臨時政府。但是這個政府因爲人民所反對不能鞏固其統治權。到了一九二〇年，他們更起而革命，建立敵對的國民政府。經過一番考慮，意大利人終於決定承認國民政府，而撤退其駐阿的軍隊，但當意大利人退出之時，南斯拉夫人忽從東方侵入境內，直等協約國以最後通牒強硬制止，方纔退兵。自此以後，至一九二四年爲止，是查格 (Ahmed Zogu) 掌握政權的時代。但是一九一四年由萬諾里 (Monsignor Fan Noli) 策動的叛變，卒推翻查格的政府。查格於是遁至南斯拉夫，借那個國家的幫助，組織一枝軍隊，率以侵入阿爾巴尼亞，重復奪得政權。一九二五年當新憲法實施之時，他當選爲總統。到了一九二八年，又改變其地位，成爲查格王 (King Zog) 了。查格在再起之時，固然傾向於南斯拉夫，但一等政權確立之後，就改變方針，改向向意大利求助，一九二五年新憲法的實施，便是意大利替他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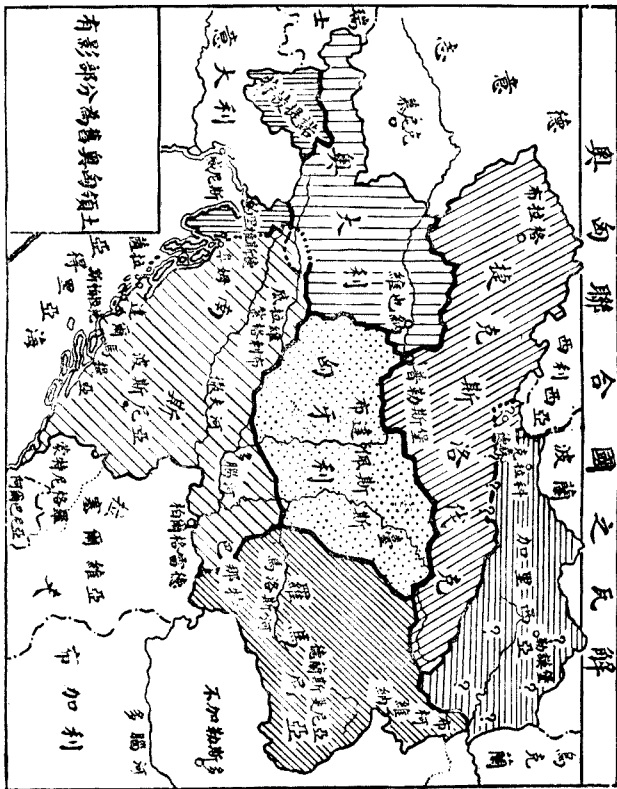
的主意。此外，阿爾巴尼亞國家銀行以及以促進阿爾巴尼亞的文化爲其目的的阿爾巴尼亞經濟發展公司（Corporation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lbania）之建立，皆由意大利擔任供給經費。自那時以來，阿爾巴尼亞大體上可說是在意大利支配之下，這種情形，一方面所以遏止希臘與南斯拉夫瓜分阿爾巴尼亞的野心，另一方面所以消弭阿爾巴尼亞恢復領土的傾向，原來在阿爾巴尼亞，也儘多妄想擴張疆域，欲將希臘與南斯拉夫統治下的阿爾巴尼亞人所在的區域，收爲已有的人們呢。



## 七 匈牙利與大利瑞士

戰前的奧匈帝國，擁有五千一百萬的人口與二十六萬一千方哩的領土，包含兩個地位相等，各有其議會的國家，即奧大利與匈牙利，自經一八六七年重新組織以來，這兩國共在哈布斯堡土家下，藉純粹的人的關係，結合而爲一大帝國。至於自一八七八年來受奧匈帝國管轄，一九〇八年，正式併入奧匈帝國之波斯尼亞與黑塞哥維那兩區，則由所謂兩王國的聯盟共同保有之。本來隸屬於奧大利的匈牙利，差不多自十八世紀的初葉起，即已享受極大的自治權。但是到了十九世紀的初期，那裏忽萌芽着熱烈的獨立運動，卒爆發而爲一八四八年由噶蘇士 (Louis Kossuth) 領導之革命，因而到了第二年，有獨立的匈牙利共和國出現。但這次革命，到底歸於失敗，匈牙利重又屈服於奧大利下者幾二十年。後來，奧大利退出德國的勢力範圍，對匈牙利的讓步，業已成爲必要，所以立即頒布新憲法，規定奧大利與匈牙利，爲哈布斯堡帝國中地位相等的國家。不過有幾種政務，

奧匈聯合國之瓦解



有影部分為舊奧匈領土

包括軍備在內，則仍由聯合政府處理。惟以奧大利人在聯合政府中的優勢，常常引起糾紛，及大戰發生之時，這種糾紛遂益趨尖銳，偌大的奧匈帝國，卒因屬地之紛紛離異，呈土崩瓦解之象。

## 匈牙利

一九一八年當奧匈帝國分裂之時，各省區俱從事於國民議會與自治政府的組織，就中加羅爾伊伯爵（Count Karolyi）所領導的國民議會，統治着匈牙利的大部分，但登臺沒有多久，加羅爾伊便碰到一個重大問題，那就是原來在匈牙利管理下的非馬札兒人的區域之對匈宣佈獨立。同時羅馬尼亞、捷克及其他各國的軍隊，開始佔據戰前匈牙利的各個區域。就中羅馬尼亞人一直到休戰以後，猶復由協約國允許其擴展對匈的佔領。前述之加羅爾伊伯爵，因外有強隣的侵逼，內有社會黨與共產黨的搗亂，自知無法維持其政權，乃於一九一九年三月提出辭職，而將政權讓渡給社會黨與共產黨。這兩黨於是着手組織蘇維埃式的政府，擁倍拉昆（Bela Kun）為領袖。倍拉昆時代的來臨，使匈牙利陷於嚴重的內亂，尤其在鄉村區域，這是因為力圖壓服地主的共產

黨，與在某幾個農民區域中，有根深蒂固的勢力的地主猛烈鬪爭之故。但是匈牙利國內的糾紛，竟不容匈牙利人自己解決。一九一九年夏季，羅馬尼亞的軍隊長驅而入匈牙利，倍拉昆的政府就此顛覆，倍拉昆遁逃至俄，而企圖繼倍拉昆握得政權的庇特爾（Peidl）領導下的社會主義的政府，亦於成立後一星期被古迭達所推倒，哈布斯堡皇裔約瑟大公（Archduke Joseph）被載為執政。但羅馬尼亞的軍隊，藉口於這件事情，繼續前進，佔領布達佩斯。在協約國高壓力之下，哈布斯堡的皇裔終於被迫離位，而羅馬尼亞的軍隊，則一直等到十一月，方纔於舉行一番巨大的破壞之後，帶着無數的活動財產與生產工具，退出布達佩斯。照協約國的意思，本來想聯合匈牙利的各政黨，組織混合內閣。但這個企圖還沒有實現，荷綏（Admiral Horthy）提督已率領非正式的軍隊入布達佩斯，抓得政權。一九二〇年所選出的國民議會，替匈牙利訂立新憲法，但同時也替匈牙利造成白色恐怖。此種白色恐怖，即為專對往年參加社會主義政府的分子而發。第二國際對匈牙利肆意屠戮勞動階級領袖之舉，大為不平，因而於一九二〇年六月，議決對匈牙利施行國際抵制。但這種抵制並無效果，匈牙利人漸漸的在荷綏攝政的新政府下面，安定下來。一九二一年，哈布斯堡皇

喬查理大公曾兩次回國，圖謀復辟，結果都爲小協約國（羅馬尼亞、捷克、南斯拉夫）所嚇走。小協約國聲言，如匈牙利容許哈布斯堡王朝復辟，則他們定將派兵攻打匈牙利。至這些各分得奧匈帝國的一樹之國家，所以百計阻止哈布斯堡的復辟，則無非覺得這事對於他們新經確立的主權，是一種永久的威脅罷了。

當一九二〇年時，匈牙利政府曾在協約國強力劫持之下，簽字於脫里亞農條約，承認專斷的國界劃分方式。這種劃分方式，將戰後的匈牙利，囿於非常狹小的範圍。戰前匈牙利的領土，共爲十二萬五千方哩。因了脫里亞農條約而讓給他國的領土，不下九萬方哩。戰前匈牙利的人口，爲二百一十萬。及至一九二〇年，減至八百萬與九百萬之間。還有這種劃分方式使匈牙利不得不將三百三十萬的馬札兒人遺棄在喪失了的土地，換句話，這個馬札兒民族所組織的國家，竟至不能不劃出全部馬札兒人三分之一，交給別國去統治。在戰前，馬札兒人居匈牙利全人口百分之五十四。但在戰後，他們就多至百分之九十。剩餘部分，是百分之七的德國人，以及小數目的斯拉夫民族——多半是斯洛伐克人。所以現今的匈牙利，可說是一個民族非常純粹的國家。但是匈牙利既有三分

之一的馬札兒人給圈出國界以外，故其恢復領土的希望，非常熱切，且對於一九二〇年劃分國界的原則，極不願認為固定不易。無論那一幅說明戰後歐洲的政治區分與人種區分之地圖，都會指示我們說，戰後匈牙利的疆界，只有西部是依照人種區分的標準而劃定的。除此以外，互北部一帶，有一塊住有衆多的馬札兒人的土地，劃給捷克；沿東境的大部分，有一塊同樣的土地劃給羅馬尼亞；在南方，環提索河（Tisza）一帶而居住的大數的馬札兒人，受統治於南斯拉夫；又如就中部德蘭斯斐尼亞而論，雖然其中有一塊極廣闊的土地，主要的居民是羅馬尼亞人，致將該區域內的馬札兒人與其他的馬札兒人截分為兩，可是馬札兒人之被包於中部德蘭斯斐尼亞，因而受羅馬尼亞的統治者，其實也不在少數。所以，縱使住有被包的馬札兒人的德蘭斯斐尼亞不能不算是匈牙利已經永遠喪失了的領土，誰敢保證匈牙利人不會把眼光放到給束縛着的疆域以外，而對着住有大數目的馬札兒人的鄰區貪婪地注視呢？

像這樣，戰後匈牙利領土的奇縮，從人種方面說，其不合於理，實出意料之外，原來這事是有經濟的意義存乎其間的。舉幾個例：羅馬尼亞與匈牙利間的疆界，在劃分之後，使羅馬尼亞獲得沿多

腦流域至德蘭斯斐尼亞高原的西部之鐵道線。這是什麼緣故呢？便是因為這些鐵道線，形成了通過高原地帶中部最自然的交通工具。又如在北部，鐵道線也為決定新疆界的重要因素。又自然富源，也是一個理由，例如在東部，匈牙利在戰前的重要的煤鐵區域，都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被劃入捷克。除此以外，軍事觀點亦佔着重要地位，原來當訂定新疆界時，承襲奧匈帝國遺產的國家之要求，無不如願以償，而匈牙利則被置在一個毫無天然屏障的大平原中，對於來自四圍的山地的攻擊，完全失其招架之可能。

被關在這個歐陸中部的平原中的戰後的匈牙利，於是只好成爲農業國，專事墾植了。在匈牙利的全部土地中，可耕之地佔百分之六十，牧場佔百分之十八。而在全部可耕土地中，用來培植雜糧的，佔四分之三。這使匈牙利成爲小麥，其他的雜糧及糖之重要輸出者。牲畜與獸肉亦有輸出，但次於上述諸品。所以匈牙利受農產品價格暴落的影响，實非常重大。除小麥價格的驟跌以外，隣國爲保護自己農產品的利益起見之關稅壁壘，也給與匈牙利的農產品以甚深的打擊。工業上，戰後的匈牙利是處於非常困難的境地。和約使他喪失五分之四的鐵礦以及巨量的煤。故大部分的煤

以及大部分供國內消耗的製造品，都有賴於國外的輸入。固然，匈牙利還是保有大大部分的大工廠，尤其是在國都所在的布達佩斯；可是這些工廠的巨大的原料來源，現已不復爲匈牙利所有，這使工廠的繼續開動，感受極深的困難，匈牙利之所以在世界恐慌未爆發前即有巨大的失業人口，這大概也是一個重要原因。不過在過去期間，匈牙利尚能依農產品的輸出，造成進出口貿易的平衡，至如一九三〇年那樣，則竟辦到一個小數目的出超。匈牙利的主要市場是奧大利、意大利、捷克三國；自這些國家實行輸入限制以來，匈牙利的輸出品遂大受打擊。又如原來經過匈牙利的鐵道的國際運輸，到了現在，大部分已改取其他的貿易路線，這也使匈牙利喪失了不少收入。總之，自大戰以來，匈牙利的財政狀況是極端的不安定的。

匈牙利第一次企圖整理其財政，是在一九二一年，那時匈牙利的政府設立一個國營的機關，專事發行紙幣。但是到了一九二三年，因財政困難使之不得不向國聯呼籲，懇求給與如國聯在上年曾給與奧大利那樣的援助。結果爲國聯拒絕，就是國聯不允將如會貸給奧大利樣的有擔保的借款，貸給匈牙利。但匈牙利人爲急於獲得借款，不得不承認外力把持自己財政權之條件，如在外



力監督之下設立一個新的紙幣發行銀行之類。國聯這纔許之發行以英、美、意及瑞士四國爲主要募集區域之五千萬金圓的國外公債，藉以酬其馴順。自此以後，安定的工作急速進展，國聯所委派的專任代表，居然於一九二六年完成他的任務，辭職離匈。但是一九一九年及其後數年間的世界恐慌，卻使匈牙利的財政，因輸出品貨幣價值的暴跌，以及外債的真正負擔的驟然加重，又陷於混亂的局面。國聯這樣又對匈牙利施行干涉，貸以新借款，助其脫離難關。至於這種借款的影響，則在本書中的其他各處，當說起國聯設法幫助歐洲陷於困境諸國打開財政難局時，屢有論及，這裏恕不贅述了。

綜上所述，我們很易看出被關在新境域內的匈牙利，無論在經濟上或在政治上，都給配置在不幸的地位。匈牙利都城，人口百萬的布達佩斯，曾經做過有現今的匈牙利兩倍的人口與三倍以上的領地的國家之都城。那裏的工業，原爲適應廣大的領地的需要而設，自匈牙利在大戰中喪失大部分的領土，於是欲求布達佩斯的工業適應於驟縮的國內市場，乃成爲難中之難。要想把剩餘的貨品輸出國外嗎？則隣國有的是高率關稅，足使其貨品，休想出國境一步。主要工業如麵粉業與

製糖業，因隣國俱欲搶取這兩項食品製備工業的生意，受打擊尤大。布達佩斯的地位，以之與維也納相較，雖比較的不大困難，但也儘足以引起嚴重的問題了。還有一層，匈牙利從隣國所受到的仇視及由隣國欲造成經濟自給之企圖所吃到的虧，實比任何國家爲大。因爲小協約諸國，深恐匈牙利恢復戰前的優勢，爲他們的威脅。他們知道戰後領土的改訂，從民族方面講，是不合情理的，所以決定大家聯合起來，以強權迫使匈牙利就範。而在匈牙利方面，則人民於痛恨國土的喪失之餘，勾起了戰前帝國人民所本具的情緒，所以帶有危險性的熱烈的民族精神，正方興未艾。因此匈牙利

的現狀，始終是在不安當中，雖然已給和約解除了武裝，關在毫無軍事防備的疆域內，守且不能，遑言攻人；但是我們知道馬札兒民族與其隣國間之緊張的關係，實替未來的領土糾紛，繼續地在播散有力的種子。誰也不敢說戰後匈牙利的國界是公平的。誰也不敢說這種國界是含有永久安定的要素的。

戰後的奧大利與匈牙利一樣，是個天主教徒的國家，人民非常純粹。但除馬札兒人自成一種勢力外，戰後奧大利的人民，有百分之九十七是操德語的，且此種人民的種族與文化，亦莫不與對隣の德國人民相似。因此之故，匈牙利人的唯一希望是領土的擴大，而給和約陷於更爲困難的境地的奧大利，則其多數人民都以與德國成立經濟上與政治上的聯合，爲最大的希望。自一九一八年以來至現在止，奧大利之不能就小範圍的疆域內建立平衡的國計，實甚顯著，尤其是維也納，曾爲堂帝國的都城的，現已一降而爲狹小的農業國的都城，當奧大利受四圍的關稅障壁及其他國際貿易方面的人爲的制限的重重束縛，而陷於經濟孤立之時，這個都市是只有日即於衰微與半餓死的狀態的。所以奧大利最重大的問題，是維也納問題，是維也納與狹小而饑瘠的農業區域間的問題，至於奧大利所以有這種狹小饑瘠的農業區域，則完全由和約造成。

爲奧匈帝國的主要分子的戰前的奧大利，有三千萬以上的人口，與十一萬六千方哩的領地。和約結果使人口減至六百五十萬，領土減至三萬二千方哩。但這些數字，似不足以概其式微情形，因爲在戰前，維也納是奧匈帝國的金融中心，而奧大利的工業，則不但與本國，就是匈牙利也是主

要市場。還有奧國現在已喪失其舊有的海口，如的里雅斯德（Trieste），波拉（Pola）兩海口，達爾馬提亞省的海口，波斯尼亞及黑塞哥維那兩省的海岸，皆非其所有。因此現今的奧大利，已變成純粹陸地的國家，且全境多山，不適耕種。我們儘可以說，奧大利的全境，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山地。就中有森林者約佔百分之四十。總之，奧大利的全部土地，其在墾種中者，不到四分之一。維也納的人口，近兩百萬，幾居國內全部人口三分之一。爲要養活這巨額的都市人口，缺乏耕地的奧大利，每年就得從國外購進鉅額的雜糧。所以奧大利如果想生存下去，非有輸出品不可。可是不幸，其向來所依賴的許多原料品，已跟着喪失了的領土以俱去。他只有極小量的煤。不幸中的大幸，則爲鐵礦尚稱富饒，且巨大的森林富源，又供給木材工業及造紙工業以充分的原料，因而使得木材及紙張二者，成爲出口貿易的重要部分。假使沒有隣國的關稅障壁，織物，金屬，木材，紙張等工業，也許可以使奧大利本以有易無的原則，獲得一個滿意的生活標準。無如這個國家，正如匈牙利一般，環繞其四面的，是一羣只想賣東西給他，而不願向他買東西的國家。所以，不管奧大利對於輸入品怎樣加以限制，也無法避免巨額的不利的貿易差額，不得不依賴外債度日。奧國所以能履行清償外債的

義務，唯一的方法便是舉借新債。一九二二年向國聯的第一次呼籲，換來了二千五百萬的借款，大半由英、法、意、捷克四國擔任募集；自此以後，又一再向國聯懇求援助，致其財政與國內政策，須受國聯出面的外來勢力之嚴格支配。直至現今，奧大利的財政權，猶在國聯所委派的代表的掌握中。奧大利之所以能苟延殘喘者，完全因為那些債權者，不願見其陷入絕境，尙勉強給以新借款。

正像匈牙利一般，當大戰將終，奧匈帝國崩潰之時，奧大利大部分的區域，也宣佈自立。一九一九年開幕的國民議會，意欲將奧大利的殘餘部分，併入新興的德意志共和國。這種企圖立即被協約國所否決，因為協約國不願德國伸展其勢力於歐洲的東南兩方，其後一九二〇年與一九二一年，德奧聯合之議又起，但俱無效果。協約國，尤其是法國，對奧大利人明白表示，對於德奧兩國的聯合，協約國萬難承認，所以奧大利人應以在限定的境界內保持完好的獨立為滿足。而一九二二年的國聯借款則即以奧大利人確實拋棄德國聯合之政策，作為一個條件。自是以往，奧人遂只有在協約國的財政把持下，盡可能的繼續奮鬥了。因了維也納與國內其他部分間政治形態之顯著的差異，他們的困難，愈益尖銳。維也納永遠是社會主義勢力的都市，因為這裏的市政府，係社會黨所

組織成立以後，即在重重困難中掙扎，他可說是歐洲最富進取性的市政府。但是住在維也納以外，構成奧大利大部分的人口之貧窮的農民，都不是社會主義者。他們所信仰的，是天主基督社會黨，對於維也納之發達當然懷着極大的嫉忌。大戰剛終了時，因了農民中止對維也納的供給，維也納的居民幾乎全體餓死。戰後的奧大利是個聯邦制度的國家，維也納爲九大自治區域中之一，然而此種組織對於都市與鄉村間的惡感，曾不能化除些許。大戰以還，社會主義者在起初尙能組織政府，統治全國，但後來卒遭挫敗，除維也納一地外，社會主義的勢力消滅殆盡；基督社會黨聯合小規模的資產階級政黨，起而把持政權。此後，奧大利幾於發生好幾次真正的法西斯革命，及至一九二七年，又曾有若干時日幾乎陷於內戰，但社會主義勞動者的罷工，卒被軍隊與農民的合作所破壞。這個國家的社會民主黨，在國會中頗佔勢力，但與基督社會黨及汎德意志農民同盟相較，則始終不會達到顯明的多數地位。

迨至一九三一年，奧大利人受世界恐慌的侵襲，對現狀大爲失望，於是又企圖與德國完成某種方式的聯合，他們商得白魯寧主持下的德政府的同意，提出德奧關稅同盟的方案，純粹經濟性

質而非政治性質的德奧聯合之方案。但是對於這個方案，法國立即予以否認，並強迫德奧兩國放棄此種企圖。德奧兩國違反和約的問題，最後移至海牙國際法庭審理。在這其間，法國曾明白表示，不管國際法庭的判決怎樣，法國決不能容許德奧經濟聯合的實現，因為這種聯合，自法國的政治家看來，實即是政治聯合的初步。結果，德國只好在協約國的壓迫下放棄原有的計劃，而財政上陷於絕境的奧大利，遂不得不再宣一次從此不敢復有輕舉妄動之誓言，作為從國聯再獲得一次暫時的援助之交換條件。

自從那時以來，奧大利的局勢，愈趨複雜，這是因為德國南部的國社黨的勢力侵入奧境，引起了奧大利國社黨運動之故。國社黨領袖希特勒原是奧國人氏；德奧的合併，早就成為國社黨目標之一。在目前，奧大利國社黨獲得政權之路，正被陶爾斐斯（Dollfus）領導下的基督社會黨政府所阻斷。這個政府有一枝非正式的軍隊，名叫鄉防軍（Heimwehr）相當於德國的鋼盔團（Stahlhelm），任拱衛之責。嚴厲的獨裁政治的建立，國會權力的停止，藉教王與法西斯意大利的幫助，努力抑遏國社黨的活動，這都是陶爾斐斯政府在過去期間的事績。德意兩國所以不能毘連，

完全因爲奧國西部阻隔其間，故以理言之，德意兩法西斯政府也許可以因大家希望那個區域併入德國之故，彼此結合起來。但在事實上，慕沙里尼深恐國社黨在奧國的得勢，將引起中歐的政治糾紛，故始終拒絕幫助，對於陶爾斐斯的政府，則反予以有力的扶掖。然而這個政府的基礎，到底極不穩固。所以要預測這個國家的前途，即使短如數個月，也是不可能的。奧大利的社會黨組織非常堅固，其對國社黨的反抗力量，也許可望比德國的社會黨爲強；無如他們已被陶爾斐斯解除其非正式軍隊的武裝，且其在鄉區的勢力，向來非常薄弱，故奧國的社會黨此後能否繼續維持，實大成問題了。

## 瑞士

在奧大利之西，是瑞士聯邦共和國，中間還插着一個小自治國，那就是里支登斯敦（Liech-

tenstein）（註）。瑞士多山，不亞於其東隣，但工商業之發達，則與其東隣工商業之不振成一顯著的

對照，且如都市人口畸形發達，鄉間人口意外稀少那樣的弊病，瑞士也能夠完全免除。除英國與比



利時以外，瑞士可說是歐洲工業最發達的國家。在全部有職業的人民中，百分之五十以上從事於工商業，百分之七從事於轉運業，而特各種農業為生者，僅百分之二十七。因此，瑞士是雜糧與其他食品之重要輸入者。這種輸入，一部分藉輸出製造品為補償，還有部分則藉遊客的旅囊為補償。然而一般人當說起遊客的數量可以解決多少瑞士人民的生計那樣的問題來時，每多誇大的敘述。例如：在世界恐慌尙未發生的一九二九年，到瑞士遊覽的人數，共為二百七十萬；但是瑞士人之從事於各種旅館業者，卻一共只有六萬三千，以視從事於工業者的總數，真藐乎其小。因為在瑞士，單就操五金業與機器業的人數而論，已有二十二萬四千之多。固然，旅客的錢包，是瑞士經濟生活的要素，是瑞士所以能夠不受入超打擊之重要原因，可是就大體上立論，我們不當把瑞士看作僅僅供遊玩的勝地，而應該視為工業國。瑞士的冶金工業，規模之宏大與技術之精良，俱列於最上等，唯大部分的原料必須從國外輸入，為美中不足。瑞士的棉織品，蠶絲，染料等，俱有輸出；唯毛織品則輸入多於輸出。舉世聞名的鐘錶，在國外貿易中，當然居於重要地位，然而較之冶金業與織物工業，鐘錶業就得變成次要。農業品的輸出，以乾酪與煉乳為大宗，至各種食糧，則如前面所述，輸出遠不及輸

入之大。

爲瑞士聯邦的基礎之同盟，其成立的時間，遠在十三世紀。瑞士的歷史，是漸進的，因爲這個國家是藉各區域陸續加入而成立的。當一八一五年時，就在奧英普俄四國聯合擔保之下，確立他的中立，並藉沮利克公約 (Pact of Zürich) 獲得三個新分區，卒以造成今日之面目。一八四七年，新教徒的區域與天主教徒的區域間，曾發生衝突，故第二年的革命，遂使瑞士得有一個新憲法。此後幾經修正，尤其是一八七四年那一次，對於憲法的內容，頗有增減，但大體上，則一八四八年的憲法，在今日依然有效。這是以聯邦制度爲立腳點的憲法。瑞士的分區，數凡二十有二（其實以二十五之數爲較妥，因其中有三區現已重加區分；）照憲法的理論，每個分區皆無異是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只有限定的幾種事務，必須讓給中央政府去處理。這些獨立的分區，對於破壞聯邦權力的任何行動，始終視爲大敵。但在過去的半世紀中，由於環境的逼迫，中央政府的權力事實上已大有增加，這是因爲新事業必需發展，舊事業的管理必需統一之故。直至一九一四年爲止，主張中央集權的急進黨，往往在政府中佔着大多數。但大戰以後的比例代表制，卒打倒此種大多數，而使以後的

政府，都不能不變成混合政府。不過急進黨在一九三三年還是最大的政黨，勢力相差不遠的是社會民主黨，以及主張維持地方自治權之天主教堂。又農民黨也佔有相當的議席。

所以在瑞士正如在其他的國家一樣，比例代表制的結果，是政黨的增多，與把持政府的勢力之分散。然而由於複決權的關係，瑞士比例代表制的功效，到底與其他各國有些不同。瑞士的複決權，較其他任何國家更爲廣泛，由這種方法的影響，使瑞士的政治，偏於極端的保守方面。因此，革新的建議，常遭否決。且每有建議，必須取決於選舉人的直接投票，政府受此束縛，自不樂爲澈底改革的提議了。而瑞士遂因此享受着歐洲最安定最沒有變化的政治制度，以迄於今。不過瑞士能以這樣硬性的政治制度，而保持其國內的安寧，其最大原因實由於具有一個特殊的地位。由上所述，可見瑞士的憲法對於革新及政治上的極端舉動，都非常冷淡。晚近以來，因了社會主義的興起，爲瑞士人口重要分子之中等階級，忽然對法西斯主義表示很熱烈的傾向。德國民族所在的幾個分區，甚至已經發生過國社黨起來革命的呼聲，而且已不僅一次了。

瑞士的人口總數，在四千萬以上，大部分操德語。在二十五個分區中，德語佔優勢者十九個，法

語佔優勢者五個，餘下一個，是意大利語佔優勢的區域。以言數目，操德語者超過二千零七十五萬，操法語者約八十萬，操意大利語者二十五萬弱，其餘的人口，則操另外的方言，如奇異的羅曼希語（Romansch），亦其一種。我們又須知道，居留瑞士境內的外僑，總數在四十萬以上，這當然沒有將暫住的遊客計算在內。關於宗教，新教徒較天主教徒更佔勢力，前者約居全人口百分之五十七，後者約居百分之四十一。此兩種勢力的區分，可說完全是地理的。由此可見瑞士人在民族上與宗教上都不一致，但因久受同一政府之統治，故雖然缺乏這些團結上的要素，也能保持其熱烈的愛國心。至於外交政策，則向來受中立觀念的支配。瑞士的中立，如前面說過，遠在一八一五年時，就獲得列強的聯合擔保；而大戰後最初數年瑞士所以逡巡未即加入國聯，就因為恐怕自己的中立受到損害之故。但是到了一九二〇年，到底也加了進去，並為之供給會址，緣當時各國會給以明確的擔保，說接受盟約一舉，決不致損及中立，故瑞士始有此種舉動也。

國聯會址所在的瑞士，在國際經濟方面，無疑的佔得許多便宜。除十分發達的工業外，瑞士並有十分完備的銀行制度，近年以來，曾參加國際金融事業，非常活動。瑞士向來就有充足的現金準

備，就瑞士的幅員與商業而論，這種準備金可說是意外的巨大；及至一九三一年，尤大有增加，竟爲五年前之五倍，推厥原因，一爲國外資本之流入，二爲中央銀行因保障財政安全起見，將自己掌握中的國外匯兌統化成現金。還有一事，使瑞士在經濟上地位非常重要，原來瑞士是許多國際企業聯合之中心，尤其是五金工業與機械工業。如果不缺乏煤，瑞士的冶金工業，定可有更大的發展。但煤的缺乏，到底也不能爲瑞士的重大問題，因爲這個國家會努力於水力的發展，不論在工業上與運輸上，都可大規模利用水力。因此之故，縱使在過去數年間，因維持金本位的結果，出口貿易大爲減少，且戰後數年，亦曾因國幣的價值高過外幣受到巨大損失，但瑞士卒能藉近年來電氣化的發展，提高其經濟地位。可是經濟地位的增高，仍無補於巨大的失業人口，這種巨大的失業人口，是社會主義的發展及勞動階級的不安所由起，而社會主義的發展及勞動階級的不安，則爲如前面所述，中間階級與農民傾向於法西斯主義的由來。

(註) 大戰前的里支登斯敦關稅及其他重要事務，都與奧匈帝國合併辦理。大戰以後，加入瑞士的關稅區域，同時並把郵電等事務，也交給瑞士去辦。但是依然是個獨立自主的國家，雖其人口只有一萬。



## 八 捷克斯洛伐克

人口近一千五百萬，面積五萬五千方哩的捷克，在經濟上，是從戰前的奧匈帝國遷變而來的國家中，最重要的國家。其波希米亞，摩拉維亞（Moravia），西利西亞三區，本屬奧大利，而斯羅伐基亞（Slovakia）與魯德尼亞（Ruthenia）兩區，則爲匈牙利的舊屬。事實上，捷克民族的國家，是當大戰的時候借別國的地方產生的；因爲大戰發生之始，以馬沙里克（Masaryk）爲首的三執政，即設法獲得協約國的扶助，着手建立捷克國民政府，而三執政（馬沙里克，裴尼士（Benes），斯蒂方尼克（Stefanik）的總部，則設在外國，尤以在巴黎的時候居多。但馬沙里克及其同僚事實上卻並不久居巴黎，因爲他們必須在各協約國的都城間奔走，勸誘協約國給他們建立新國家的計劃以贊助。並招集奧匈帝國軍隊的逃兵，組織軍隊，以爲協約國的聲援；這種捷克民族的國民軍，給分配在各前綫服務，尤其在俄國，他們是沙皇軍隊的補充隊伍。自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後，俄國退出

戰爭，於是在俄國的捷克軍隊，與其本國頓失聯絡，並給截斷了協約國對他們的援助。及至布爾什維革命以後，俄國人怕這種軍隊將爲自己的隱憂，下令解除武裝，但捷克軍抗不受命，於是由協約國供給軍火，開始佔領西伯利亞的一部分區域及沿伏爾加河（Volga）一帶，使新建的俄政府，曾經有一個時期，不能從東方取得食糧的供給，並使德國也連帶的受同樣的影響。所以大戰結束以後，捷克軍隊遂變成俄國內戰中的重要因素，直至經過了一個極長的時期之後，纔退出俄境，取道遠東返國。

奧匈帝國境內的捷克民族宣佈獨立，時在一九一八年十月；未幾大戰結束，馬沙里克及其同僚於是回轉本國，正式建立新國家，而獲得協約國迅速的承認。當劃新疆界時，協約國對捷克抱着慷慨的態度，所以和約的結果，只有極少數的捷克人與斯洛伐克人給遺棄在捷克的境界以外，而住在捷克邊界上的異種民族，數目卻非常巨大，——西部與北部有德國人，接近匈牙利邊界一帶有馬扎兒人，東部有魯德尼亞人。可是協約國的慷慨的態度，同時也把捷克造成一個狹長的大陸國家，使其自東至西的境域，綿互至六百哩，而自北至南的境域，則有狹至五十哩者，即最廣闊的部



分亦僅有一百二十五哩。因此，捷克有着極長的國界，一旦邊疆有警，殊覺窮於應付。加以與之接壤的五國，即奧大利，匈牙利，羅馬尼亞，波蘭，德國，其中只有波蘭，因喀爾巴阡山脈的關係，總算與捷克隔分得非常清楚，其他四國，都沒有這種顯明的分界綫。所以捷克最怕孤立，自大戰以來，始終以拉攏強大的鄰國自固，爲其唯一的外交方針。捷克所引爲大懼的，是匈牙利恢復領土野心，故爲維持巴黎和約解決方案起見，與羅馬尼亞及南斯拉夫共同組織一個政治集團，即小協約（Little Entente），以對付匈牙利。至於對奧大利的關係，較之對匈牙利的關係雖已緩和得多，但捷克始終以奧匈帝國的復活爲懼，則爲不可掩飾的事實；在大戰後最初數年間，哈布斯堡王家會屢次企圖在匈牙利復辟，俱因捷克的阻撓而不得成功，即其明證也。

小協約國之在歐洲，向來是被視爲東歐與中歐諸國的政治集團，而法國則爲其背後的策動者。但近年以來，法國的政治動向，漸呈舉棋不定之象，於是小協約國內部的團結，逐漸進步，比從前更加信任這種團結力。因此到了一九三三年二月，捷克，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三國間，有新條約的簽訂，更加鞏固了小協約國的組織。據新條約所載，小協約國的分子必須遵守共同的外交方針，非經

大家同意，不得舉借外債。其具體辦法，是由三國的外交部長共組一個永久性質的參議會，指導外交方針，並設立一個永久性質的辦事廳，襄理一切，這個辦事廳有一部分是常駐日內瓦的。此外又設有一個聯合經濟參議會；這個參議會甫經成立，即提議小協約國須藉政治性質的條約，實現最大的統一性。舉凡多腦河的運輸，以及鐵路，航空，郵政，特惠稅率等，無不併合辦理。且在三個中央銀行之間，亦有極密切的合作。所以捷克，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三國，其政治上的聯合，實已有不少的成就，久而久之，經濟上的聯合恐也不難。這個團結一致的同盟日後能否藉合併匈牙利與奧大利，擴大組織，重建戰前奧匈帝國那樣的經濟單位，在目前當然無從確定，因為小協約國對於匈牙利，既然抱着非短時期所能消弭的敵對態度，而匈牙利人亦始終不肯放棄其修改和約的希望。然而這是確無可疑的：即小協約國內部關係之變成更加密切，更加永久，是中歐與東歐一帶消弭政治的民族主義與經濟的國家主義傾向之空前未有的重要步驟，有了這，每個國家再也不會關起大門，把自己鎖在極狹小的區域內，因而造成經濟活動力的窒塞與歐洲生活水準的低落了。

多謝食糧之充分的生產額，捷克截至目前止，每年都能保持一個有利的貿易差額。固然，捷克

需要輸入某幾種原料品，尤其是原料鐵，不能不仰賴瑞典供給，然而大量的煤與大量的製造品的輸出，已足以抵償這些輸入而有餘。在這個國家，鋼鐵與機械器具，俱有大量的生產。各項織品工業，如棉織工業，羊毛織品工業，亞麻織品與山麻織品工業，蠶絲織品與人造絲織品工業，都有極大的規模與極完密的組織。除此以外，因為甜菜糖有鉅量的產出，所以捷克又生產鉅量的精糖。工業大部分集中於捷克區，而斯洛伐克區則為原料品及食糧的重要產地，東部的魯德尼亞，為比較的不大發達的農業區域。全境有百分之四十二是可耕之地，百分之十八是牧場，差不多百分之三十三是森林地；捷克之所以能生產并輸出大量的木材製品，便因為有這種巨大的森林區。和其他的承襲奧匈帝國的遺產的國家一般，捷克也曾頒布重要的土地法，將大地產重新加以分配，尤其在斯洛伐克區。一九二〇年國民會議所通過的法令，使五十萬個家庭各獲得一些地產，就本來受大地主管轄的土地居住下來。除魯德尼亞以外，所有的區域，墾植標準都是相當的高，農業也採取相當的科學方法了。

然而就捷克在歐洲的地位而論，與其說是農業國，毋寧說是工業國。如前面說過，既具有鉅量

的煤，除供自己消耗外，還有剩餘可供輸出；且又富於水力的供給，近年以來，捷克的電氣化有迅速的進展，便是因為有這種豐富的水力作基礎。除鋼鐵、機械、織物等工業外，輕工業也漸有進展，輕工業品的輸出額，日見增多。例如玻璃與磁器兩項，在世界市場中佔着最重要的地位，又如巴塔（Batavia）這個地方的舉世聞名的製鞋工廠，其出品亦有巨大的輸出，大部分銷往中歐各國。總之，捷克這個國家，自然富源既能充分自給，而其工業設備，又使之有巨額的剩餘貨品可供輸出，所以力謀打破現存的關稅障壁，替自己的出品，尤其是製造品，求得一條通往國外市場之路，顯然是他所希望的。但捷克的全人口中，農民的數目非常巨大，這使捷克覺得為擴大工業品的輸出而犧牲農業利益，究有未妥。捷克甚至不願與東歐的農業國成立自由貿易的協定。不過捷克到底是一個工業國，同時，雖然在數目上較別國為少，他還是個債務國，所以要求出超之念，當然非常急切。因了大量的生產與低下的工資，捷克早就在世界市場中奮鬥得了很高的地位，而且以財政管理得法，亦使之在過去期間，不致如歐洲其他大部分國家一般，忽而採取膨脹政策，忽而又採取緊縮政策，這也是難能可貴的。捷克這樣，可說是個非常富庶的國家，然而非等環境使他能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

而不損及出口貿易，實很少保持此種財富的希望。所以這個國家的政治家的目的，是盡可能的就歐洲政治與經濟方面的現勢下，求得安定，其外交方針，在秉政多年的裴尼士博士（Dr. Benes）的手中，也始終比其他的國家更爲保守，且更爲機會主義的。

然而捷克卻有着非常困難的國內問題，因爲國內的民族非常複雜。在全人口中，捷克人與斯洛伐克人併計，約僅三分之一，而且這兩種人在文化方面的差異極其顯著。但德國人差不多要佔全人口四分之一，此外又有許多極重要的少數民族——馬札兒人百分之五又半；魯德尼亞人百分之三又半；猶太人百分之二又半；波蘭人千分之五。至如宗教，大部分的人民是天主教徒，佔全人口四分之三以上，新教徒僅百分之七，剩餘部分，則信奉其他的宗教。所以捷克的重要問題，與其說是宗教上的差異，毋寧說是民族上的差異。當新興捷克初建之時，居於少數民族地位的德國人，就對已成的事實加以否認，換句話說，就是拒絕參加新成立的政府；自此以後，因了民族的不同以及政治經濟上意見的差異，陸續發現了許多政黨。捷克人所組織的每一主要政黨，必有一個規模相等的德國人所組織的政黨，與之對立，有時候，還有馬札兒人所組織的政黨，穿插其間。只有共產黨，

自從一九二〇年與社會民主黨分家以來，就一意保持統一的局面，這是唯一的不分民族畛域的政黨。直至一九二六年，德國人政黨之隸屬於資產階級集團者，始允與捷克人的政黨合作，組織混合政府。此後，各民族的政黨雖仍保持其獨立，但政黨間的裂痕，已漸趨重於政治經濟方面，民族的差異，倒反而變成次要原因了。這就說明近數年來，這個從和約產生的新興國家，內部已有相當的團結。

然則捷克內部的民族問題，從此已沒有困難了嗎？不。困難還是很多。例如住在東部的魯德尼亞人之地位，便是最難解決的一個問題。原來魯德尼亞人如前面所述，與烏克蘭人同隸一種民族，他們是生活水準與文化程度都十分低下的農民，與捷克民族及德國民族很少共同之點。當一九一八年時，魯德尼亞人的國民會議決併入捷克，而捷克則允許給魯德尼亞人以自治權。後來在一九二七年時，果然有某種聯邦制度的建立，規定魯德尼亞人在處理地方事務時得享受某程度的自治權，然而那種允許，其實並未完全實踐。魯德尼亞與捷克的合併，真正的理由並不在民族方面，其目的只是在使捷克與羅馬尼亞獲得聯絡，造成對匈牙利的更有力的包圍。很顯明的，除俄國

以外，沒有一個國家能比捷克具有更充分的合併魯德尼亞的理由；但將魯德尼亞歸併於俄國，則當然要與戰後歐洲的政治行列相抵觸。且魯德尼亞的烏克蘭人，其與俄國的聯絡實已成爲絕對的不可能，因爲如前數章中所述，魯德尼亞與俄國之間，有羅馬尼亞與波蘭管轄下之各種民族雜處的區域從中阻隔着。其實，對於魯德尼亞與捷克合併是有很優厚的報償的。因爲魯德尼亞是農業區，自從併入捷克之後，便可與捷克的工業區域互相合作，就單一稅區內替自己的農產品求得一條出路，因而獲得迅驟的經濟發展，倘使其與波蘭或羅馬尼亞相合併，或仍隸屬於匈牙利，經濟方面是決不會有此迅驟的發展的。然而這都沒有用處。真正的聯邦制度的缺乏，到底造成魯德尼亞人對現狀的不滿。而且要求自治的，不只限於魯德尼亞一區；斯洛伐克人與捷克人雖同文同種，但到底不能免於顯著的差異，近數年來，要求自治的呼聲，也甚囂塵上。所以捷克的政治問題，決不能說已因一九二七年的改革獲得澈底的解決，不過與其他的脫胎於奧匈帝國的國家相比，則捷克的分裂的原動力，似乎薄弱得多了。

大戰剛終之後，捷克的政權，操於社會黨及農民黨的混合政府手中；這個混合政府的政績，是

一九二〇年新憲法的實施，以及各種社會改革方案，如資本稅的徵收，大地產之重新分配等。後來因社會黨內部分裂，混合政府卒隨之而倒。原來在起初的時候，共產黨的勢力已在工業勞動者中間滋長，及至一九二〇年，包含共產黨的社會民主黨，內部遂突告分裂。當分裂之前，社會民主黨已退出政府，由政府中官僚組織暫時性質的超黨政府，代替已倒的混合內閣。但一等社會民主黨已經確實地分成兩派——即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之後，人數佔優勢的社會民主黨，立即回至政府，繼續服務，不過因分裂的結果，其勢力已大不如前了。一九二一年第三次社會黨與農民黨的混合政府，解體於一九二二年，代起的是農民黨政府，而社會黨則為其贊助者；這個政府的運命，一直延長到一九二五年。那一年的總選舉，社會民主黨一敗塗地，政府的面貌，因了農民黨與天主教黨的混合內閣，煥然一新，而且這兩黨到了第二年，還組織所謂反社會黨的集團，繼續把持政府。一直等一九二九年，因農民黨與天主教黨互相水火之故，這個集團纔告破裂。接着舉行總選舉，社會黨重復得勢，社會黨與非社會黨的混合政府，於焉成立，而共產黨則為其主要的反對黨。自此以後，這個變態的混合內閣，使繼續統治捷克，直至於今。但戰後的捷克，政黨的面貌雖屢有變更，其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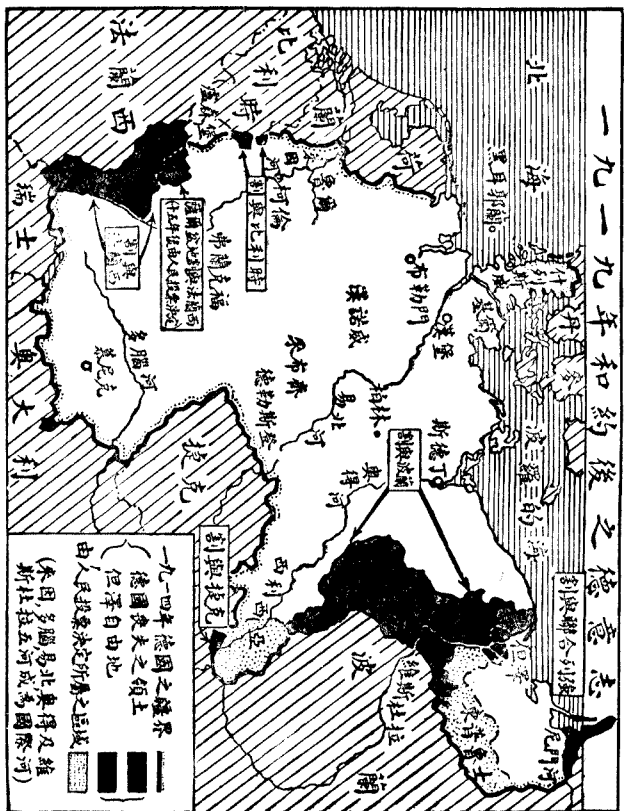
政方針實可說一成不變，尤其是在外交方面。



## 九 德國

一九一八年十月，德意志帝國的堅強的抵抗能力，突告消滅，互四年的大戰，卒在十一月的休戰聲中正式結束，協約國是勝利了，這種勝利，自美國對同盟國宣戰以來，實已成爲必然的結果。原來自美國參戰的一剎那起，雖然有威爾遜總統揭櫫所謂十四要點，但協約國的奢望，已無法遏止，這就是說，協約國已不預備接受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談判，因之，要使他們捨棄瓜分戰利品的存心，也就成爲絕對的不可能了。

這樣，一九一八年同盟國崩潰的結果，是十九世紀在普魯士邦領導下集結而成的大德意志帝國的死亡，以及除喪失所有的海外殖民地以外，還喪失一部分在歐洲的重要領土之新德意志的建立。至於新德意志的政制，德國人雖然沒有對專制政體表示極端的厭惡，但因霍亨索倫王家復位之無望，他們也只好採取共和制度，而建立所謂韋瑪共和國（Weimar Republic），那是緊



承着大戰的終止而成立的，其壽命一直延長到一九三三年。那一年，因了國社黨的革命，韋瑪共和國突然崩潰，正與其成立一樣迅速。自此以後，創造新德國的任務，便落到國社黨肩上，全世界的人們，都在拭目以視其將來的結果了。

因此，當敘述德國時，我們就得講到三個不同的德國；縱使戰前的德意志帝國與戰後的韋瑪共和國都已成了陳蹟，但對於德國的前途，俱有密切的關係，我們不應漠不注意。中途夭折的德意志共和國，是否僅爲德國歷史上的插話呢？德國是否正在對準恢復戰前的帝國制度那樣的目標邁進呢？在國社黨支配下產生的新德國，其性質是否與戰前的德意志帝國及戰後的德意志共和國都截然兩樣呢？還有，國社黨的革命，是否將以不能爲德國社會奠定永久的基礎，而引起另一種革命的爆發，造成第四種形式的德國之建立呢？

但在着手研究三種不同的政治的德國之前，我們必須將歷盡種種政治變化而不變之基本的德國，約略敘述一番。原來德意志這個國家，其經濟的輪廓，雖然在十九世紀中起了急劇的變動，致自農業國一變而爲工業國，但其人民與人民所居住的土地，卻具有幾種基本特點，如果想判斷

德國政治經濟方面的前途，我們是不能不把這些特點當作固定的基礎的。

第一，從農業上說，德國有一大部分是瘠土。像俄國那樣的廣大而肥沃的黑土地帶，德國是沒有的。因為東北方一帶，農業季候最短，長時期的寒冬，使各種農作俱成爲不可能，與更西及更南一帶地方迥異。至如西部，雖有較佳的氣候，但大部分土壤瘠瘠，不適耕種。且德國的山地很多，森林區的範圍至爲廣袤。所以耕種者的努力，要不是乞助於現代的科學方法，便絕難獲得自然界充分的反應。就某幾點說，德國在十九世紀的最大的成功，是一方面能迅速增進主要農產品的生產量，而另一方面仍能不喪失其豢養牲畜者之地位。這種變化，有許多重要原因，如農奴的解放，公有土地之私用與土地之重新分配，合作信用的代理業之發達，化學工業之萌芽及其在農業上之應用，對甜菜種植業之獎勵等皆是。德國這樣，將大規模的農業生產方法應用於大部分的土地，因而使每畝土地的農產品數量，超過具有更肥沃的土地的國家之每畝農產品數量，終於完成驚人的農業革命。要是沒有這種革命，德國斷乎不能實現十九世紀後半葉之迅驟的工業發展。不過這些成功，還是改變不了瘠瘠的土壤，尤其是在東北方一帶，氣候比土壤更成問題，故其農業上的困難，也非

科學方法所能克服。

我們所必須注意的三個新陳代謝的不同的德國，其全部歷史有非常重要的一點，那就是東西兩區域間的顯著的差異，而易北河則宛如這兩區域的鴻溝。易北河以西，並由此而南，可說是小地產農民的住區，雖則在東北方不乏相當數量的大地主。這區域內的農民，大都自耕自種，絕少雇人幫忙。其生活水準向來較都市的居民爲低。其社會的態度，與其他西歐各國的農民十分相似，不同的一點，是他們由國家的訓導，較法國或其他西歐各國之農民較富於合作能力。雷斐孫式（Raf-felsen system）的信用銀行，其歷史遠在一八四九年；到了現在，德國之農村信用會社，總數幾達二萬，此外又有他種形式的合作社，總數在三萬以上。可見德國的農民，在經濟上都知彼此合作，而且他們知道這種功課，較其他任何國家之農民爲早，即丹麥的農民亦趕他們不上，不過在銷售方面，他們好像並不怎樣努力合作，較丹麥人在現時代之所爲遜色多了。

可是東部德意志，則數世紀以來，永遠是大地主的勢力範圍。這裏是擁有大地產的貴族（Junkers）的根據地，同時也是貧無立錐專賴大地主的土地過活的佃農的所在。土地大都磽瘠，地主

的要求，非常苛刻。至於農民，一則因為毫無組織，二則因為脫離農奴制度還沒有多久，故自衛能力十分缺乏，生活水準較之西部德意志的農民，殊有愧色。韋瑪共和國的政府，曾將一部分的大地產重行分配，使農民獲有安居樂業的處所，但效果極微，故在現今，德意志東西兩區域的農業經濟，彼此的異點依然很為顯著。居於大地主地位的貴族，依然不會給韋瑪共和國逐出他們的根據地，則曾經有一個時期，他們的經濟十分困難，致大多數不但對國家負巨大的債務，即欠私人的款項，亦為數亦不少。

戰前德國的領土，面積共約二十萬九千方哩。今日之德國，連薩爾區在內，領土約十八萬二千方哩。可見大戰的結果，就經濟的富源而論，德國的喪失固然很大，若就領土言，其實所失無幾，像這樣的損失，當然不足以變動我們剛纔在前面說過的農業方面的廣泛的結論。所以當研究德國的一般的農業狀況時，我們即把戰前德國與戰後德國間的異點，置之不問，是也不至鬧怎樣了不得的錯誤的。戰後德國的全部領土，普魯士邦佔其百分之六十二，而且普魯士的居民，佔德國全部人口百分之六十一。故普魯士之在德國，自從德國獲得超於地理名詞的意義以來，不論面積與人口，



都佔着最優越的地位，到了現在，此種情形依舊不變。德國的全部土地，森林地帶佔四分之一以上，可耕地帶佔二分之一，草原地帶佔六分之一。德國的人口總額，約六千五百萬。當十九世紀時，這個國家會有很高的生殖率，於是爲增進墾植標準起見，以美國爲主要目標，極力獎勵移民，然而即使如此，還是免不了有人滿之患。加以土壤既如此貧瘠，工業又尚在幼稚時期，對於從國外購進的巨額的食糧，還沒有能力償付，故即欲維持急速增加的人口的生活水準，亦感不易，遑言改進？如果沒有迅驟的農業改良，十九世紀的德國，情形確乎是非常嚴重的；明乎此，則前面所說過的情形，即當時的德國專以發展科學化的墾植方法與推行農業教育爲最致力的兩點，可知其並非無故了。

以工業著稱的德國，其自然富源本不見怎樣富裕，大戰以後，如本章後面的篇幅所述，益形減色。可是德國的碳酸鉀礦本很豐饒，大戰後依然保有一大部分，以德國土壤之礠薄，而卒能增進其農產品的產量，便是得力於這種豐饒的碳酸鉀礦。至若煤礦，則大都集中於魯爾區，照其現在的生產量，除褐煤外，硬煤幾可供給國內全部消耗量的五分之四。又如鐵礦，在大戰前本很豐富，但當一九一八年時，德國在一八七一年從法國奪來的阿爾薩斯羅蘭兩州，物歸原主，於是大部分的鐵礦，

遂隨這兩州而俱去。不過德國自己境內，還遺有相當豐富的鐵礦。這種鐵礦，前面說過的煤礦與碳酸鉀礦，以及其他的礦產，便是德國現代的工業制度所由建立。爲了要維持製造工業，德國在現今比在十九世紀時更需輸入大量的原料品；很幸運，德國雖然因大戰而喪失不少領土，但是爲維持資本主義生產制度所必需的主要用品，即重工業的必需品，卻並不缺乏。不過德國煤的產出，既集中於某幾個區域，故其工業人口也集中於少數人烟稠密的區域，最顯著的有如魯爾區，其次則如上西利亞與薩克森兩區。因此之故，一切關於德國人口密度的平均數字，很足引起人們對於德國人口真正分配的誤解。

除基本的經濟狀況以外，宗教的差異，對於研究德國也非常重要。北部德意志可說完全是新教的勢力範圍，普魯士境內的少數天主教徒，並不能影響大局。他如薩克森，布倫斯威克（Brunswick），條靈吉亞（Thuringia），梅格稜堡（Mecklenburgs）等區域內人民，亦大都信奉新教。但是南部，包括巴威略與萊因地帶的大工業區域，則爲天主教勢力所在，上西利亞亦然。普魯士在德國的領導地位，使過去的德意志帝國染上了新教的色彩。也就因爲這一點，德國終於不能完

成中央集權制。原來天主教勢力所在的巴威略，堅決地主張自治，形成了德國天主教信徒的領導者，儼有與普魯士分庭抗禮之勢。德國的中央集權的趨勢，於是乎大受打擊。德國的新教徒，皆爲路德派，大部分隸屬於所謂福音同盟；現在，國社黨正在施展極大的努力，企圖將福音同盟置於自己管理之下。不過德國的新教徒，因了其地位的優越，向來不覺得有組織政黨的必要，而天主教徒則無論政治上與文化上，都知道大家聯合起來，在德國的全部歷史中，形成一個人數較少，同時卻很有組織很佔勢力的集團，永遠保持其自己的政治方針。

地理上，德國本是個中歐的國家，其與他國的接觸，東南西北四方，都同樣重要。先說北部，與斯坎的納維亞諸國，僅隔着一個波羅的海，所以關係十分密切，尤其是北部德意志，在歷史上與北歐諸國的關係幾於密切到不可分拆。次說西部，緊鄰法國；而從短短的海岸綫打北海望過去，則有英國。凡德國的重要港岸，特別是漢堡（Hamburg）都與倫敦及其他的西歐的金融中心有極密切的商業上及金融上的往來。至於南部，則與奧大利接壤，這個國家曾爲神聖羅馬帝國的重要分子，而神聖羅馬帝國，則大部分係德意志各邦所構成，德奧兩國間關係的密切，即此可見，及至戰後，奧

國雖已失勢，但依然是結合德意志與意大利兩國的鎖鏈。不過自大戰以來，德國南方的鄰國，已不了一個，因為就奧匈帝國的舊址上已建立了許多新國。在這其中，德國與捷克的關係，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甚至文化上，都很密切，不下於其與奧國的關係。這是因為在捷克境內，有許多德國人，他們起初不承認有新興捷克的存在，直至最近，始改變其態度，而且他們之中有許多依然沒有放棄其大日耳曼組織的希望。最後，我們且把德國的東部觀察一番。大戰以前，德國的廣闊的東境，與俄國相連接，現在此種連接，已被波蘭及沿波羅的海的幾個新興小國所切斷。然而如前面所說，德國的東部，並沒有天然的境界，因為自德國的東境起，經過波蘭，以達俄國的內部，一望皆屬莽莽平原，毫無顯明的地理上的界限，遮攔其間。不過這種界限雖付缺如，但人為的疆界卻非常複雜，故如德國東境的最北部分，即東普魯士，竟給波蘭走廊截斷與德國其他部分的聯絡，而生子然孤立之感，所幸德國在波羅的海的利益，還不會給剝奪，所以陸地方面的接觸雖已蕩焉無存，但海運的便利，仍可使德國與俄國十分接近。

這樣，居歐洲中部的德國，其一舉一動，都足以牽動歐洲的國際政局。而且在德國還沒有正式

變成國家之前，便已有這種情形。原來整個中古時代，象徵基督教中心組織的神聖羅馬帝國實際上無異是德意志帝國，而神聖羅馬帝國歷代皇帝定都之地，不在奧大利，則在德意志各邦。所以德意志這個國家，其與奧國及南歐其他部分間的政治關係，由來已久，這種傳統關係，對於現今的歐洲政局，依然是一種重要的動力。假如沒有此種傳統關係存在，則德國之掌握中歐霸權的觀念，或許不致如在上次大戰中所曾表現過那樣的具體化。然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對於正在形成中的新德意志，德國與南歐間的傳統的關係，自然又將居於重要的地位。一九一八年的和約，其目的之一，為截斷德國與南歐的聯絡，這是很顯明的，但對於和約的這一條款，將來必有一種無可抵禦的力量，發為猛烈的運動，堅決提出修改的要求，這卻也是一樁顯明的事情呢。

### 戰前的德國

有了前面的緒論，我們就可轉換方面，對於現代德國的興起，以及崩潰於一九一八年的德意志帝國的變遷，作簡單的探討了。關係現代德國的發展，我們所最須牢記在心的，是德國之脫出中

古時代，較西歐其他諸國落後得多，同時不完全得多。遠在英國進爲資本主義的國家，一切中古時代的殘餘制度都消滅淨盡的時候之後，德國還是個農奴制度與基爾特制度的區域，無論工業，商業，以至農業，幾乎全在原始的狀態中進行。還有，當法國已經建立自由耕種者的制度，發展大規模的工商業，組織強固的中央集權制度的政府之時，德國還是受統治於無數的小諸侯。只有普魯士，那時已具有完備的專制政治，例以現代式的國家，尙屬相似。總之，以機器生產的技術爲其基礎的德國工業，幾可說是完全在十九世紀的後半方纔發達起來。與此有關的農奴的解放，即使把農奴得免於強迫勞役及低下的地位這些事情撇開不講，而依照純粹的個人意義而言，也一直要到十九世紀初期，始微露端倪。在一八七〇年前，德意志帝國不能說是一樁業已完全成熟的事實；就是替德意志帝國開路的關稅同盟，也一直在一八三四年方纔有其實際的存在。

關於現代德國的歷史的發展，我們又得把前面說過的德國東西兩區域間完全相反的情形，引來當作研究上的重要幫助。因爲在西部，采邑制度是漸趨沒落了，農奴漸漸的具備自由耕種者的狀態，一步步的踏上如西歐其他國家所曾有過的進化階段，而在東部，則當歐洲比較開化的區

域，已將農奴制度加以相當的或絕對的廢止之時，還保持着極端的農奴制度。這種極端的農奴制度將重要的兩點，即強迫農奴貢獻勞役及抑低農奴的個人地位，施於易北河以東的德國人民，其完成的時候是在十六世紀，然而在西部，則農奴制度的嚴厲的束縛，反自那時起開始相當的鬆緩。十七世紀前半的三十年戰爭，使德國大部分的區域都成爲非常貧困，跟着到來的，便是大地產的集中過程，尤其在東部。其後德國經濟上與政治上的落後，大部分便是受三十年戰爭所造成的貧困之賜。十八世紀中葉，德國出了一個菲特力大王，他不僅廢續一世紀前大選舉侯腓特烈威廉的遺志，鞏固普魯士的政權，統一散亂的領土，且又努力於工業的發展。但從經濟上的意義說來，現代德國的歷史，實導源於拿破崙時代。固然，在十六世紀與十八世紀之間，德國西部的農奴，有許多業已獲得個人自由，然而新局面的造成，則有待於拿破崙，原來這位法蘭西的英雄當他的全盛時期在德國境內建立若干附屬國之時，曾下令廢止這些附屬國內的農奴制度。他雖然不能使其法則垂之永遠，但經過他這麼一來，小國紛立的局面，立刻被打破，大部分區域內之中古時代的殘餘制度，也被掃蕩殆盡，這使其後德國的組織，得有一個確定的目標，不可謂非拿氏之遺澤也。

因為受法國革命及拿破崙制度的影響，普魯士的農奴漸漸獲得解放，到了一八〇七年，普魯士遂頒布一項法令，確實廢止農奴制度。自是以後，德意志各邦陸續步普魯士的後塵，革除農奴制度，提高農民的地位，不過在有幾邦，農民必須對地主供應勞役，為領得土地的交換條件，此種辦法，延續得比較長遠，一直等到十九世紀，方纔逐漸革除。至其所以能够革除，一部分是因為農民以金錢抵償勞役，還有是因為農民將自己所領得的一部分土地交還貴族。因此，很久很久之後，甚至一九一四年時，有幾個地方的農民，還得對貴族繳付年金，藉以清償過去期間為贖取自己的地位而起的債務。

然而自一八〇七年起，以普魯士為首，德國的農奴制度到底漸趨消滅，而緊接着農民地位的變化，則為土地的重新分配及公有土地私用法之施行；與墾植方法的改進。德國施行公有土地私用法，遠在英國之後；而且德國的西區，地產大都位在多山的鄉間，推行公有土地私用法有很大的困難，因之較英國要緩慢得多。同時，由普魯士領導，以打破中古時代對工商業的束縛為宗旨的運動，也開始進行。普魯士於一八〇八年開始市政改革，及至一八一〇年，基爾特——即小工商業者



的協會，此種協會賦有管理當地工商業的全權——的權力遂大減而特減。此種改革，隨着此後陸續頒布的法令而進展，卒以造成一八四五年基爾特統治的完全崩潰。此時，其他各邦都相繼實行同樣的改革，不過在這其間，有許多進行很慢，以視普魯士，自不免瞠乎其後。當十八世與十九世紀初期時，德意志各邦間曾築有無數的關稅障壁，致各邦的經濟生命大受打擊，可是始終不曾有一邦提倡以全部德意志為本位的自由貿易；即如普魯士，以腓特烈大王那樣賢明的統治者，也不曾有過統一關稅的計議。然而自十九世紀初葉以後，各邦內部漸趨統一，次則少數的各邦漸趨一致，其後範圍愈擴愈大，卒以促成一八三四年的關稅同盟，以全部德意志為本位的自由貿易，至此乃可說有相當的成功。後來，各邦都相繼加入關稅同盟，經過一八五三年與一八六五年的兩次重訂同盟的組織益趨完備。但奧大利卻被擯於同盟之外，這是因為德意志各邦恐怕奧國的勢力，將來也許能與普魯士的勢力相頡頏，妨礙普魯士領導下的統一的德國的建立之故。自一八六〇年起，由於政府的積極的獎勵，並受李斯特及其門人所提倡的經濟的國家主義的影響，德國的工業開始具備更加現代化的形式，煤鐵工業大大的發達起來。關稅同盟，農奴的解放，以及普魯士對德國

其他部分的堅固的掌握，都替德意志帝國的建立，開闢了一條康莊大道。一八六〇年起普魯士的幾次征戰，使德意志帝國完成了他的準備工作。及至一八七〇年一戰勝法，光輝燦爛的大德意志帝國，遂在畢士麥手中確實建立起來。

此後，德國挾其固有的工業原料，又得羅蘭州之鐵礦，本已有使自己迅速變為完備的工業國之可能，及至一八七〇年以後，吉爾克賴斯（Gleichrist）與湯麥斯（Thomas）兩人的新發現，使羅蘭州的鐵礦能夠產出與衆不同的鋼，於是德國的工業，益呈突飛猛進之勢。從一八六五年至一八七九年止，新興德國鑒於英國之自由貿易政策已卓著成效；極力模倣英國之所為，因而其經濟發展的方針，也採取自由工業制度。不但國內的關稅障壁完全消滅，就是對於國外，關稅障壁也力求減低。然而到了一八七五年左右，當工業的不景氣突然襲來之時，局面為之一變，不論工業家與農學家，都覺得有改變向來方針的必要，貴族與工業鉅子的聯合奮鬥，終於造成一八七九年的新稅率。在這其間，工業家承認保護農業政策，作為自己的貨品獲得更穩妥的保護之交換條件。及至八十年代，農產品的價格繼續低落，美國的雜糧加進了世界市場，競爭日趨激化，這使擁有大地產

的貴族覺得一八七九年的保護尙欠周密所以當一八八五年左右他們堅決主張將農產品的稅率提高。至於工業品的稅率，則仍然採取戰後的政策，並無增漲。迨至一八九二年，當工業的繁榮回復之時，不論工業品與農業品，稅率又復減低。但是其後，德國終於改變方針，採取以高稅率保護工業的政策，與更高的農產品進口稅率相輔並行，那時，已經是二十世紀的一九〇二年了。

在上述的整個時期內，不論低稅率與高稅率，德國的工業制度無時不在飛速進展之中。自一八七一年起，至一九〇一年止，前後三十年中，德國煤的產量從三千二百萬噸增至八千九百萬噸，生鐵的產量從不至二百萬噸之數增至六百五十萬噸以上，鋼的產量從一個不足道的數目增至五百萬噸。又如輸出品之價值，與以前的相等的日期相較，增加百分之六十；至如一八七三年的金本位的確立，尤足表示德國正在對着大工業國的目標猛進。二十世紀初期，德國成爲大工業國之趨勢，依然以同樣的速度進展。故至一九一三年時，德國已能生產約一億九千萬噸的煤，約一千六百萬噸的生鐵，及一千七百萬噸以上的鋼，以與英國的二億八千七百萬噸的煤，一千〇二十五萬噸的生鐵，七百五十萬噸以上的鋼相較，煤的產量雖有愧色，但生鐵與鋼的產量，則有顯著的

突過。這樣，德國的重工業，其發展之速，實爲空前所未有，要是沒有異軍突起的美國，則德國之代英國而爲世界上最大的鋼鐵生產者，真是容易得很。

在這個時期中的德國，政治上與工業上一樣，只想人家尊之爲強國，這種要求一天堅決一天，結果卒與英國對立起來，這種對立，便替德國醞釀一個巨大的轉變，因爲加上了法德間的舊隙，以及法國恢復一八七一年失地的慾望，便是歐洲大戰所由起。德國之崛起而爲強國，爲時較晚，故其追蹤先進強國，建立巨大的殖民地帝國的企圖，實有很大的不便。但德國不甘放棄這種企圖。爲實現這種企圖，並爲求得其所想望的地位，於是在海上與英國相對立，在陸上則與法國相對立。這種對立的經過，及其怎樣演化而爲歐洲大戰，我們在前面已略有述及，此處姑不再贅。總而言之，德國的人口總數，既遠勝英法，其繁殖率之速，亦非英法所能及，加以經濟制度的迅速的發展，已使之成爲一個極大的輸出國，足與英美相頡頏，還有在政治方面，德國從普魯士統治傳襲了非常鮮明的軍國主義色彩，在這樣的情形下，當然不甘作第二人想，而覺得有打破現狀的必要。但是英法兩國，眼望着德國一天天的強盛起來，於是日增其疑忌之心，他們覺得德國的強盛，不僅可以威脅他

們在歐洲的地位，還可以威脅他們在世界的地位。於是大戰即隨之而起。

## 戰時的德國

戰端初啓，德國人滿望藉猛烈的攻擊，使戰事得告結束。他們全盤的軍事計劃，都本於這個動機。因爲德人承認自己的可能的敵人甚多，假如必須與之同時對壘，一時必難以取勝，而自己的食糧與原料品，都有賴於國外的輸入，若軍事的勝利遷延時日，危險實不堪言狀。他們知道自己的海軍，決不足以與英法的聯合艦隊相較量，決沒有控制海上的能力，所以如果急欲戰勝的話，那就只有從陸戰入手，這就是說，在英俄兩國無暇供給法國以充分援助之先，一鼓而下法國。但是因德軍之不得長驅直入巴黎，此時，局勢實已大定，即此後的德國，只好自安於守勢，坐視敵國的封鎖而無可如何了。德國自受嚴厲的封鎖以後，一方面必須努力縮減國內人口的食用，一方面又須以絕大的努力，爲前綫士兵打算必不可少軍火與食料，其困難自不待言。然而在這樣的困難中，德國卒能維持至四年以上，一直等美國軍隊加入歐洲的戰場，始呈不支之勢，亦可見德國政府團結民衆

的本領，以及始終不懷武志的有紀律的德國人民所忍受的痛苦，其程度爲如何了。

然而當戰事已經延長到若干時日之時，德國人民確曾有過極大的不滿，而且軍事領袖勝算在握的老調，民衆已淡然處之，不復抱若何的信任了。於是政府的專制手段，竟不能不於一九一七年表示相當的讓步，大戰爆發時給取銷掉的地方自治政府，此時都告恢復。同年六月，帝國議會通過一項有名的決議，一面贊成爲保護祖國而繼續作戰，一面卻又表示願意接受不割地不賠款的和議。一九一七年的間接的和平談判，結果沒有成功，但一九一八年一月威爾遜總統所發表的十四要點，卻使德國內部的和平空氣，愈加濃厚起來。尤其當奧匈帝國的戰鬥力的喪失更加顯著的時候，當德國民衆的痛苦加甚的時候，當大規模的潛水艦攻擊不能產生如德國人所預期的功效，協約軍的接濟依然沒有被截斷，英國的人民依然沒有餓死的時候，德國人希望和平益切。可是在這樣的狀態中，忽忽不覺到了一九一八年九月，於是德國的軍事領袖也醒悟過來了，他們不僅知道德國定將失敗，而且知道德國就是要想繼續抗拒若干時日，亦有所不能。後備軍已傷亡殆盡，陣線是隨時可以崩潰的。

十月初，當巴登公馬克斯（Prince Max of Baden）任內閣總理，比較急進的政黨看到實現和議的機會之時，軍事領袖方面的消息，亦突然傳至，據軍事領袖的意見，德國應立刻與協約國媾和，即接受任何苛刻條件，亦所不恤。後來，當海軍奉到與英國的艦隊一決雌雄的命令之時，竟拒絕遵從；原來在軍港內躲藏了好幾年的海軍，較在前綫作戰的陸軍尤為傾向於和平，當然不願聽軍事領袖的命令，以生命為孤注之擲。十月三十日的基爾（Kiel）海軍暴動，可說是德國革命的真實的開始。在這其間，德國發生了一樁極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社會民主黨的一個重要黨員，立即被任以平定海軍暴動的工作。這時奉命馳往基爾，應付海軍暴動所造成的局面的，便是日後壓平共產黨與左翼社會黨的革命，因而保全德意志共和國的諾斯克（Noske）。

此時，德國維持西部全綫的完整，顯然只是一種苟延殘喘的舉動，假如休戰不能實現，德國軍隊是必然地要在最短期間內全部崩潰。於是德皇倉皇出京，與軍事領袖商議，結果在他的面前展開兩條走路，一條是藉武力保全其在德國的地位，還有一條是聽從某些人的勸告，根據國內外的理由，放棄皇位。原來德皇繼續在位一日，協約國必一天不願以寬大的條件與德國議和，而德皇的

遜位，則也許能替根據於威爾遜總統的十四要點的和議打開一條道路，這是屬於國外方面的理由。還有，現政府的繼續存在，定將激起昂奮的民氣，而德皇遜位，則也許能斬除荆棘，達到和平了結的局面。由於這種局面，不但霍亨索倫的承繼權可因民衆的好印像而繼續保持，即德國亦不致陷於無政府的狀態或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屬於國內方面的理由。但對於前述的兩條走路，德皇猶豫不能即決，這使瑪克斯總理不能在獲得德皇確實應允之前，就毅然宣佈德皇的退位。此時，事態已十分嚴重，圓滿的和平解決已屬無望。瑪克斯知道自己的地位極不穩固，乃將政權轉讓於社會黨。恰巧那時候的社會民主黨，知道自己假如不把革命宣布為既成的事實，政權就會給左翼的社會黨搶去，所以終於採取快刀斬亂麻的手段，宣布德意志共和國的成立。社民黨此舉，除鞏固國內的秩序外，還有一個目的，即希望協約國以寬大的態度，對付已與負戰事責任的德意志帝國完全脫離關係的新德國。新德國成立之時，愛倍爾 (Ebert) 就任為臨時總統，而希德曼 (Scheidemann) 則為臨時政府的實際領袖，負磋商休戰及規訂新德國的組織大綱之責任。

但當德國接到協約國的休戰條件，看見內容與威爾遜總統的十四要點背道而馳，不禁大失



所望，甚至社民黨也被恢復武力抗拒的觀念支配了一會。幸軍事領袖出而說明武力抗拒之非計，主張只要軍隊不凌亂潰散，任何苛刻條件，都可接受。在這樣的情形下，德國卒簽字於休戰條約，接着在前綫的德國軍隊，便開始撤退。此時，軍隊雖已染有和平主義者的觀念與極大的不滿，但興登堡居然施展驚人的能力，使武裝的士兵整齊地退入本國，不曾發生半點紛擾。原來興登堡很明瞭，假如任士兵的紀律有半點差池，德國的全部戰鬥能力準會突然分化，散亂到不可收拾。適巧社民黨之渴望避免紛擾，亦不下於興氏，因而以全力協助興氏，實行撤軍並解散軍隊。

### 韋瑪共和國

社民黨登台以後，覺得有立即規訂新德國的憲法之必要。然而事勢卻又不許他們獨斷獨行。因為除出社民黨，還有許多更左的勞動階級政黨，倘使社民黨不能保持其勞動階級運動的領導者的地位，那末革命就會從他們手中，而與左翼的領袖發生關係。這種情形，是社民黨視為有發生的可能而引以為大懼的。

在大戰爆發之前，德國的社會民主主義分子就組成了一個統一政黨，可是到了一九一四年，這個政黨忽開始分化。那一年，李卜克內希（Karl Liebknecht）在帝國議會中獨對軍事公債投反對票。但在此以前的社會民主黨的黨員會議席上，主張對軍事公債投反對票的，有十四人之多，這少數黨員便成了反對派的核心。隨着大戰的進行，他們大多數黨員的裂痕，逐漸顯著。當一九二七年時，極力反對戰爭的社會黨員，尚隸屬社會民主黨，但是到了同年的某時期，他們覺得與大多數黨員的結合，已無延續可能，卒脫出社民黨，另組獨立社會黨。在此以前，即一九一六年，德國的軍火製造廠工人曾舉行大規模的罷工。一九一七年春季，又有第二次大規模罷工發生。同年七月，海軍舉行第一次暴動。一九一八年最初數月，軍火製造廠工人又演了一次罷工，範圍較前兩次更廣，但因社民黨的反對以及德國工會之繼續忠於同盟國，結果與前兩次一樣，歸於失敗。時候一天天的過去，工廠中的工人，大部分被編為最後的後備隊而開往前綫，社會上的不安，達於極點，於是政府竭力的捕捉比較活動的勞動階級的領袖，送往戰壕中與士兵同過槍林彈雨下的生活。可是這種手段，適以造成軍隊中的普遍的不滿，為十一月的革命奠就基礎。

當革命爆發之時，全局面是這樣的難以捉摸，竟使各政黨都逡巡不知所可。廣大的勞動階級都贊成社會主義，這是不能有疑問的。但因社會主義派別甚多，於是勞動階級中間也發生尖銳的裂痕，有的贊成社會民主黨，有的贊成獨立社會黨，有的贊成斯巴達卡斯團（Spartacists）。斯巴達卡斯團的領袖是李卜克內希及盧森堡（*Rosa Luxemburg*），最初隸屬於社民黨時，就抱極左的見解，及至後來，遂成爲工人運動及士兵運動的魁首。這樣，當帝國制度解體，政權由瑪克斯而移轉於社會黨多數派之時，他們當然不把左翼的社會黨可能的革命當作着眼點，用來決定他們的路綫。當此之時，德國政府之形式是已經沒有問題了，即使資產階級政黨的領袖，也覺得除了社會主義政府以外，其他的政府都不配統治德國。可是在社會主義政黨中間，獨立社會黨贊成建立社會主義共和國，大體取法於蘇聯，要是政府不以此爲確定的方針，他們就拒絕參加，但相信立憲政府的社民黨，則對此大加反對。結果是一種兩方面都覺得不滿意與不安定的妥協。社民黨多數派被迫贊成『社會主義共和國』並且同意於設立一個中樞內閣，或執行委員會，（這兩個名詞未知孰是），人員皆以社會黨黨員充任。但在同時，他們卻堅持以舊官僚充任各部部长，中樞

內閣對於這些非社會黨的部長，應給以處理部務的最大權限，換言之，即只能爲虛應故事的管理，不能爲實際的干涉。至中樞內閣本身，則由社民黨與獨立社會黨各選三人組織之。但成立之初，社民黨多數派就與非社會黨的部長團結一氣，獨立社會黨立刻感覺到他們與聞機要的權利，大部分已被剝奪，兩派不睦的現象已呈。未幾，爲了決定新國家形式的國民會議是否應用全民投票選舉這問題，中樞內閣遂起內訌。同時，在李卜克內希領導下的斯巴達卡斯團，反對臨時政府的態度，一天天的嚴重，再來一次革命，建立真正社會主義制度的主張，一天天的強硬，於是政局益陷於机隍不安之中。

還沒有到年底，社民黨多數派與獨立黨的裂痕，已非常尖銳，使繼續合作成爲絕對的不可能。於是獨立社會黨全體辭職，讓社民黨一手包辦政府；前面說過的諾斯克，便是在這時候加入內閣，而且閱時不久，他就握得德國的兵權。獨立社會黨自被擠出政府，便與斯巴達卡斯團聯合，企圖奪取政權，不過其中有少數比較溫和的分子，則拒絕參加這運動，開始掉轉步武，重與社民黨接近。接着柏林與其他各地，都發生惡鬪，結果分離運動者慘敗，這是因爲諾斯克招集舊時軍隊中的反社

會主義的軍官組織臨時機關以武力對付反對黨斯巴達卡斯團遂呈不支之勢李卜克內希與盧森堡都於是役中被諾斯克所率領的反動派所逮捕，繼且慘遭毒殺，但據政府所說，則兩人之死，係私圖脫逃所致，咎實自取。自這兩位領袖的遇害，柏林的暴動頓時失敗，斯巴達卡斯團大有崩解之勢。然而這並不是鬪爭的中止，因為在其後數月中，德國有許多地方接二連三的發生許多次的革命罷工。結果卻都被諾斯克及其部下以嚴辣的手段鎮服。此時，應諾氏之請以幫助社民黨恢復秩序之反動團體，膽子已一天大如一天了。

同時，以全民投票為基礎的國民會議之選舉，正在進行之中。國民會議之議席共四百二十一，社民黨多數派藉強大的組織佔得了一百六十三席，而缺乏健全的黨務機關的獨立社會黨，則僅佔得二十二席。至如斯巴達卡斯團既然拒絕參加會議，故無一人當選。這樣，二社會黨的人數，在議會中仍為少數。至其他各黨在會議中所佔的席數，則代表舊制度擁護者的國權黨佔得了四十二席，代表大實業家的人民黨佔得了二十一席。這兩黨都不承認新創的共和國係既成的事實，所以實際上是不應參加意在鞏固新創的共和國的新政府的。上述各黨所佔的議席共為二百四十八，

再加上了零星小黨的議席十，共爲二百五十八，總議席除去此數，尙餘一百六十三，恰與社民黨多數派所佔之議席相等，則爲代表天主教勢力的中央黨，及幾個比較富於自由意味的資產階級政黨所合組的政黨，卽民主黨所分得。在會議中佔得最多議席之社民黨，原以議會政治爲其信條，他們以爲非等社會黨在選舉上佔得優勢，社會主義的建設就不能說已到成熟的時機，所以選舉揭曉之後，立即與中央黨及民主黨聯合，着手改組政府。愛倍爾依然當任臨時總統，希德曼當任新政府的內閣總理，但閣席則由社民黨與資產階級政黨平分，這樣成立了一個聯合政府。就在這個混合政府的監督下，國民會議着手起草韋瑪憲法（Weimar Constitution）。韋瑪是國民會議集會的地方，其所以被國民會議選作集會的處所者，主要原因是那裏的情形非常安定，非如柏林及其他大工業區，須受成立於革命時期的兵士與勞動者協會的擾亂。

而且，新憲法的起草，並不由社會黨人擔任，卻委諸於曾在普魯士邦內政部幹過事情之普賴斯（Preuss）。像這樣的起草主任，當然只能雜抄英法美等國的現成的憲法，以爲憲法，僅合折衷派的資產階級的民主國家之用，與獨立社會黨及斯巴達卡斯團心目中的社會主義共和國所需

要的憲法，可說無一似處。聯合政府的組成及韋瑪憲法的起草，這樣，使社民黨多數派與那些主張在舊制度推翻後馬上就來一次社會主義革命的人們間的裂痕，愈益尖銳，其實這種裂痕在一月暴動給壓平的時候，就已經非常顯明了。

當德國在韋瑪起草憲法之時，正是協約國在凡爾賽宮推敲和約之日。及和約的條件送抵德政府，社民黨多數派起初甚至不敢相信協約國竟會提出這樣苛刻的要求，等到知道事屬確實，便想藉斷然的拒絕，脅迫協約國給予比較寬大的條件。但協約國馬上就對德政府申說，他們說的都是真話，他們決將強迫德國接受基於「戰勝國有權處分戰利品」的原則的和平條件，如德國必須將軍備幾乎完全裁去，及必須對協約國繳納鉅額的款項，賠償戰時損失之類。社民黨多數派領袖希德曼自始就主張斷然拒絕這種條件，及見事情已無可轉圜，他依然不願改變態度，於是社民黨與民主黨同時離職，以鮑埃爾（Gustar Bauer）為首領的新政府，於一九一九年六月宣告成立。鮑埃爾亦屬社民黨多數派，同時並為工會的領袖，他的方針，是治社民黨與中央黨於一爐，組織混合政府，然後一面對協約國聲明不服，一面卻簽字於和約，確立了「履行」政策——這一名詞，

在後來數年中，是常常與斯脫萊斯曼 (Stresemann) 的姓名相連結的。

這其間，諾斯克仍在進行壓平左翼社會黨的工作。爲要說明他的事業，我們必得回說上去，看看與前面說過的許多革命運動同時，巴威略是怎樣的情形。慕尼黑 (Munich) 革命之在德國，可說是具有實際形式的革命中之最早者。休戰條約未簽訂時，那裏的舊時皇族就已被驅逐出境，獨立社會黨愛斯納 (Kurt Eisner) 組織左翼社會黨的政府，而自爲其元首。這政府模倣社會民主黨支配下的中央政府，進行巴威略國民會議的選舉，結果適使反社會主義的政黨，以天主教農民爲基礎而抬頭。於是巴威略社會主義政府內部突告分裂，愛斯納以二月二十一日，爲反對派所暗殺。後來經過若干時的大混亂，有社會黨多數派所組織的右翼社會主義政府出現；但這政府壽命短極，因爲當二月向盡之時，有一個名叫利伯 (Lipp) 的，在慕尼黑發動一次極端反動派的革命，組織新政府。利伯的政府，亦倒得很快，代起的是阿克瑞樂特 (AxeIrod) 領導下的共產主義政府。於是巴威略的社會黨多數派與反動派的政黨聯合，乞援於諾斯克；德意志共和國政府的軍隊，於五月一日佔領慕尼黑，共產黨卒在受了一陣屠戮之後而屈服。



同時其他各地的革命運動，也被諾斯克一一蕩平，及至一九一九年的中間，多謝諾斯克的功績，除少數區域以外，勞動者的協會都銷聲匿迹，於是社民黨多數派及其同盟資產階級政黨，乃得放手做去，而不受些微阻礙了。

一九一九年的下半年，就這樣平安過去，除和約簽字後民主黨又復參加政府這件事情以外，表面上可說毫無重大的變化。但實際上並不如此，因為諾斯克所收羅的軍官以及舊時反動政黨的殘餘分子漸漸跋扈起來，隱然有把持政務之勢。他們相信左翼的社會主義者的勢力已撲滅淨盡，於是轉其目光於社民黨，以恫嚇的手段，要求採取更反動的政策。一九二〇年三月十日，路脫維支（General von Luttwitz）將軍與其他的幾個軍官聯名致最後通牒於政府中的社民黨員，因政府置之不理，隨着即有凱伯暴動（Kapp Putsch）爆發。凱伯是普魯士邦的官吏，他統率反對革命的軍隊，進軍柏林，加以佔領。聯合政府則遷避至斯徒加特（Stuttgart），在那裏召開國民會議，并向會視爲眼中釘而對之備施壓迫的那種力量求助，以應付反動派所造成的危局。是在工會命令之下，立即舉行總罷工，德國勞動階級幾全體參加，即天主教的工會，亦因中央黨關係，與

社會黨的工會採取一致行動。勞動者這種力量，使凱伯暴動的領袖的地位，立刻動搖起來。後來，眼見得成功已屬無望，那些領袖終於解散軍隊，向政府投降。可是一事無成的凱伯暴動，對於社民黨卻有很大的影響，因為經這一來，社民黨把握政府的力量，已給削弱許多了。所以其後不久，鮑埃爾政府即行解體，由另一個社民黨員穆雷（Müller）組織新政府，政黨一仍舊觀，原來這個政府，無非是鮑埃爾政府與為期不遠的總選舉間之橋樑。總選舉是六月間舉行的，結果社會黨大遭挫敗，中央黨費倫巴哈（Fehrenbach）起而組織資產階級政黨的聯合政府，社會黨絕跡於政治舞台。這裏應該補敘一件舊事。凱伯暴動後的第二月，斯巴達卡斯團與一部分獨立社會黨員所合組的共產黨，在魯爾舉行暴動，事態嚴重異常，可是與以前小規模的革命運動一樣，閱時不久，即為諾斯克所壓平，這可說是社民黨政府的最後一次功勞。所以當社民黨將政權讓渡給資產階級政黨之時，想起德國勞動階級的革命勢力，已被撲滅殆盡，此後德國雖然將受非社會黨的統治，依然是個完完全全的立憲政體國家，他們心中定必有無限的歡慰罷。

以上對於德國的革命截至一九二〇年為止時的遞變的形態，敘述得甚為詳盡，所以然者，蓋

因德國在這十八個月當中的情形，我們如果能够澈底明瞭，那末對於韋瑪共和國的立腳點，就可思過半了。新德意志的憲法，即韋瑪憲法，是社會民主黨以及折衷性質的政黨如中央黨、民主黨等共同規訂的，當其進行之時，舊制度的擁護者反對於右，獨立社會黨、斯巴達卡斯團、共產黨、兵士與勞動者協會等反對於左。左翼的政黨希望把德國立刻建爲社會主義共和國，而對於議會的選舉並新憲法的訂立，則遲延至其政權能夠鞏固以後。他們的政權便是由十一月革命時代的兵士與勞動者協會爲基礎而建立起來的。蓋左翼政黨以爲第一步當使德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得有穩固的基礎，政體問題只有在德國已具有相當的社會主義制度之後，始能加以討論。

右派的政黨，外加舊時官僚與舊時軍官，其對韋瑪憲法所抱的敵對態度，亦不下於左翼的社會黨。不過他們知道自己在此刻絕對沒有掌握政權之可能，換言之，絕對沒有建立合於自己意思的國家之可能，同時又覺得左翼勢力，實爲自己的大患，假如完全撲滅，將來自己的事業定可少受些阻礙，所以衡情度勢的結果，終於加入以撲滅左翼勢力爲目的的折衷性質的政黨及社民黨，以徐待機會的到來。但他們中間比較激烈的分子所發起的凱伯暴動，則顯然太早一點，以致完全對

之表示同情的人們，也袖手觀變，不敢予以一致的援助。不過在一九一九與一九二〇兩年中，舊制度的擁護者可說無時不在玩着等待機會的把戲，也就無時不在利用社民黨以阻礙社會主義的發展，他們知道這是非單獨自己的力量所能辦得了的。

介乎這兩個極端的中間的，除社民黨多數派外，是兩個折衷性質的資產階級政黨。民主黨大都是共和主義的忠實信徒，希望以法國或美國為模範，把德國造成立憲政體的共和國。因為贊助者只限於猶太人及智識分子，民主黨始終不會有能力獲得怎樣廣大的羣衆；不過雖然這樣，卻有能力給與其他的折衷性質政黨以有力的幫助，促進新憲法的完成與「穩健」的政治制度的確立。中央黨與民主黨不同的一點，只在所代表的利益，原來中央黨是完全代表天主教的利益的，因其主要的羣衆是巨大的天主教農民以及人數視此稍遜之天主教區的中等階級，同時各地方的天主教工會，尤其在魯爾的，也有不少中央黨的擁護者。大體上，中央黨是沒有所謂方針的。其所採取的社會的與經濟的學說，從極左到極右，無不應有盡有，所以這個政黨的團結力量，與其說是明確的政治上或經濟上的信仰，毋寧說是對天主教的信仰。在一九一九與一九二〇兩年中，中央黨

的唯一願望，便是創造韋瑪共和國而加以維持，因為他們對於以新教的普魯士為中心的舊時帝國，既無愛戴之心，同時對於任何建立社會主義的企圖，亦深惡痛絕。這樣，以立憲政體與議會政治為其行動的目標的社民黨，就不能不與上述的兩政黨，即民主黨與中央黨合作，以求在國民會議中獲得絕大的多數，保持其政權。社民黨雖已公然宣佈，同時並確切相信，自己是社會黨，但覺得如果立即從事於建立社會主義，不僅會與民主主義相牴觸，將來也許會激起極大的反響。因為據他們的觀念，德國只有在大多數人民傾向於社會主義思想之時，纔配談建立社會主義。他們知道倘使自己不起而掌握政權，則政權勢力必落於極左的政黨之手，幸而那時的情形，尚不致使他們失望，他們於是拒絕組織純粹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更進一步的國家，希望以此為基礎，等日後民衆已大多數傾向於他們的觀點之後，從事建立社會主義。然而事實上，如我們在前面所見，這種折衷的政策不僅需要他們求助於資產階級政黨，且需要他們求助於反動派的武力，用來壓迫與他們同出一源的左翼社會黨，隨着鬭爭之愈演愈烈，社民黨與社會主義愈離愈遠，與左翼勢力間的仇恨與日俱深，終於使左翼勢力漸漸的站到共產黨旗幟之下。且如舉行市街戰時，這一派社

會黨奮勇衝過那一派社會黨的堡壘，幹着互相殘殺的事情，所謂社會黨內部的團結，實已久成空談。還有，勞動階級的團結，在革命初期，即已慘遭破裂，其後迄未能恢復，致國社黨當時機到來之時，能在轉瞬間造成優勢，結果卒擊破內部渙散的社會主義勢力，而不會遇到一點有力的抵抗。一九三三年德國社會主義勢力的崩潰，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後最初數月，就已經播下種子了。

一九二〇與一九二三之間，德國政局漸趨安定。各政黨輪流組織政府。一九二一年，費倫巴哈的非社會黨政府解體之後，代之者為中央黨衛斯（Wirth）領導下的聯合政府，社民黨亦參加，但已不能如從前樣佔一半議席，而只佔得三分之一強。一九二二年，衛斯去職，古諾（Cuno）繼起組織資產階級政黨的聯合政府，社民黨又見擯於政治舞台。但是第二年，人民黨脫萊斯曼組織大規模的聯合政府，其包羅右派勢力之廣，為前此所未有，社民黨因自願參加之故，又得與聞政務。一九二四年年底，斯脫萊斯曼將政權交卸給馬爾克斯（Marx）之時，社民黨又見遺，直至一九二八年，方纔復與政府發生關係。

像這樣的政府的更迭，不但與德國內部的情形有關，即德國與協約國間的國際關係，亦與有

密切的關係。一九二一年一月，協約國所要求於德國的賠款，業已確定，其驚人的數目，就是協約國也不能不於後來幾年中允加修改。此外，因國聯主持下的全民投票的結果，致德國不得不將上西利西亞的一大部分，奉讓與波蘭，這也是一九二一年德國所受到的重大打擊。加以國內，在薩克森，有共產黨的暴動，幸不久即平，在巴威略，則反動派把持下的政府堅決拒絕裁軍，曾參加凱伯暴動的極端反動派，龐集慕尼克，聯合其他反動分子作反韋瑪憲法的運動。中央黨要人厄士彼格（Eisner），在一九一七年的帝國議會中，主張議和最力，其後又為磋商和約的最活動的分子，早遭反動派之忌，這時遂被凱伯暴動案中逍遙法外的犯人所謀害；政治的暗殺手段，原來專用以對付極左派的，就這樣的延到為反動派所不愜的中間各黨黨員頭上。但衛斯政府對於國內方面，其政策是不為己甚，息事寧人，同時對國外方面，亦以增進與協約國的友誼為目的。這政府有一個傑出的人才，名叫賴德諾（Walther Rathenau），原係猶太人種的大工業家，一九二二年四月德國與俄國訂立拉巴羅（Rapallo）條約時，他是全權代表，而德國之所以能一方面不與協約國鬧翻，一方面又能保持其獨立的外交方針，重復確立自己的聲威者，也得力於他靈敏的手段。然而極端的

反動派卻不以賴氏的舉動爲然。不管賴氏在大戰中對於軍火的供給，曾經幹過怎樣大的功勞，卒不免追隨厄士彼格與李卜克內希之後，於一九二二年六月的某一日，在柏林慘遭暗殺。自厄士彼格與賴德諾遇害以後，至一九二二年年底，乃有國旗團（Reichsbanner）之出現。這是半軍事性質的組織，係社民黨與中央黨的擁護者所發起，其目的在制止極端的反動派危害共和國。可是反動派的暗殺手段，終使中間各黨的地位動搖起來，因此成立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的古諾政府，遂不能不容許人民黨加入，而採取比較右傾的政策了。

### 賠款問題、魯爾問題、通貨膨脹與復興政策

這其間，因賠款問題，又引起嚴重的糾紛。起初，德國人固曾竭盡全力，履行協約國的要求，不論現金與貨品，都按時繳納；可是到了一九二二年歲暮，德國人已無力擔此重負，致賠款的交付愆期，於是古諾政府提出延期償付的要求，同時根據和約設立之賠款問題委員會，則將德國不履行條約的情形，正式揭布。當此之時，英國表示可以通融辦理，但在賠款委員會中居大多數的法比兩國



代表，則拒絕商量，因此於一九二三年一月，派遣軍隊侵入德境，佔領魯爾，自一九二三年大部分時間的德國與協約國的鬭爭，於焉開始。原來德國人以爲這種侵略，實屬有背和約，故決計採取消極抵抗辦法，同時並極力動員全國軍隊，預備消極抵抗失敗後，即進一步而爲實力的抵抗。這麼一來，容許社會黨再參加政府這種提議，便立即引起反動派主持下的巴威略政府，以最後通牒相恫嚇，結果歸於打銷，此後，德國一般的政局之繫於巴威略政府的一舉一動者閱時至數月之久。同時，魯爾的消極抵抗，漸漸給與德國以不利。原來這種辦法，需要鉅額的款項，用來維持那裏中止生產的人口，德國的財政，爲了必須供應協約國的勒索，並因戰後工業凋疲的結果，本已陷於窘境，再加以消極抵抗的負擔，其困難自可想而知。

只有一個方法，可用以應付魯爾防綫的費用，那就是通貨膨脹。因此在德國人堅持消極抵抗的幾個月中，即一九二三年一月至八月這個時期，德國的物價漲到空前未有的高峯，同時馬克的國外匯價，則呈破天荒的傾跌。原來在前數年中，馬克的價值已一落千丈。一九二一年五月，馬克對美金的匯兌率尙爲六十二對一，同年九月，即跌至一〇五對一。上西利亞的喪失，替馬克造成一

次猛烈的續跌，因此到十一月底時，二百七十馬克已只值美金一元，換句話，馬克已跌到只值平價百分之一又半。此後停止下跌者若干時，但是到了一九二二年，一因德國須竭力張羅款項，應付協約國的要求，二因賴德諾被刺，國外對德國的局勢深滋疑懼，馬克的跌風又起。當七月時，其對美金的匯兌率爲四百九十三對一，第二月續跌至千二百對一，而當德國與協約國間的紛爭微露端倪，魯爾的佔領尙未實現之時，竟驟跌至八千對一，這是十一月中旬的事，接着，德國人與外國人都紛紛向銀行提取馬克的準備金，而德幣現金逃避之局以成。

然而像這樣的傾跌，若以之與魯爾佔領實現後的傾跌相較，就算不得什麼了。一九二二年十一月的新低價，後來曾經回好一點，可是一到魯爾佔領的第一月，卽一九二三年一月，馬克對美金的匯價就猛跌至四萬餘對一。德政府與國家銀行起初還想掙扎一下，求馬克勿再跌價，然而未幾，德國人就呈智窮力竭之勢，自一九二三年五月起，至十一月止，其間馬克對美金的兌價，奇異的數目層出不窮，及至十二月，遂有可用一元美金兌得四萬二千億（4,200,000,000,000）馬克那樣的笑話事情。總之在德國舉行對魯爾問題的掙扎期中，馬克的國際兌價漸降漸低，卒至完全喪

失，同時國內物價則逐步上漲，其數目亦開千古未有之奇聞。一九一八年大戰終息之後，物價爲戰前之四倍；一九二〇年，就漲至十五倍；一九二一年，漲至十九倍以上。這時，馬克價值的真正傾跌亦已開始。所以一九二二年的平均物價，竟爲一九一三年物價的三萬四千倍，而一九二三年的物價指數，遂呈與馬克的外匯價同樣可笑的情形，據官方公佈，倘使一九一三年的物價指數爲一百，則一九二三年的物價指數，就得大至一兆六萬六千二百億（16,620,000,000,000）。這種情形，顯然是難以爲繼。因爲倘若繼續的話，則收入比較的固定的階級，定將蒙巨大的損失，而且誰都知道若將收進來的錢保藏一小時，也許會失掉大部分的價值，所以大家都逼得將到手的錢爭先恐後地化。還有，工資必得依據新物價，每天規訂一次；而事實上則當工資於發下來之時，物價又漲起許多了。但是在這其間，負債者卻着實受到不少好處；不管他們在通貨膨脹以前所負的債是怎樣巨大，到了這時，只有消用半打雞蛋，甚至一枚郵票的代價，就可以把全部債務還清。結果，擁有地產的人也大交其好運，因爲原來的抵押借款，很容易一筆勾銷，而實際的物品，則成爲大家所公認的唯一的經濟價值。又如把錢匯往外洋，化成外幣，像這樣的趁着通貨膨脹時期藉馬克做投機生意的

人們，發財的、倒霉的、正不知有多少哩。

但是通貨膨脹雖然有利於少數的人們，同時卻使一切事務，都停頓起來。因為在這樣的情形下，誰都不敢豫先訂立以銀錢爲標準的契約，即使對於以某種固定的價格，在一星期內甚至一天內交貨那樣的契約，亦不敢冒昧應允。德國的整個經濟制度，這樣幾有完全解體之勢，而等到這種危險明白得不容再加忽視之時，取銷魯爾的消極抵抗的意念，便立即鑽進了德國人的頭腦。後來，德國卒創立一種新貨幣，用來代替那一錢不值的馬克，因其由政府指定以地產價值爲擔保，所以就名地租馬克（Rentenmark）；同時又降心低氣的，對協約國表示願以任何條件議和，雖然並不希望自己有永遠履行那些條件的能力。

魯爾的佔領，不但給與德國財政以絕大的打擊，同時對於協約國，也是一種巨大的負擔，而且德國的消極抵抗，雖然結果是自動的取銷，也足以表示樸蔭凱雷（Poincaré）藉武力勒索賠款的政策之謬誤。因為德國償付賠款的能力，很顯明的繫於國內的繁榮，而欲求其將來不致抵賴債務，則必先穩定其財政，並恢復其貨幣價值。就因為有這種原因，所以協約國也終於表示願與德國

議和，而在以美國道斯將軍（General Dawes）為主席的國際專家委員會關於德國的償付能力的報告書公佈以後，遂認道斯計劃為滿意，一致通過。由於這個計劃，原來的賠款數已給減削不少，並由協約國募集一筆款子，借給德國，作為穩定財政之需。還有，由於這個計劃，德國的暫時性質的地租馬克，又被一種新貨幣所代替，那就是以金為本位，而與戰前的馬克具有同樣的金價值的金馬克（Reichsmark）。自有這種金馬克，物價立即回落，幾與戰前相等；加以其後德政府又實行嚴厲的緊縮政策，德國的經濟制度，就這樣的恢復了某種程度的平衡。

自一九二四年起，德國戰後的歷史，纔展開了一個新局面。一九二三年八月成立的斯脫萊斯曼政府，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成立的馬爾克斯政府，一九二五年一月成立的魯德（Luther）政府，一九二六年五月成立的馬爾克斯政府，都本履行政策的精神，對於道斯計劃中各項條款，奉行唯謹，而長期間主持德國外交政策的斯脫萊斯曼，把德國在政治方面的國際地位重復建立起來，厥功尤偉。在這個時期內，有羅加諾條約（Locarno Treaty）之訂立，時為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唯關於這一條約，我們當在他處更有詳細的敘述，這裏姑不具論。在此以前，當一九二五年七月，法比聯

軍已退出魯爾；三年之後，即一九二八年，則萊因地帶北部的法比駐軍，亦完全撤盡。當此之時，馬克安定起來了，道斯借款到手了，德國於是在這種新局面下，利用多資，着手積極的復興產業政策。由道斯計劃與羅加諾條約的效果，於是國外投資者，尤其是美國的投資，都恢復其對於德國經濟前途的信心；如我們將在後面所見到，當時美國資本之流入德國者，數量大大有可觀。這種資本，大部分供重工業的復興與合理化之用；但各邦與各城市，爲要實施偉大的公共事業計劃，也往往舉借外債。且國內資本之外流，已隨經濟狀況的安定而中止，德國人民都開始拿出錢來，作發展產業的新資本了。

當時我們常可聽到這種議論：從一九二四到一九二八源源流入德國之資本，有大部分是被浪費掉的，德國經濟制度的復興運動，其實用不着這樣鋪張。使德國的納稅人增多一層負擔的各邦與各城市所借的債，固然難免於這種責備，就是用以發展私人掌握中的工業的借款，也成了詬病的目標。然而我們不要忘記，在一九二四及其後數年中，德國人大借外債，是有其自己的打算的，他們以爲世界的經濟繁榮此後定能繼續向前進展，物價即使辦不到永遠穩定，也定能保持某種

程度，因而嚴重的紊亂局面或借款的負擔的增大，定可完全避免。還有，德人以爲國內的狀況安定一天，則他們向美國借債的能力，亦一天不致中斷，直至可藉生產力的增加，能自己供給新資本，對借款供應利息及準備金爲止。不幸，一九一九年的美國當尙在繁榮狀態中時，忽然中止其對德國的投資，於是德國欲藉行險徼倖的手段使之實現的經濟復興計劃，突告破滅，致前四年中不甚穩固的平衡狀態，也沒有法子繼續保持了。

就後來的事實而觀，德國確乎有借債過量及經濟復興運動過事舖張之弊。但我們不應對德國人作過分的責怪，因爲他們只不過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他們的主要債權國，即美國，抱着同樣的信心，以爲大戰所造成的經濟困難，業已完全克服，產業在將來定能獲得與日俱佳的報酬。而且，德國人既已採取履行和約的政策，預備償付道斯計劃中的改正的賠款，他們就非借外款不行，至於這種外款到後來世界物價暴落的時候會變成他們難堪的負擔，這確乎是難以逆料的。常言道，容易的是事後的聰明，德國在事後亦何嘗不自悔失着，但在當時，眼見自己的資本是那麼短少缺乏，展開在自己前面的工業發展的機會卻是那麼豐富，其拼命舉債實屬事理之常，無足怪

者。可怪的倒是美國的投資家的慷慨。但是在那個時候，差不多全人類都深信世界已走上了新的局面，一帆風順的生產能力，前途似已毫無阻礙，那末美國投資家的慷慨，實與德國的拼命借款實屬同一理由，同樣的不足怪了。

導源於道斯計劃的實施之德國政治的新局面，除上述的情形外，還有一個特點，便是自一九一八年以來繼續不斷的內爭，忽告平息，使德國着實享受了一些時候的太平。一九二三年，當魯爾的消極抵抗尚在進行中的時候，巴威略政府與中央政府間會發生嚴重的爭端，在巴威略那個地方，反動派的革命計劃，層出不窮。那一年，巴威略在卡爾（von Kahr）一手統治之下，保持其自治權，拒絕中央政府的干涉。但是在這裏，還潛伏着其他的勢力，都在計劃反對中央政府的革命。兩年以前，即一九二一年，已被推為國社黨領袖的希特勒，那年曾與魯登道夫將軍（General Ludendorff）密謀進襲柏林，他擇定一九二三年的最後數月，在慕尼黑舉事。巴威略的迭克推多卡爾果然被他們拘禁起來，但未幾即逃出，號召全境人民為己之助，毫不費事的壓平希特勒的叛變，重又握得統治權。除巴威略以外，其他各地在一九二三年中也曾由左右兩種勢力，醞釀嚴重的叛亂，



所以是年八月，中央政府決賦蓋斯拉將軍（General Gessler）以軍事全權，任戡亂之責。適社會黨與共產黨聯合戴柴格納博士（Dr. Zeigner）為領袖，在薩克森成立政府，中央政府要求取銷，置之不理，於是中央軍開入薩克森，掃滅左翼勢力的政府，而建右翼社民黨的政府於其地。其他各地，又相繼發生小規模的變亂。但蓋斯拉將軍及其後繼者，即於十一月被任軍事全責的西克脫（Von Seeckt），終於撲滅這些擾亂安寧的勢力，並以明令禁止共產黨與國社黨。自此以後，魯爾抵抗的取銷，以及道斯計劃的接受，造成比較安定的狀態，再加以工業的重振，與物價的回復，德國終得重見太平景象。故至一九二四年二月時，西克脫的軍事領袖的地位，已可因為無繼續的必要而取銷了。然而一九二三至二四年的統一軍事指揮的辦法，不啻為後來的非常的立憲政體樹立先聲，這是不容諱言的。

自一九二四年起至一九二九年止，德國的經濟繁榮的恢復，這裏姑不具述。總之，在這個時期中，雖然物價曾有一時略呈低落，但德國終能使出口貿易的價值，從六十五億金馬克，增至百三十五億金馬克以上，貨品貿易原來呈二十五億不利的差額的，在這時期減至四億以下，而在後來兩

年中，有利的差額大有繼長增高之勢。實際，不利的貿易差額，至一九二九年國外借款大減以後，始呈低落的現象，一九二七年與一九二八兩年中的不利的貿易差額，都較一九二四年爲大。這固然由於巨額的美國資本之流入，但德國出口貿易價值之增加，亦爲一大原因。一九二四年的輸出噸數，共計在一千六百萬噸以下，及至一九二九年，竟增至約五千五百萬噸。很顯明的，像這樣的生產量與競爭能力的增加，便是說明德國工業的合理化，已收巨大的效果。

德國這樣，自一九二四年以後，漸在戰後的新局面下安定下來，而在歐洲取得新的地位。德意志共和國犧牲了極左與極右的兩種勢力，基礎日臻穩固。我們不妨肯定的說，假使經濟繁榮能夠繼續維持，這兩種勢力無機可乘，必不敢悍然起而革命。然而不幸，這只是捲土重來的暴風雨的前夜的寂靜。因爲以世界恐慌的到來，德國對於協約國堅決的履行賠款的要求，以及外債的巨大的負擔，應付爲難，於是其經濟地位遂驟然動搖起來。

在捲土重來的暴風雨的前夜，德國的情形，可用一九二八年總選舉後之各政黨的議席，爲極好的說明。此時，獨立社會黨已成爲歷史上的名詞，因其一部分黨員已投入共產黨，而右翼分子，則

已加入自德國的經濟狀況漸趨安定以後，反動跡象已比較的不大顯明的社民黨。一九二八年選舉結果，社民黨成了議會中的最大政黨。議會的總席數爲四百八十九，社民黨居其百五十三，幾佔全部議席三分之一。代表極左勢力之共產黨，只佔五十四席。至如從前有時與社民黨聯合，有時不與社民黨聯合，爲德意志共和國歷來政府的臺柱之三個政黨，則共佔得一百四十四席，假使把向與天主教中央黨聯合之巴威略人民黨計算在內，則爲一百六十一席。在這其間，中央黨六十一席，巴威略人民黨十七席，人民黨四十五席，民主黨（或稱國家黨）二十五席。除此以外，各種小規模的政黨（主要的是右派農民黨）合佔四十四席，反對現政權的國權黨七十八席，乘着經濟恐慌而抬頭的國社黨，其時尙在發軔期間，僅佔十二席。所以很顯明的，無論社會主義的勢力，或企圖推翻共和國的極右派的勢力，都沒有在議會中獲得絕對的大多數。因爲即使不相信共和制度的人，民黨，以及幾個小規模的政黨，與國權黨相聯合，其席數亦不敵社民黨一黨所佔的議席，與中央黨、民主黨、巴威略人民黨三黨之總席數相較，亦高出無幾。在這樣的情勢下，顯然多數都對中間的政府，表示擁護，足以阻止左右兩種勢力破壞共和國的陰謀。社民黨是預備以極大的努力，維護此中

間的政府，如在一九二四年以前動亂期中一般。他們並以最大政黨的資格，奉命組閣，以社民黨領袖雷爲總理之社民、人民、民主、中央四黨的聯合內閣，於是乃告成立。

### 世界恐慌中的德國

但是到了一九三〇年，情形就大變了。那一年的總選，社民黨失去十個議席，共產黨增多二十三席。中央黨與巴威略人民黨合計增加十席，民主黨少去三席。國權黨與人民黨的議席都呈退步，前者減少三十七席，後者減少十五席。舊時右翼政黨這種失勢，是國社黨勢力飛躍的結果，因爲這一個在兩年前僅佔十二議席的政黨，此時驟然佔得一百零七席。我們應該明白，德國的選舉制度，並不規定固定數目的議席，總議席的額數，全視投票總額爲轉移，所以在一九三〇那年，因了投票總額的增加，議席也視前增加。

這種變化，顯然係世界恐慌所造成，因爲自世界恐慌發生，左右兩種勢力，都犧牲其與自己最接近的政黨，而日趨強大。但天主教中央黨，似乎不會受世界恐慌的影響。所以一九三〇年三月，穆

雷政府解體之後，中央黨白魯寧起而組織新政府，這政府賦有巨大的非常權力，假大總統與登堡（興氏在一九二五年社會黨員愛倍爾死後，就已當選為大總統）之手而行使之。此種政權的更迭，還是一九三〇年總選以前的事；總選以後，白魯寧被任以組織新政府事宜，仍以非常手段統治國家，而且因為世界恐慌的日益深刻化，他的非常手段，也日益嚴厲起來。

以上是一九二八年以來德國政局的第二幕，現在，讓我們接講第三幕。這是一九三二年七月的總選，其時世界恐慌益甚於前，因而民衆的情感，亦呈特殊的狀態。結果，社民黨又失去十個議席，自百四十三降至百三十三。共產黨的議席又有進步，從七十七增至八十九。但這種變化還算不得怎樣重要，重要的是中央黨的勢力，因其重要黨員白魯寧把握政權的結果，益加強大。中央黨多得了六席，變成七十五席，其同盟巴威略人民黨多得了三席，變成二十三席。民主黨蹉跌最烈，從二十三席減至四席。國權黨依然保持其原來的地位，只少去一席。但與國權黨最接近之人民黨，卻與民主黨同其命運，自三十席減至七席。至如有幾個小規模的政黨，則完全見擯於議會。但國社黨卻又呈躍進之勢，佔得了二百三十席，以視一九三〇年的一百零七席，與一九二八年的十二席，四年之

間，幾增至二十倍之多。很顯明的，經濟恐慌的高潮，已激起民衆對國社黨運動的熱烈的同情了。

然而數月之後，即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當第二次總選揭曉時，突飛猛進的國社黨，忽然受了一次挫折，議席自二百三十減至百九十六。國權黨與人民黨俱有進步，前者自四十席增至五十四席，後者自七席增至十一席。但尙不及左翼勢力進步之速，共產黨的議席，這一次又增加了十一座，共佔得一百席之多。此外，社民黨損失十二席，中央黨損失五席，巴威略人民黨損失兩席。最可憐的是民主黨，給這次選舉減去一半議席，結果只賸兩席。當時曾有人斷定國社黨這次挫折，是國社黨勢力永遠失墮與日趨衰微之先兆。然而這種預言，馬上就被事實證明其不確，因為一九三三年一月的政變，以及其後希特勒內閣主持下的各次選舉，都說明國社黨正自有其未可限量的前途呢。

關於國社黨勢力的抬頭，將在本書以後作更詳的敘述，故這裏所述只限於說明德國對經濟恐慌所呈現的迅驟的政治反應，以及國社黨的興起與德意志共和國日甚一日的經濟危機兩者，其間有若何密切的關係，此外姑暫置勿論。又如德國在恐慌期中的經濟情形，也沒有在這裏詳述的必要。這裏所當敘述的，是德國所獨具，同時又爲德國採取與歐洲大部分國家截然不同的政策

的由來之幾個特點。

白魯寧時代的德國，曾以極大的努力，保持出口額，限制入口額，冀一面可不必放棄金本位制，而一面仍有能力應付各國的要求，關於這些情形，本書中其他各處亦有說及，這裏所當注意者，只是這種努力對於德國經濟制度的組織，曾發生怎樣的效果。的確，爲要避免經濟的總崩潰，政府除大擴充其對經濟的管理權以外，別無辦法。因爲一九三一年五月，奧大利信用準備銀行（Credit Anstalt）突然倒閉，致德國的銀行的地位，也連帶的動搖起來。在此以前，當一九三〇年九月國社黨選舉獲勝之時，德國的國外債權者都紛紛將短期借款撤回，致那一年的秋季，國家銀行不得不準備價值十億金馬克的現金與國外匯票，用來應付那些退出德國的短期外債。一九三一年最初數月，情形已稍緩和，但是爲了奧大利信用準備銀行的倒閉，德國的銀行立即發生第二次擠兌，六月及七月的前半，國外借款之退出德國者，數達三十億金馬克以上。不管國家銀行給以若何援助，重要銀行如大乃脫銀行（Danat Bank）也不能不於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三日，宣告暫停支付。此時，爲制止擠兌起見，延期償付令已無可避免。政府開始對各銀行，尤其是大乃脫銀行，予以援助，並

且於八月間與外國磋商巴塞爾安定協定 (Basle Standstill Agreement)，要求債權者將撤回借款一事，嚴加限制，幸蒙債權者的允許。但國家對銀行的干涉，已一發而不可復收。爲要確保其償付能力，政府逐步擴充對銀行的管理權，直至能操縱銀行爲止，同時就有限的國庫中，劃出充分的款項，扶助銀行的進行。並且嚴厲限制存戶提取存款，以求不影響自己償付賠款與外債的能力。故自一九三一年以後，德國的銀行實際上已變成國家機器的一部分了。

然而政府尙不能單藉在銀行界的活動，即可高枕無憂，因爲德國合理化的重要工業，以世界恐慌的到來與大部分資本都已出押之故，其財政狀態也漸陷於左支右絀，要是政府不給以援助，就要難以爲繼。所以在過去兩年中，一種高程度的國家干涉，已從銀行界擴大到比較巨大的工業組織，整理內部與添加資本等事，都在國家直接監督之下進行。當時常有人說，德國已在非社會黨的統治下，進於社會主義的制度了。然而此說其實不確，因爲信奉社會主義的人自動建立社會主義的制度，與並未稍減其對私有企業權的信心的政府在緊急時代，逼不得已對大企業施行非常積極的干涉，究竟是大不相同的。



在這時期中，失業人數也呈激增之勢。前數年所設立之大工廠，此時爲了國外市場的缺乏，與國內建設事業的中止，紛紛停頓起來。蓋大規模的合理化有一個特點，即只有在在大工廠以全速率開動之時，纔合於經濟條件，要不然，工廠資本便不能藉最大數量的生產，獲得其所應得的利益。所以德國的十分完備的經濟制度，當世界恐慌到來之時，反較其他各國比較不十分合理化的工業，更爲困難。從某種意義言，德國可說是受了生產能力太高的累，因爲德國起初只知盡可能的提高生產能力，初不料世界經濟制度的變更，能使其貨品頓時失掉穩固的國外市場，使其經濟制度頓時現出破綻。

因了胡佛的緩付戰債令 (Hoover Moratorium)，賠款的償付，可自一九三一年春季起延緩一年，且如前面所說，繼着這種賠款的停付，德國又與外國訂立幾次安定協定，故短期外債亦可不必按時償付，但對長期外債，尤其是與道斯計劃與楊氏計劃有關之建設借款，則還是必須按期付息。像這樣的長期借款，其緩付的命令直至一九三三年夏季方纔正式宣佈；而且即使在那時候，德國對於一九二四年的道斯借款，還得履行償還的義務，又對於一九三〇年的楊氏借款，除須籌

措還債準備金外，並不得拖欠利息。

一九二九年的楊氏計劃，其目的爲對於協約國的要求，加以進一步的修改，所以內容似較一九二四年的道斯計劃尤爲寬大。然而事實上，爲了一點重要的疏漏，那個計劃竟使德國比繼續維持道斯計劃更爲不利，因爲道斯計劃中有一項條款，意謂德國得以世界物價的低落爲比例，縮減賠款的數目，但楊氏計劃竟把這條完全刪去。這種疏漏，表示楊氏計劃缺乏先見之明，蓋當計劃在訂立中的時候，世界恐慌與物價的低落實已昭然呈露。賠款的數目，雖已一再縮減，但以世界恐慌的到來，德國是否一方面能償付商業性質的外債，而一方面仍能維持其償付賠款的能力呢？則楊氏計劃中所規定的年款，決非德國所能勝任；只有依照舊來的不實際的方法，即先由德國向美國借錢，一轉手間，便以之奉送於協約國，次由協約國將從德國所得到的大部分的錢，作爲償還戰債之用，移交給美國，如此循環不息，德國纔有履行楊氏計劃的可能；要不然，慢說在世界恐慌的時期，就是在世界經濟已呈轉機的時候，也休想德國能够負此重擔。故楊氏計劃之卒歸於失敗，實比道斯計劃更爲顯明，不過一般人還料不到竟會隨着世界恐慌的爆發而立即呈現鉅大的破綻。

然而這種情形，到底也產生一個很好的效果，原來協約國向來只知從德國身上榨取巨量的金錢，毫不計及德國是否有能力贖足自己的慾望，自楊氏計劃失敗以後，他們這纔與賠償問題發生實際的接觸，而把前幾年所抱的奢望掃除得乾乾淨淨。

當美國肯把錢借給德國之時，協約國向德國要錢是能如願以償的，這是從前的事，現在不然了。然而協約國，尤其是法國還不肯立即承認這鐵一般的真理，直等胡佛緩付戰債令發表後再過若干時日，始改變其態度及至一九三二年中段，當胡佛任期終了之時，協約國雖欲不承認這真理，亦不可得。就因為有這個緣故，所以一九三二年七月所訂立的洛桑條約，竟呈特殊的狀態，使在往日，這種性質的條約是決不會有這樣的內容的。原來往日的任何計劃，都以使德國長期繳納巨額的年款為其原則，但洛桑條約所根據的原則，是協約國接受視前大為減少的賠款數額，俾德國清償協約國的賠償要求，可比較的省力。在往前，協約國都力謀從德國徵取一筆充分的款項，用來應付自己必須向美國按期償還的戰債，甚至英國也如此，自洛桑條約的訂立，這種原則纔被完全放棄。如楊氏計劃中所規定，德國對協約國按期分繳的款項，總數幾達二百五十億金元之巨。但洛

桑條約中所規定的德國所應償付的款項，則充其量也不到二十億金元。而且德國對於一切款項，得停付四年。不過即使如此，事實上已很少有人相信自洛桑條約以後，德國居然會同往日一樣，再對協約國履行償付賠款的義務了。縱使協約國沒有意思把自己對德國的要求，彰明較著的一筆勾銷，但簽字於洛桑條約的人們，大概不會不明瞭他們所做的事情，到底具有怎樣的實際意義。我們儘可以說，即使如在洛桑條約中所規定那樣的賠款，現在已沒有人希望德國能確實履行償還的義務，無論是全部或為一部。因此之故，賠款問題與解決戰債問題，原來好像分拆不開的，到底彼此獨立起來，雖則我們必須牢牢記住，協約國同意於洛桑條約形式上是以美國的戰債要求獲得圓滿的改正為交換條件，而且這一條約，一直到現在還不曾獲得協約國的一致的批准。

德國國運之有賴於出口貿易，與英國可說毫無二致。而且其所輸出的工業品，種類較英國尤為簡單化。織物固然遠不及英國的出品那樣在世界市場中佔有重要地位，煤的輸出額，也較英國為少。德國最得力的輸出品，為鋼、工程器具、電器、化學品等。這就是說，德國輸出品的銷路，其大小全視世界建設工業之發達與否而定。其實，德國同時也是小件金屬器具以及供個人消耗用的廉價

奢侈品之重要製造者。不過對於最後一種貨品，無論何國都要用極高的關稅限制其輸入，所以大體上，德國之依賴金屬器具、電料、化學用品爲其主要輸出品，若站在對外的關係來看，可說是德國國家經濟的顯著的因素。像這樣，德國對於世界繁榮的復活，抱着熱切的經濟上的關心，是無怪其然的。因爲近幾年來，德國雖然盡可能的限制輸入品，可是要想獲得滿意的生活標準，或者要想藉工業品交換農業品的原則，創立平衡經濟的地位，實屬困難之至。假如定欲達到這目的，那末德國就得以異常昂貴的成本，生產食糧，同時又得把工業制度，大大的改革一番，因而犧牲大部分的現存的財產。所以在經濟上，德國所熱烈追求的，是恢復國際貿易的自由，或者在國外獲得一些穩固的市場，尤其是在歐洲，因爲這是德國輸出貿易最重要的市場。惟在目前，德國經濟制度欲使歐洲並未活動得有順利發展這種熱切的願望，正被經濟不景氣的副產物，即泛濫全德之侵略的民族主義，捲得無影無踪。然而不管將來德國的政治制度怎樣，這種願望到後來終必復活，則可斷言。即使國社黨繼續得勢，他們也不能不力求自己與德國的經濟制度相適應，因爲像其他的統治者一樣，他們是斷不肯永遠負擔巨大的失業工人的費用，永遠放棄大部分國營工廠所能認納的稅收

的。這種潛伏着的經濟動力，也許須經過相當時日，纔能在德國佔得勢力，但世界大戰如果不致發生，那末此種動力是不能長久加以蔑視的。

